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编委会顾问

章新胜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郝克明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
潘懋元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钟秉林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瞿振元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许琳 国务院参事, 汉办主任, 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
张秀琴 中国常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大使衔代表
岑建君 教育部国际司司长, 港澳台办主任
杜越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刘京辉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长
孙建明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主任
生建学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

编委会主任

展涛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任
陈群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编委会副主任

杨银付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学民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任助理

主编

陈群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拼音为序)

曹士海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
陈群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陈时见 西南大学副校长
陈盈晖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
程家财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副主任
冯增俊 中山大学教授
郭新立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郭玉贵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特聘教授
江波 同济大学副校长
姜锋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静炜 国家汉办副主任, 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
鞠凯 金凯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岩松 北京大学副校长
刘宝存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刘宝利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原巡视员
刘建丰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刘学民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任助理
吕信伟 成都市教育局局长
吕玉琪 江西省教育厅副巡视员
马万华 北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秦昌威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全委会副秘书长
强海燕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阚澄宇 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
孙启林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汪利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教育创新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王嘉毅 甘肃省教育厅厅长
王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教中心副主任
王英杰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志泽 北京汇佳教育集团董事长
吴小林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副校长
辛宝忠 哈尔滨商业大学校长
杨新育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
杨银付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叶扬波 美国艾奥瓦大学教授
袁筱一 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展涛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任
张民选 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
赵灵山 教育部港澳台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赵中建 上海纽约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
周满生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
周燕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

新视野 新观点

- 3 基于传统发展特色 打造全方位开放型大学
——访日本筑波大学校长永田恭介
..... 杨云 刘琦 朱婷婷(采访、整理)
- 8 亲历新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 守望国外教育信息研究(下)
..... 黄仕琦

新趋势 新战略

- 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上)
- 15 大学进入全球伙伴关系的新时代 [葡]曼努埃尔·赫特
- 18 跨国高等教育的全球治理
——质量保障与认证的视角 王铄

一流大学与高等教育

- 24 德国高等教育改革及新变化 王志强
- 29 2006-2014年德国大学学费改革(上) 韩丁

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

- 34 菲律宾社区教育初探
——基于在卡布尧希望日托中心的访谈 孙建光
- 37 韩国职业培训体系分析 韩舒静

基础教育

- 42 质量与公平并行: 澳大利亚中小学教育改革探析
..... 黄艳霞
- 47 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基础教育的改革 杨志明 孙河川

合作与交流

- 孔子学院: 中国与世界的纽带
- 52 用热爱与坚持铸就中赞友谊的桥梁
——访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何懿
..... 潘雅 张金晓(采访、整理)
- 57 打造中巴教育文化交流的互动平台
——访巴西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乔建珍
..... 郭伟 潘雅(采访、整理)

CONTENTS

No.18, 2015
(Vol.28, General No.378)

港澳台聚焦

- 62 台湾高校教学发展机构的特点与启示 侍朝霞
66 现代大学书院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基于大中华区十五所书院的研究 庄瑜

环球零距离

• 综合治理

- 7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赋予教师权利是实现优质教育的关键
72 经合组织和欧盟联合报告:移民家庭子女找工作受不公正对待
72 世界银行支持印尼贫困家庭子女接受教育

• 高等教育

- 73 美国部分高校改名以吸引生源
73 英国私立学校毕业生薪酬增长较快
74 全球调查:超7成父母愿送子女出国接受高等教育

• 职教教育

- 74 经合组织报告:德国职业教育为年轻人创造良好就业机会
74 国际文凭课程职业教育项目在英国肯特试点成功
75 亚马逊公司携手美国社区学院为雇员提供在职教育

• 基础教育

- 75 印度显著提高小学教育入学人数
76 法国公布2014年版《国民教育大数据》
76 英国11岁学生的读写及数学能力大幅提升

• 教育信息化

- 77 法国发起国民数字化教育创新服务计划
77 日本约40%儿童使用智能手机

- 78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将在高考中禁止学生佩戴智能型手表

• 教育国际化

- 78 中德将加强青少年交流领域合作
79 欧洲高校师生国际交流规模稳中有增
79 澳大利亚高校或强制国际学生学习英语课程

彩页索引

封面人物:日本筑波大学校长永田恭介

封二:第二届留学学友俱乐部创业奖在京举行颁奖仪式

封三:中国教育信息化杂志社三刊介绍

封底:《世界教育信息》介绍

世界教育信息(半月刊)

Journal of World Education (Semimonthly)

出版 世界教育信息编辑部
运营 中国教育信息化杂志社

特约编委(以姓氏拼音为序)

- 博 斯 欧洲教育测试与评价委员会会长
丹尼尔 法国信息与传播科学学会副会长
李建民 中国驻欧盟使团文化教育处公使衔参赞
李荣安 香港公开大学副校长
李忠尚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
马燕生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
莫家豪 香港教育学院教授
沈剑平 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教授
沈 阳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
苏智欣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教授
王 盈 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教育组参赞
严文蕃 美国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教授
尤少忠 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原大使衔代表
张兰春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教育处原公使衔参赞
赵国成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

社长兼执行主编 周一

总 编 辑 祁 伟

副 主 编 赵 健 张力玮

编辑部主任 李广平

编 辑 部 许方舟 潘 雅 吴 婷 朱婷婷
郭 伟 吕伊雯 贺 庆 付 刚
孙雪珂

美 术 编 辑 石兴虎

版 面 设 计 张 娜

发 行 部 陈亚丽

研究与咨询中心 左 罡 李 艳

文 章 投 稿 010-83988611、83988617、83988619
edinfo@moe.edu.cn

合 作 交 流 010-66092189、66096335

world@moe.edu.cn

发 行 订 阅 010-66097234

cyl@moe.edu.cn

通 讯 地 址 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37号
教育部2号办公楼410室

邮 政 编 码 100816

国 内 刊 号 CN11-4123/G4

国 际 刊 号 ISSN 1672-3937

创 刊 时 间 1987年

出 版 日 期 每月10日、20日

国 内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国 内 邮 发 代 号 82-128

国 内 发 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 内 定 价 人民币10.00元/期

国 外 订 阅 中国国际图书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 外 邮 发 代 号 M2044

国 外 定 价 美元10.00元/期

广 告 许 可 京西工商广字0167号

印 刷 北京柏力行彩印有限公司

●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龙源期刊网收录期刊

编者按:筑波大学(University of Tsukuba)成立于 1973 年 10 月,其前身为东京教育大学。筑波大学致力于全方位打造“开放型大学”,不拘泥于固有观念,以率先实现“灵活教育研究组织”和“新型大学机构”为基本理念,引领着日本的大学改革。在采访中,永田恭介校长指出,日本大学的校长和理事长合二为一,校长要竭力处理大学科研、教育、经营事务;法人化改革使得学校的自主权有所扩大,学校能够较为自主地分配其资金;学科建设需要开发多样化课程,为学生发展提供更多选择;国际化发展需要扩大教师和生源规模,以优势学科带动学校国际排名提升。此外,永田恭介校长就近几年日本教育领域的“宽松教育”等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此次采访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彭利平、屠晓明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此感谢。

基于传统发展特色 打造全方位开放型大学

——访日本筑波大学校长永田恭介

采访、整理 / 杨云 刘琦 朱婷婷

一、日本大学校长任重道远

《世界教育信息》:近几年,日本一些大学就内部治理问题进行改革,如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等。由此,教授会的权限问题也被广泛议论,贵校在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

永田恭介:从 2015 年 4 月 1 日开始,日本的大学在新的法律制度下运行。变化最大的地方是大学校长的决定权得到了大幅扩张和增强。虽然保留了教授会等组织,但是他们只能为校长提供咨询,最终的决定权还是由校长掌握。另一个变化是校长不再通过学校选举产生,而是由学校委员会和相关外部委员会成员选举产生。以筑波大学为例,其校长选举由筑波大学学校委员会的 10 名成员和外部委员的 11 名成员作为代表投票选出。外部委员会成员一般包括海外委员会人员、政府相关负责人、其他大学相关人员、研究机构人员,以及经济界人士等。

《世界教育信息》:与之前相比,现在的大学校长选拔是否变得更加严格了?

永田恭介:是的。大约 40 年前,筑波大学没有教授会,只有一个行使教授会职能的委员会,主要负责信息交流。大学的权力集中于校长手中,校长再把权力下放给相关副校长。现在,校长没有这样的权力了,当然,这是一种好现象。日本大学的副校长制度就是从筑波大学开始实行的,在这之前没有大学实行过该制度。2015 年 4 月 1 日开始执行的改革和筑波大学之前的制度比较相似,当然这次改革也为筑波大学带来了活力。

《世界教育信息》:目前,校长领导力备受关注,对于大学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在您看来,在当今时代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大学校长?

永田恭介:在日本,大学的校长和理事长是合二为一的。校长是教育和研究方面的最高领导,理事长则是大学经营方面的最高领导。从校长的角度来说,努力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成

采访整理:杨云,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流动站博士后;刘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朱婷婷,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世界教育信息杂志编辑、记者

为一名优秀的研究者,认真进行教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从理事长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用公司内部的职务进行说明,理事长是一位营业者,类似于第一营业课长,需要处理大学经营方面的事务。合二为一的校长要设身处地处理好学校的相关事务。在与政府进行交涉和经营遇到困难的时候,校长必须要与相关人员商议,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此外,遇到紧急事项时,校长必须能够做出科学的判断。校长要及时发现问题,不能像一尊雕像一样一直坐在办公室,要用眼睛去观察、用心去解决事情,当今时代尤其如此。

二、法人化改革扩大了学校的自主权

《世界教育信息》: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已将近 10 年,在人事任用上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制度改革,比如说非终生雇佣的形式不断增多。请问,筑波大学在这方面是如何进行改革的?

永田恭介:关于非终生雇佣形式,我们称之为流动名额或战略名额。由于筑波大学是研究型大学,在科研方面可以自由开展具有竞争力的研究。同时,考虑到刚才提及的校长领导力和学校竞争力,筑波大学每年会从约占全体教师 3%的退休或离职教师名额中拿出 1%的名额由校长决定其岗位。这种雇佣形式是最近刚开始实行的。在进行教师任用,我还会尽可能多考虑年轻人、女性和外国人。

《世界教育信息》:经过法人化改革,筑波大学是否已经具备了自主权?

永田恭介:目前,学校确实拥有自主权,但是在某些问题的具体操作上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国家需要进一步修正法律,明确规定大学在法人化改革之后的具体义务和权限等。此外,该法律应规定公共团体和公职人员不应该做的事项。在这方面,日本的法律有些滞后,但是我相信几年之后会有所改善。

《世界教育信息》:筑波大学的某些学部已经开始市场化,这些学部的资金是如何引进的?有没有具体的案例?

永田恭介:有的。数理学部与丰田汽车公司、电通公司合作,吸引他们的大量资金,同时,为他们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当然,筑波大学也会为数理学部提供资金,但是该学部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于上述两个公司。能够为全球性的大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学生也感到非常开心。市场化改革后,大学与企业、地方自治团体、医院等的合作也在不断增加。比如,日本有个叫做农协的组织,也会负责组织各个医院的医生为民众开展诊疗活动。以前,该机构召集的医生数量不足,为了改善农村地区的诊疗条件,就把钱捐赠给大学,让大学帮助其改善农村的诊疗条件。

《世界教育信息》:对于引进的资金,筑波大学能自主使用吗?

永田恭介:总体来说,筑波大学可以自主使用引进的资金,尽管这部分资金比较庞大,但是在可控的范畴之内是可以自主使用的。如果这些资金不能自主使用的话,会为大学经营造成困难。

《世界教育信息》:据我们了解,日本国立大学的基础配套科研经费在不断减少,筑波大学在这方面的情况如何?

永田恭介:从 10 年前开始,基本上所有国立大学每年的科研经费都会减少;到现在,国立大学的科研经费下降了 11%。基于此,很多学校提出了改良方案,并向文部科学省提议。但是,筑波大学几乎没有减少科研经费,虽然今年减少了 2 亿日元,但在百分比上只减少了 0.3%~0.5%,而且通过努力,目前我校取得的科研成效与没有减少科研经费时是一样的。

总之,在改革范围扩大的时候,学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与政府进行交涉。当大部分

学校都在减少研究经费的时候,筑波大学能做到这一点也实属不易。

三、“宽松教育”有待改革, 职业教育应与世界接轨

《世界教育信息》:从 1998 年开始,日本的教育开始过渡到“宽松教育”阶段,并一直进行着“宽松教育”方面的改革,到目前为止已经有 10 多年了。在您看来,这对学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永田恭介:“宽松教育”的实行导致学生的学力水平较低。虽然在中学学习了很多东西,但是由于学力水平较低,学生通常一进大学就会感到非常困惑。大学的教育水平比较高,在“宽松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很难跟上大学的进度,毕业生踏入社会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认为,教育内容不应该简单化。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宽松教育”改革是有些失败的,教育应该回到以前的状态。

《世界教育信息》:日本还有一项重要的职业教育改革正在进行,即拟定成立实施实践性职业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吗?

永田恭介:文部科学省在 12~13 年前,就讨论筹建实施相当于大学水准的职业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但是当时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计划被迫搁浅。直到 2014 年前后,文部科学省察觉到在新形势下不得不重新讨论这一提案。当今时代,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高中毕业生的水准无法满足职业结构对人才的需求,需要培养更高水平的职业教育人才。比如,众所周知,日本的动漫非常有名,为了使动漫更好地向世界推广,需要教授动漫理论,在语言方面还要借助英语,所以需要设立动漫大学。但是,上述更高水准的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的机构是设立在现存大学之内还是在现存大学之外,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重新设立大学的负担会很

重,同时也会更复杂。此外,关键还要选好专业,不是任何职业教育专业都适合提升到大学教育层面来的。

《世界教育信息》:从 2014 年开始,专门学校开始开设实施实践性职业教育的专业课程。随着实施实践性职业教育的专业课程的设置,您认为专门学校是否会升格为“一条校”^①呢?

永田恭介:专门学校设置的实施实践性职业教育的专业课程是日本文部省对专门学校教育质量提升的举措。我也是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促进实践性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机关制度化部会的会长,对于这件事情,我们正在讨论。我认为,专门学校不会升格为“一条校”。

四、开发多样化跨学科课程, 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世界教育信息》:据悉,日本在重新定位大学的使命。政府提出取消或合并一些弱势学校的人文社会学科,如教师教育等。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永田恭介:2014 年 9 月,文部科学省发出通知,要求大学改革人文社会学科。消息传出的次日,我就表示,如果连人文社会学科都没有了,那么大学就不能称其为大学了。如果师范大学因为教师教育专业的缺失而不能培养教师人才,我会感到非常遗憾。当然,目前的人文社会学科确实需要进行改革,但是我不希望它们全部被撤销。

我们学校实力比较强,人文社会学科能够得以保存。真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这些学科,日本的大学应该怎么办。如果这样下去,20 年之后,日本可能就没有能够制定法律的人了,这让人非常困惑。筑波大学会对人文社会学科进行一定改革,但是绝对不会完全撤销这些学科。

《世界教育信息》:人文社会学科实力较弱

的学校是否有可能被兼并?这对于这些学校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永田恭介:规模较小的大学的某些学科比较容易被兼并。10年前,我校兼并了图书信息大学并将其作为我校的图书馆信息学专业。我认为,日本政府正在打算减少 86 所国立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让学生在私立大学学习人文社会学,而将理工学科放在国立大学中。有些地方大学是专门性的,只有人文社会学科,所以没法撤销这些学科。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私立大学应该将人文社会学科做强,同时注重多样化发展。

《世界教育信息》:目前,大学学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无法适应技术发展的需求,大学亟需开发跨学科课程,许多国家也十分重视应用型大学发展。贵校在这方面有什么举措?

永田恭介:42年前,筑波大学在创立之初就开始进行相关尝试。新入学的学生会被分到不同类型的班级。第一类班级吸纳了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学生,他们学习数学、哲学、伦理学、物理学等课程;第二类班级的学生学习的是偏应用性的科目,如生物学、社会学等;第三类班级的学生学习的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纯应用性科目,如国际社会综合学、信息学等。这样一来,第一类班级的学生涉猎的课程范围就很广。10年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研究生院设置了重点专业,本科阶段学生的专业选择范围变小了,无法自由地进行跨学科学习。通过反思,我认为我们应该多设置一些学科,扩大学生的选择范围。当然,我们也在酝酿入学考试、教养教育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筑波大学正朝着为学生提供更多样、更广阔选择的方向进行改革。

五、扩大师资和生源规模, 以领先专业带动国际排名

《世界教育信息》:筑波大学在加强国际交流方面有什么规划?

永田恭介:筑波大学正在加强设立海外的大学办事处,例如,在华东师范大学就有常驻人员。主要工作是介绍筑波大学以及吸引海外学生。我们也在和法国的一所知名大学合作推出这一做法,且收效很好。

筑波大学是国立大学中留学生比例最高的大学。我们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前来留学。同时,我们希望输送更多的学生到国外学习,通过建立友好学校,让我校学生到国外名校接受良好的教育。

师资建设方面,筑波大学引进了很多外教。大约 2 年前,我们只有 95 名外教,而现在已经有 140 名外教。10 年之后,我们计划将外教人数扩充到 300 人。

生源地拓展方面,在亚洲地区,筑波大学招收最多的是中国学生,大概占全部留学生半数的比例。此外,我们还计划按照 1/10 的比例招收教育不发达地区的学生,如非洲、南美洲等地区的学生。或许中国的大学也是如此,努力均衡分配教育资源。我们不仅是为了筑波大学,也不仅是为了日本,还为世界各地想要进行学习和研究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若非如此,很难成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学。我们也一直在为此不懈地努力。

《世界教育信息》:筑波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方面有什么目标?

永田恭介:文部科学省曾指示筑波大学进入世界前 100 名。现在,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排名有《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QS 大学排名等。日本的大学也在这些排名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北大学。在日本国内,筑波大学大致排名第六。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进入国内前 5 名,到那时在世界范围内可能会勉强挤入前 100 名。几年前,筑波大学排在 270 名左右;目前,筑波大学排在 190

名。虽然学校进入世界前 100 名有些困难,但是我们的许多专业如果能进入世界前 100 名也是不错的。目前,我校物理学专业排在世界 110 名左右,生命科学专业排在 130 名左右,如果这两门专业发展势头良好,就有可能进入世界前 100 名。在我看来,与其盯着排名不放,不如更加扎实地推进学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庆应义塾大学现在在世界上的排名是 230~250 名,而该校的就业率居世界第五。如果从就业率来看的话,庆应义塾大学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即使世界排名前 100 名的大学也未必有这么高的就业率。如果从大学培养的教师质量来看,筑波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肯定能进入世界前 100 名。

六、灵活使用慕课,注重学生个性发展

《世界教育信息》:目前,很多大学都在进行教学改革,如推行慕课(MOOC)等。对此,贵校是否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永田恭介:关于慕课,我认为它有利也有弊。好的方面是,很多人能够通过慕课打破时空局限,与世界接轨,了解事情的本来面貌。但是,慕课不能完全替代教师授课。当学生在学校生活中遇到困难时,教师能够从学生的心理和精神层面给予其鼓励;当学生的学业不能顺利进行时,教师可以为其解答疑惑,帮助他们完成学业。然而,慕课无法做到这些。因此,在我们学校,我认为要有一些实际的教育测试,以区分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明确不同学生必须要做的事情,尤其是在对学生的学术指导方面,做到因材施教。在学习慕课时,学生虽然能跟上视频中出现的知识点,但是当被问及该知识点的意义时,很多学生可能就不是非常清楚其含义,单凭“看”去理解知识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应该灵活地使用慕课,并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对其因材施教。

七、基于传统特色,不断开拓创新

《世界教育信息》:请为我们介绍贵校的教师教育。

永田恭介:筑波大学培养的师范生致力于辅导各国学生参加高中毕业会考。我们准备从 2015 年 9 月份开始开设课程培养方面的课程,该课程也招收外国学生。我们培养的师范生毕业后,在世界范围内设有高中毕业会考的国家都可以任教,也可以成为研究人员。

筑波大学也有教师教育研究院,我们希望将其建设成培养特色教师的研究院,培养能在不同领域任职的特色教师。

《世界教育信息》:请问,筑波大学的就业率如何?

永田恭介:本科阶段,除去读研究生的学生,毕业率为 98%~99%;硕士毕业生就业率大概是 100%;博士毕业生就业率大概是 90%,包括一些在职的哲学博士。因此,筑波大学毕业生在就业方面完全不必担心。

《世界教育信息》:目前,中国的大学也在进行改革,您对此有何建议?

永田恭介:大学发展不能忽视传统,因为这是学校自身的财富,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国的学生非常多,不可能所有大学都变成顶尖大学。因此,各大学要发挥自身特色,发扬各自的历史文化,将自身建设成特色大学。筑波大学的目标是建设综合性大学,比如,建校当初我们就设置了体育科学、艺术学等专业。日本其他的大学都没有同时设置医学部和艺术部。这是筑波大学的特色,我们会在保持这些特征的基础上继续进步。

注释:

①“一条校”是指日本《学校教育法》第一条所规定的学校。

编辑 吴婷 校对 吕伊雯

亲历新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 守望国外教育信息研究(下)

文 / 黄仕琦

五、学习苏联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机械地照搬容易吃亏

本人比较关注教育领域,注意到我国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考虑到文教界从领导到基层学校中的任职人员对此知之甚少,因此我有必要让读者知道这一段历史。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就是学习苏联。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好的方面,但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主流。1955年后,我可以直接阅读到俄文出版物,那时是中苏友好时代,苏联政府教育部门给我国教育部赠阅了一些书刊。我们机关也订阅了苏联的高等教育部的机关刊物《高等教育通报》《公报》,国内也能够看得到苏联大学教授与行政干部写的文章,因此我对苏联的了解相对比较多。我也曾力图利用美、英、日、德等国的书刊了解苏联的历史和现状。

我第一次去美国是在1984年11月,当时做的一件事就是通过研究苏联的美国专家来更好地了解苏联。在今天,我们仍然有必要更深入地从历史角度了解西方观察家对苏联的认识。访美期间,我拜访了麻省理工学院洛伦·格拉汉姆教授,他送了我好几本书。他对苏联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在苏联待了很多年。现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沈志华教授是研究苏联的

著名学者,他主编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多达34卷。俄罗斯政府解密比较彻底,比如当时的中苏关系、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关系,很多历史都能从苏联档案里了解得很清楚,沈志华据此写了一本《苏联专家在中国》。据该书记载,1949-1953年,中国聘请苏联教育专家共187人。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两所学习苏联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的重点学校。1950-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共聘请苏联专家98人,哈尔滨工业大学聘请苏联专家67人。

学习苏联是值得我们了解和思考的一段历史,我也与一些苏联专家打过交道。当时,学习苏联是国策,中央政府各个部门都邀请了苏联专家,教育部也不例外。我刚到教育部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位苏联专家,叫福明,他为人很平和。我初到教育部就碰到开办专科学校的事情,面临着如何制订合理的教学计划的难题。福明向教育部领导提出可借鉴苏联中等专业学校办两年半制特别班的经验,而非简单地将传统四年制高校课程予以压缩,这件事我参与了全过程。为此,黄松龄(1898-1972年)副部长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开了一次专门会议。

有的苏联专家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提出的意见就不够实事求是。例如,福明之后继任的首席专家列别捷夫(在苏联高等教育部担任过司长)把苏联的教师工作量制度介绍给我国,希望用教师工作量制度来控制教师编制。这

作者简介:黄仕琦,教育部外国教育情报资料室原主任

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处于高速扩张阶段,研究生培养制度还没形成,新教师培养也跟不上,让大学毕业生、助教上台讲课,以工作量为指标对其进行考核是比较困难的。

我自己向西方介绍我们学习苏联专业划分过细的经验教训时,也举了例子,如内燃机专业被分成好多种——汽车内燃机、拖拉机内燃机、坦克内燃机。这就是荒唐的,因为内燃机的大类别就是汽油机和柴油机,共性很大,工作原理都一样。

1956 年 10 月下旬,我国向苏联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谁任团长我已忘记,黄辛白同志是副团长,团队中有工科院校的一些校长、党委书记。他们回来之后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在教育系统内散发。黄辛白同志回来之后做了补充说明,值得重视的一点是当时苏联的部门办学有重要的历史原因,即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之前,就发现原有高等教育系统无法满足激增的人才需求,不得不采用由各部门各自办学的体制,在这种背景下,压缩学制且划分专业过细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这也与僵化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关。后来,苏联专业划分过细的情况逐渐有所调整,例如 1955 年就对土建类学科进行调整。我是学土木专业的,对土木建筑方面了解多一点,苏联那时候的相关专业叫公用与民用建筑结构和公用与民用建筑施工,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结构和施工就分成两个专业。按原来的指导思想,结构专业就是理论的东西学得好一些,数学、力学等理论的科目扎实一些;施工专业就是在工地上指挥技术人员和工人建成建筑物。我们向苏联学习的时候,苏联分开的我们也分开,苏联合并了的专业我们也紧跟着合并。专业划分过细使学生负担过重,教师也苦不堪言,毕业生学非所用的比例相当高。那时候,教师学俄文也有很大的困难。速成俄文学习课程几乎是当时所有教师都要参加的。在普通教育方面,学习苏联有两

个过失值得一提。第一个是率先学习苏联的我国东北地区曾经把苏联 10 年制学校教材翻译过来并不加任何更动便加以采用,此举遭到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1906-1996 年)的批评,这是因为我国“6-3-3 学制”的实施过程中,高中要学解析几何和大代数,学习苏联后降低了难度,而且生物课程由于两国地理气候条件相差很大,采用苏联教材就不太合适。第二个是外语教育废除英语,只教俄语。

值得一提的是统一教学计划,我们学苏联后,照搬其全套的教学计划,以为苏联全国通用。隔了几年我们才清楚,苏联并不是所有学校都用,还有几个精英学校是五年半制,如列宁格勒工学院、莫斯科国立鲍曼工学院、莫洛托夫动力学院等,我们却盲目实行统一教学计划。苏联一般高等学校实行五年制(中小学先是十年制,后来延长为十一年制),对于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每周安排课时过多、专业划分过细、学生负担过重等弊端,时常有人在苏联官方的教育刊物《高等教育通报》著文提及。我们把本已负担过重的五年制教学计划再压缩为四年完成,这种“压缩饼干”必然难以消化。我们的高等教育规模也在扩张,教师培养跟不上,精通俄文的人数又有限,于是请了一些苏联专家来讲课,我们的教师照猫画虎,学点俄文,现学现卖。学苏联的初期,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也影响了学生身心健康。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专业划分过细问题,我们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才渐渐解决掉。可见,任何一项重要改革都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

苏联教育对中国也有好的影响,比如说工科教育就得大于失。苏联的工科专业学生学业结业时要有毕业设计,理科要有毕业论文(解放前,中国的大学也要求学生在四年级做论文,但工科多流于形式,理论联系实际很差)。工科搞毕业设计不是苏联的发明,其更

多是受德国模式的影响。工科教育当然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必须要求学生在学期间有几次生产实习。清华大学原校长蒋南翔主持工作的时候,提倡真刀真枪地进行毕业设计,问题从实际中来,设计方案要有参考价值。这种模式对促进工科教育的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工业部门的合作,都是积极的推动因素。清华大学土木系和水利系毕业班学生在大跃进年代曾经承担了设计密云水库拦水坝的艰巨任务,而且完成得就很好。

六、借鉴他国经验:从国情出发,择善而从

对于其他国家的经验,我们择善而从就可以少吃亏。我觉得很多现实问题有待于教育行政部门和学者们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因地制宜。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地区差异和城乡差距如此之大,都按相同的标准是不对的。

日本人在 1868 年明治维新之后,对教育和科学非常重视。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就派了一批人去美国、欧洲,了解各个国家有什么长处,以便回国提出建议。日本义务教育刚开始的时候定的标准也不高。1886 年的《小学校令》规定 4 年初小(称寻常小学)为义务教育,高小也为 4 年。1900 年颁布的《改正小学校令》仍规定实施 4 年义务教育。1907 年才把义务教育延长为 6 年,1920 年入学率达到了 99%。日本在相对比较贫穷的时候,就决定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来尽量缩小经济状况不同学区基础设施的差距,贫穷地区的学校也不是很差。日本的公办中小学校的硬件设施比较好,没有造成不同地区、学区之间的基础教育水平差异太大。日本的教育法明确规定,城市和乡村的学校执行相同的教师工资标准。

在日本的教育统计里,有一个数据是出勤率(attendance rate),规定每个学年的上课天数必须超过 200 天。可见,不光是学年初的入学

率(enrollment rate),日本人对出勤率也很重视,而我们的教育统计只有入学率。义务教育的英文名称是“compulsory education”,“compulsory”直译过来的意思是“强迫”。也就是说,学龄儿童的家长必须让他们的子女上学,否则就是违法行为。提供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的学校,多以公办为主,政府有义务为这些公办学校提供财政支持。对学龄儿童不去上学等问题,日本人也是认真对待的,而当时中国的农村地区和流动儿童聚集地区还难以做到。发达国家中,美国也没完全做到。在美国,有很多人虽然完成了中学教育,仍然有不少人仅能看得懂浅显的内容,但是看不明白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规则条例,这种群体叫功能性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cy)。至今,美国仍然有大量的功能性文盲,欧洲在这方面的情况要好得多。

教育部原副部长张文松(1919-2011 年)曾经责成我把明治维新初期的教育状况整理出一份材料。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细节已淡忘,但在整理过程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日本在国力还不是很强的时候就很重视基础教育,对在街头流浪的学龄儿童,警察是要过问的。1983 年,我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后顺访各级学校,发现日本的小学很重视体育,很多学校有游泳池,操场也比较大。

每个国家在发展教育时都要考虑到自己的情况。新西兰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岛国,据我所知,那里仍然存在一些规模很小的学校。在一些父母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家庭,一些孩子靠网络、电视等远程教育的方式接受基础教育。

七、教育问题是永恒的问题, 教育改革不能孤立起来考虑

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可以说是永恒的话题,只要人类存在,它就存在。我想对这些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学前教育阶段,我觉得要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对民办学校给予适当资助,以便使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入园。等到将来国家的财力更充裕,能够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时候,我倾向于向学前教育阶段延伸义务教育。

在义务教育阶段,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在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差异会造成教育不公平。现任部长袁贵仁同志在刚到教育部担任副部长时就曾呼吁大家关注这个问题。过去,我们曾批评西方的双轨制教育,而中国的重点学校(key school)制度也是造成“择校热”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一直以来,我们把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当作对外宣传的窗口,唯恐重点学校还不够好。少数学校有游泳池、天文馆,但不可能每个学校都有这些,国家的财力承受不起。我第一次去美国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演讲,介绍了当时中国各级教育状况。我当时就表示,不赞成中国在义务教育阶段搞学校建设两极分化,不赞成重点学校,因为这会造成教育不公平。第二个问题是学校规模不宜太大。中学不能规模太大,小学更不应该太大,学生就近入学,安全才有保障。中学校长应该尽可能认识所有的教师,教师人数太多,校长就不可能跟所有教师有密切的交流,更谈不到跟学生有密切的交流。目前,全国还有一些超级中学。早已闻名的湖北黄冈中学和近几年崛起的河北衡水中学都已成为旨在向全国重点学校输送毕业生的超级学校,在校生数以万计。令我更为惊讶的是安徽六安的毛坦厂中学。该校以从全国各地招收复读生闻名,据说不少学生复读1年可以提高100多分,从而吸引了很多复读生和他们的家长,成为地方的重要经济支柱。第三个是择校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2014年2月,北京市宣布对中考进行改革,在这方面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在农村

的小学标准化建设方面,从东部经济较好的地区逐渐过渡到西部,如果地方财力做不到,可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由各省统筹。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比较快,教授、博士生导师很多,但是否都能胜任值得怀疑。早期,德国和法国对教授的要求很高,教师很难当上教授。德国还有无薪讲师(Privatdozent,也可译为编外讲师),无薪讲师没有国家编制,没有正式工资,靠讲课费过日子。勤于治学的无薪讲师曾经是合格教授的重要来源。这种制度现在已经衰退了,但也表明这几个国家对教授各方面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德国大学生原来也真正是在“游学”,大学本科就可以转学,读博士学位时几乎毫无例外地要转到其他大学。现在,这些都弱化了。这些都是曾经使19世纪的德国成为学术中心的重要因素。19世纪的德国大学学术传统的树立要归功于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他不仅是语言学家、哲学家、外交家,还是一名出色的教育改革家。他在1809年担任普鲁士王国的教育部长,是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建者。他在大学教育方面力主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教师享有教学自由,学生享有学习自由。洪堡对初等教育改革的影响主要是在提高教师培训和认证的标准方面。同时,他对高级中学(Gymnasium)的改革也有贡献。虽然他当部长的时间很短,但影响很大。19世纪后半叶,去德国留学的美国人很多。1876年建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是全面引进德国模式的一所大学。西方国家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的步伐有的快,有的慢,采取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以后,洪堡的理念还管用不管用,是有很多争议的。我个人认为,他的理念对办好研究型大学还是很重要的。当然,时过境迁,不论在德国本土或是其他的西方国家,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产

业升级转型愈发重要。当今,“互联网+”已进入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创业”也成为流行词语。在这一背景下,教育领域的改革必须及时跟上。大学教育所设学科日趋专门化,社会经济发展对法律、医学之外的工商企业管理等专门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大学教育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满足相关的需求。当然,不能因为有这些变化就否定洪堡的大学理念中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即研究与教学的统一。这个问题牵扯到科研体制问题,各个国家都有大学之外的研究机构。以美国为例,其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成立于1958年,与苏联在1957年成功发射人造卫星事件有关。NASA拥有直属的研究机构,也有委托大学代管的机构,如“喷气推进实验室”就由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代管。其第一任主任是国际公认的航空航天领域的大师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1881-1963年),而他的高足、我国导弹研发和航空航天事业先驱钱学森则是第二任主任。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美国国防部与有关大学签订合同,由大学负责运营的国家实验室(FRDCs)有19个之多。而美国生物医学研究的主要支柱国立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NIH)虽然拥有10多个生物医学领域相对独立的研究所,但其大部分经费是用来资助大学和医学院的科研工作的。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值得中国借鉴的。

中国在解放后的教育发展情况需要深入研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更坦诚地面对缺点和错误,从中吸取教训。

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国家财政的保证。2014年,政府兑现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的目标。对教育的重视不应该挂在嘴上,这需要政策的具体落实。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写进教育规划纲要的很多目标还都是美好的愿景,需要扎扎实实地采取有效措施才能实现。

八、加深对科研的理解 是推动科研发展的基础

最近,我又看了有关前苏联的出版物,顺便讲讲苏联科研机构发展的历史。中国和前苏联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国家在建国初期都是穷困的,做不到给大学充裕的经费,这个问题不但在前苏联建国初期没有得到解决,以后很长时期内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前苏联科研体制的特点是科学院占据龙头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这一体制是沙俄时代的遗产。1697年,彼得一世(亦称彼得大帝)派约250人的“彼得大使团”赴西欧各国考察,期间他拜访了法国、英格兰、普鲁士的科学院,并决定在俄国建立类似机构。经过20多年的酝酿,圣彼得堡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的前身)于1724年成立,兼具科研、教学两种功能。在科学院发展初期,来自德国、法国、瑞士等国的学者居于主导地位。在该院任职的客卿众多,我只举两位人们耳熟能详的大科学家为例。一位是被称为18世纪数学大师的欧拉(Leonhard Euler)。他于1727年到圣彼得堡科学院任职,1741年到柏林科学院,1766年又回到圣彼得堡科学院,直到去世。另一位是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他出自人才辈出的伯努利家族。他在学术界成名后,于1725-1732年间应聘到圣彼得堡科学院讲学,涉足医学、力学、物理等领域,并对振动和旋转物体的性质进行了研究。与科学院成立较早相对照,在罗莫索夫建议下成立的莫斯科大学建校时间为1755年,迟于科学院31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苏联高等教育部和各大学不断呼吁,但高等教育的发展仍然很慢。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还是保证了重点高等学校的高科研水平,像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莫斯科国立鲍曼工学院等。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作为建国初期的科学政策的见证人,

我有机会作为科技干部列席参加科学院和教育部的党组联席会,并且参加过两次。教育部希望科学院和大学能够更好地合作,但有的问题不是双方口头谈谈就能解决的,需要资金支持,没有科研经费的话就很难办。最初期参加双方的党组联席会时,我就意识到这种矛盾不易解决。20 世纪 50 年代,教育部和科学院在很多问题上分歧,教育部觉得科学院获得的科研经费拨款太高了。后来,聂荣臻(1899-1992 年)就说,“科学院是火车头”“高等学校是一个方面军”。聂老总定下了科学院的“火车头”地位,高等学校就安心做一个“方面军”,但经费问题并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由于矛盾相当尖锐,武衡在其著作中曾称之为“二黄一张之争”(“二黄”指黄松龄和黄敬,“一张”指张稼夫)。我清楚地记得黄松龄曾邀请黄敬到教育部做过一次演讲,黄敬借助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H. G. Wells)的《世界史纲》一书中的论述,强调了大学既是培养高级人才的中心,也是科学研究的中心这样一种理念。后来,聂荣臻同志责成范长江同志(1909-1970 年)提出解决方案。我和沈友益同志参加了有关工作,编印了几期调研简报上报给有关部门领导。范长江后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作了一个“反右倾,鼓干劲,把高等学校科研搞上去”应景文章式的报告,未能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

我个人认为,我国已经形成的科研体制应当向提高大学地位、作用这个方向调整,这主要适用于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大型企业应当成为新设备、新工艺的研发主体。“产、学、研”三方面应努力加强合作,尽量实现资源共享,摆脱本位主义的羁绊。在研究生的培养方面,大学应当起主导作用。我国的各类研究院有权培养研究生,但也应加强与相关大学的合作。

改革开放初期,我任教育部科技局副局长

的时候,曾参加南京大学地质系组织的有关花岗岩的国际会议。那时候,中国做东道主并能够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展示给外国同行的国际会议还非常少。南京大学地质系的实力是比较强的,我在那儿开会并且和教授们座谈,他们就提出没有充裕的政府对科研的资金支持,是大学进行基础研究的最大障碍。

当然,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为获取政府的科研经费资助,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学校支配经费的自主权,实施开支经费的问责制(accountability)。世界各国的大学为了获取科研经费,为了新设或加强某些科系,不得不采用种种办法创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教育知名教授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在 2004 年出版的《大学的持续变革》(*Sustaining Change in Universities*)(该书由英国高等教育研究会(SRHE)和开放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一书就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该书探讨了欧洲、美洲乃至亚洲许多大学的案例。同理,我国的大学同样面临如何创收以保证学校的可持续发展的健康发展的难题,这方面的国际经验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中国的科研经费的申请体制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像美国的同行评议制(peer review)就值得学习。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会有一个很庞大的专家名单,如果有人申请科研课题,他们就从有关的学科随机抽取若干专家,通过同行评议审查研究方案,得出是否可取的结论,并确定支持金额。

我国各工业部门大多设有中央一级的设计院和研究院,但对基层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重视不够。这个体制的形成也是受苏联的影响,误以为有中央一级的研究院就能够有效地满足基层众多企业的研发和创新需求。过去,国有企业在经费配置上几乎无自主权,盈利全部上交,管理部门再根据他们的判断下拨次一

年的经费。在西方国家,大型企业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其开支的比重很可观。越是在创新方面要求高的企业,这个比重就越大。中小型企业无力进行自主研发,则可以按行业来建立为他们服务的研究机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有 30 余年,科技创新也有可喜的成果,但是发展很不平衡。片面追求“短、平、快”,对技术创新的艰辛和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最后转化为在国内外市场有竞争力的商品所需要付出的人力、财力、物力大都估计不足。有不少人曾幻想以市场换技术,实践证明行不通。国外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不会对中国那么仁慈。

苏联在研究与开发上投入的人力远比美国大,但其成果却相对低得多。在不需要昂贵实验设备的学科领域,如数学和理论物理,苏联拥有不少世界一流学者。但是,在需要昂贵的和先进技术设备的学科和技术领域,苏联只有军工、航天部门尚可与美国抗衡。苏联在 1957 年 10 月 4 日成功发射人造卫星,深深地刺痛了美国政府和军方,以及科学、教育界人士,奋起直追。在教育方面,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即是明证。美国科学、教育界为提高中学的科学教育水平,组织一批学者撰写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的新教材。教育部情报资料室也采购了当时美国大部分新教材。在生物学领域,美国有三种教材,分别以进化论、生态学、遗传学为主线。由于美国公立学校师资水平偏低,多数教师不能胜任这些新教材的教学,而收费高昂的私立中学则可以聘任合格的教师。可见,相对于教材质量,师资水平的重要性更高。近年,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评比中,虽然上海的成绩很突出,但就国与国之间进行比较而言,北欧的芬兰领先,其主要得益于芬兰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高,薪酬也高。前苏联师资水平较高,学生成绩总体上优于美国,但贫困、落后地区的学校就很难说了。

在高等教育阶段,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数量远多于前苏联,优秀教师和他们培养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和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年轻学者在创新能力上表现突出。像斯坦福大学所在的硅谷、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所在的 128 号公路等地区,大学科研工作与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领先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的成效举世公认。美苏冷战时期,我参加了 1956 年开始制订《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工作。在我担任教育部驻西苑大旅社联络员期间,就听到苏联科学院的潘诺夫院士曾向我方部分工作人员讲了为加快培养国防尖端技术人才,苏联政府接受以卡皮察院士(1894-1984 年)为首的一批顶尖科学家的建议,在莫斯科远郊区成立了两所特种学校——培养核能技术人才的工程物理学院,培养导弹、航天人才的物理技术学院。潘诺夫身兼二职,既是苏联科学技术情报所副所长,又是物理技术学院副院长。他概括了这两所学校的五个特点。第一,招生着眼于网罗全国的尖子,全年进行,不受高考制度的限制。第二,学校基础课由高水平的教授讲授。第三,提倡学生尽早参加科学研究工作。第四,毕业论文的题目属于科技前沿,在与相关系科有密切联系的研究所中进行,水平高的毕业论文接近副博士论文水平。第五,学习成绩欠佳的学生要被淘汰,但仍可以转入档次相当高的大学继续学习。前苏联在新西伯利亚市的科学城建立的新西伯利亚大学的办学方式与这两所特种学校颇为相近。这两所学校仍然存在,而且在世界物理学领域方面享有盛誉。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现改称国家核科技研究大学,在《泰晤士高等教育》的 2014 年物理学领域专科学院排名中位居第 74 位;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名称不变,在物理学领域专科学院排名中位居第 63 位。

(下转第 17 页)

• 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上)

编者按: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当今世界已成为一个发展的有机整体,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所著《世界是平的:21 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所述的那样,世界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科技和通信领域如闪电般迅速的进步,使全世界的人们可以空前地彼此接近。在这种巨大的影响下,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也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变革与创新不断刷新着传统高等教育的面貌。为呈现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本刊特策划“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专题,以飨读者。

大学进入全球伙伴关系的新时代

文/[葡]曼努埃尔·赫特 编译/高桂娟

一、国际背景下的大学、产业与政府的关系

基于知识型社会的社会建构动力使得创新活动越来越趋于全球化。创新已经超越了国家创新体系层面,日益被卷入国际事务范围,并使得各国形成了一种全球伙伴关系。从以下展示的“大学-产业-政府”三个维度的变化,可以清晰地了解这种全球化现象。

(一)超越国家的创新体系

创新的中心轨迹日益呈分散式发展,也日益依赖于全球范围内不同机构与各类资源的联系。首先,跨国的商贸、技术与科学活动要求从国内政策向新的国际合作政策框架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大型的国际合作制度安排已初露端倪。其次,虽然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部门(比如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仍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与其他组织或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同样重要。值得提出的是,与科学技术发展直接相关的新技术公司正在崛起,其作用日益明显,且呈全球化趋势。这就要求政府加强科技政策制定以

及增加研究与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投资,建立多种公共和私人机构合作模式,并激发全球研究网络注重社会经济的弹性以及主动学习的机制。上述这些都是高新技术以及知识型环境下的主要特征,那么,在此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如何处理如下的关系:公司的全球化,合作与竞争的相互影响。实际上,已有相关先例出现,如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展的项目已明确显示出,造成三者紧张关系的原因大致来源于三个方面——跨国的外溢效应、国家主权受损和政治主权受到挑战。

(二)世界层面的“学术划分”(academic divide)

传统观点认为,科学是以情景为载体传播的,知识的传播是一种加工处理的过程。因此,创新需要强调“全纳性”的学习。换句话说,全世界任何地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当然,持续地学习他人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也是必要的。正是在这

作者简介:曼努埃尔·赫特(Manuel Heitor),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教授

译者简介:高桂娟,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里瑟琦智库高级咨询顾问

一思想的影响下,在思考创新体系的动力时,三螺旋理论把创新的动力理解为“大学-产业-政府”三者的集合体。但现在的实际状况是,全世界许多地区的大学正在进行国际化运作,不仅努力吸引潜在的学生个体(这是传统的范型),而且日益注重与国外的大学、国外的地方当局和政府建立联系,以进行新的机构设置和制度安排,具体包括帮助他国建立、监控与评估新兴机构,传授组织管理技能,为教师和研究者开办培训课程。这些都为国外的高等教育与研究的能力的提高作出了贡献,也为国外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大学不再封闭于一国的“大学-产业-政府”这样的体系之中,而是一种需要我们注意的新的关系形态——“大学-国外的大学-国外的地方当局和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大批青年为了获得高质量文凭,涌入国外的大学,同时期待留在发达国家进行工作和研究。

(三)知识型社会的社会建构动力

以全球的视野更加深入地认识社会的知识与发展的关系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有研究者提出用“学习经济”替代“知识经济”,二者本质的不同在于对社会动力机制的认识不同。“学习经济”的提出旨在强调,有的知识重要,有的已经不那么重要。那么,我们就不能单纯地只看知识的积累,而要思考知识的学习过程——既是创造也是建构。“学习经济”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最近几年,全世界领先的学者和有远见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进行实践。最近,这种实践不仅仅开展于欧洲,也成为中国、印度和巴西的热点。譬如,印度的科技部前任部长、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现任主席梅农(Meno)最近呼吁,为了科技的繁荣,需要采取“共同体化”的特别行动。无独有偶,麻省理工学院知名教授埃里克·冯·希普尔(Eric von Hippel)依据美国经验提出,“以用户为中心的

创新”已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包括公司与个人两种消费者)正日益具备依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自主创新的能力,并且显而易见,由于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种创新还在突飞猛进。在许多领域,“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正成为“以制造商为中心的创新”的竞争对手。埃里克·冯·希普尔还指出了在信息产品应用中的“民主化创新”现象,换句话说,网络无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民主化创新”超越了基础设施,要求人们参与到以知识为基础的网络中去。所有这些新的创新形式的出现,都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转换视角。一条可供参考的途径是,与其像当前这样过度强调部门、行业之间的竞争以及竞争性战略,不如以强有力的合作来重新认识科学、教育与创新的政策。

二、大学全球伙伴关系的真实图景

大学和产业的国际化合作正在形成,并由此将社会发展推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大学国际化已经是许多国家在国际层面激发创新性组织进行整合的途径。

许多案例显示,从加强学生的国际流动到知识整合型社区建设,是大学全球伙伴关系演进的轨迹。

(一)“欧洲模式”的大学全球伙伴关系:强调通过大学网络来提升学生的国际流动性

这种伙伴关系主要是在欧洲内,在最高的国际化水准下加强大学之间的联系,由此发生的主要变化是使年青一代具备国际化意识,培养他们的创业意识(见表1)。

(二)新兴的面向新经济形态的大学伙伴关系:基于知识整合的组织化合作

这种合作关系虽然也会牵涉到人员的流动,但更是一种在知识工作者之间产生的有组织合作(见表2)。

表 1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欧盟高校合作典型案例

| 案例 | 简介 |
|--|---|
| 1980 年推出的乌得勒支网络 (Utrecht Network) | 该网络由欧洲 29 个国家的 39 所大学组成,进行国家层面的合作,主要包括教师和学生的流动、暑期学校、课程国际化、联合课程和双(联合)学位(主要是硕士学位)等。 |
| 1990 年推出的集群网络 (Cluster Network) | 由 13 所研究型大学组成的学术社区,强调工程、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合作,以及高水平教育的合作,即联合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
| 1997 年建立的 U21 联盟 (Universitas 21) | 肇始于 1997 年的墨尔本,U21 已经发展成为由 24 所研究型大学组成的学术社区,就教师与学生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合作,旨在形成一个合作研究的框架,包括为本科生提供研究机会以及联合博士学位。 |
| 1999 年发起的 IDEA 联盟 (IDEA League) | 由 5 个领先的欧洲技术大学组成的战略性联盟,1999 年 10 月发起,实施了一个专门的学生资助计划,该资助面向所有层次的学生,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此外,还运行了一个联合硕士项目,正在建立一个联合博士学院。 |
| 2008 年创立的欧洲创新与技术学院(European Institute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EIT) | 由欧盟委员会自上而下发起的增强欧洲创新的计划。就下列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议题,将高等教育、研究以及企业机构彼此联系起来:减缓气候变化、信息通信技术、可持续能源。 |

表 2 2000 年后在全球层面形成的大学、政府与产业的集体体

| 案例 | 简介 |
|--|---|
| 2004 年创建的迪拜英国大学 (British University of Dubai) | 由 5 所英国大学组成,旨在推进中东地区一流的教育、培训与研究。基于中东地区的名列前茅的、以研究为基础的、提供研究生教育的大学,形成专门的机构,每所机构都有一所英国的大学作为领导性伙伴。每所机构基于其卓越的科研与教学形成独特的学科。 |
| 2006 年创建的葡萄牙-美国大学 (Portugal-US Universities) | 由葡萄牙的科学和技术基金会创办,旨在于葡萄牙大学中形成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和高水平的教育的主题式网络。美国大学引领并作为该网络的推动者,进行必要的领导,并保证该网络成功和投入运作。该系统向所有的葡萄牙大学持续性开放,参与此行动的美国大学有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 |
| 2010 年发起的中国-丹麦教育与研究中心(Sino-Danish Center for Educ. & Res.) | 这个教育与研究合作中心的组成单位包括:8 所丹麦的大学,丹麦科学、技术和创新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该中心坐落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雁栖湖校区,2013 年 3 月全部完工。中心有来自两国的 100 名研究人员,并提供 300 名学生的硕士学位项目和 75 名学生的博士学位项目。 |
| 2011 年创办的松岛全球大学区 (Songdo Global Univ. Campus) | 韩国松岛全球大学的目标是使 10 所不同的国外大学在同一个校园运作。该校园正在建设中,选址于仁川自由经济区,旨在成为教育和高科技中心。 |

编辑 郭伟 校对 许方舟

(上接第 14 页)

苏联这种办学模式对我国由中国科学院兴办的中国科技大学有直接的影响(该校设在北京时,各院系与中科院在京相关研究所合作比较便利,学校迁到合肥后就比较困难了,好在在京设有研究生部)。1957 年 10 月至 1958 年 1 月,中国科学院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了苏联。代表团参观了新建的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与几乎同时建立的新西伯利亚大学。代表团回国后,中科院党组于 1958 年 5 月向聂荣臻和中宣部呈交了欲创办中国科技大学的请示报告,得到了周恩来与聂荣臻等同志的赞许。当年 6 月 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创办中国科技大学。

此外,在教育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民间组织应该对这些问题开展独立调查,提出意见,才能

成为真正强有力的社会推动力。每年召开的两会,代表们在这方面的发声是相当强烈的,人才、科学、教育等方面的纲要都不是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实现这些纲要需要各方面资源的保障。

现阶段,尽管我国 GDP 总量已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我国工业成就很大一部分仍然是依靠低廉的劳动成本、过度的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和牺牲环境的巨大代价之下取得的,利润的很大部分仍然属于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这种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是必然的。制订真正符合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应该是第一要义)的工业发展与调整政策就必须下大力气,如应该随着国力的提升和人们认识的提高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出现一流科研成果和一流学术精英。

编辑 郭伟 校对 许方舟

• 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上)

跨国高等教育的全球治理

——质量保障与认证的视角

文 / 王 铄

摘 要: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跨国高等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表现形式和重要措施之一,经历了快速多样的发展历程,已经具备了相当可观的规模。但是,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和潜在风险同样为全球的学习者所担忧,也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带来了诸多挑战。因此,开展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是当下高等教育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

关键词:全球治理;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认证

自上世纪末开始,不断加速的全球化浪潮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和主要影响因素。伴随国际竞争的加剧、新公共管理主义的盛行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全球竞争与合作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著趋势。为应对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各国纷纷提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

一、全球化时代的跨国高等教育发展图景及面临的质量风险

(一)跨国高等教育的概念界定

作为教育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高等教育是留学教育的补充和延伸。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跨国高等教育迎来了高速发展的 30 年。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对跨国高等教育给予了密切关注和集中研究。全球跨国教育联盟(GATE)将跨国教育界定为“在任何形式的教学或学习活动中,学生所在的国家与为他们提供教育的国家不是一个国家。这种情况下,要求教学信息、教学人员和教学材料跨越国界”^[1]。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欧洲委员会(COE)联合制定的《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指南》(*Guidelines for Quality Provision in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中提出,“跨国教育包括所有类型和模式的高等教育传输项目系列课程或教育服务(包括远程教育),接受教育的学生和提供教育的机构不在同一个国家。这些项目是某个国家的教育系统的一部分,而在另一个不同的国家运行,或者独立于任何国家教育系统进行运作”^[2]。此外,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构联合会(INQAAHE)以及中国、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德国等国家的教育主管部门和相关组织机构分别提出了跨国教育定义,跨国教育概念的内涵日益丰富、外延不断扩大,这也体现了跨国教育迅猛的发展势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国界”和“流动”是跨国教育概念的核心要素。国界是跨国教育存在的基本前提;流动是跨国教育实施的实际过程,包括教育项目、机构、人员的流动。在本文中,跨国高等教育是指教育输出国将项目、机构、计划、人员、

作者单位:王铄,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课程等教育资源输送到接收国,在接收国开展教育活动的教育形态和教育过程。

(二) 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

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不断加深,不但促进各国在教育事业发展上谋求深入合作,更为各国的教育合作和服务贸易铺平了道路,这一点在高等教育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跨国高等教育如今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仅有部分国家统计本国(作为输出国或接收国)的跨国教育发展情况,而且各国的统计方法各有侧重,所以全球跨国高等教育的全貌尚无从获得。然而,从几个主要的输出国和地区(见表 1)以及接收国和地区(见表 2)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估计和判断。

表 1 英国、澳大利亚、德国作为输出国的
跨国高等教育数据统计^[3]

| 国家 | 统计机构 | 年度(份) | 跨国教育数据 |
|------|----------------|-----------|--|
| 英国 | 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 | 2011-2012 | 1395 个跨国教育项目;73 所海外分校;454473 名跨国教育学生入学(不包括远程教育学生)。 |
| 澳大利亚 | 国际教育协会(AEI) | 2011-2012 | 与接收国 140 所院校合作开办 394 个跨国教育项目;80458 名跨国教育学生入学(不包括远程教育学生)。 |
| 德国 | 学术交流服务中心(DAAD) | 2012 | 200 个双学位/联合学位项目;2 所海外分校;约 2 万名跨国教育学生入学。 |

(三) 跨国高等教育面临的质量风险

以上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跨国教育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由于缺乏监管和权威信息,跨国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的背后却隐藏着严重的质量危机。第一,随着跨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和类型的日益多样,在数以万计的项目和提供者中夹杂着一定数量的“文凭工厂”,这些“文凭工厂”一般以营利为目的,有可能向学生授予未经认可的文凭,给学生和雇主造成

表 2 中国内地、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毛里求斯、泰国、越南
作为接收国的跨国教育数据统计^[4]

| 国家 | 统计机构 | 年份 | 跨国教育数据 |
|------|--|------|-------------------------|
| 中国内地 | 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 2013 | 730 个教育合作项目;55 个教育合作机构。 |
| 中国香港 | 教育局(Education Bureau) | 2013 | 1133 跨国教育项目。 |
| 马来西亚 | 学术资格鉴定机构(The Official Portal of 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 | 2012 | 563 个跨国教育项目;8 所外国高校分校。 |
| 毛里求斯 | 高等教育委员会(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 | 2013 | 254 个跨国教育项目。 |
| 泰国 | 高等教育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Commission) | 2011 | 128 个联合学位项目。 |
| 越南 | 教育和培训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 2011 | 179 个跨国教育项目。 |

损失。第二,跨国教育的发展态势客观上反映了对跨国教育项目、计划的巨大需求和潜在市场,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势必将刺激更多的教育提供者投身跨国教育市场。巨大需求和经济利益极有可能带来跨国教育项目、计划的质量滑坡。第三,面对数量庞大的跨国教育提供者,以及教育项目、计划等,学生需要自行辨别和选择。误导性信息的泛滥给学生选择优质跨国教育资源带来了巨大困扰。

跨国教育质量风险的存在主要是由于跨国教育提供者与学生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源于政府在跨国教育质量保障和认证上的责任不明确,大多数国家尚未建立跨国教育质量监管体系或该体系仍处于起步阶段,而且许多国家尚未将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置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之中。官方权威信息的缺失和大量误导信息的存在增加了学生选择高质量跨国教育项目的难度,也为跨国教育的健康发展制造了障碍。为了给跨国教育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保障跨国教育的健康发

展,一些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已经启动了跨国教育质量保障工作。

二、全球治理的理念 与跨国高等教育质量风险应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治理”概念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得到了很多关注,学者、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纷纷提出了关于治理的不同定义。同时,治理理念与全球化进程逐渐融合,形成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理论。

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在梳理各种关于治理的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的五维论点。第一,治理出自政府但又限于政府的一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第二,治理明确指出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存在着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之点。第三,治理明确肯定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的权力依赖。第四,治理是行为者网络的自主自治。第五,治理认定,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在于政府的权力,不在于政府下命令或运用其权威。政府可以动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控制 and 指引,而政府的能力和 responsibility 均在于此。^[5]

尽管斯托克的治理理论是从国家治理层面提出的,但其理论观点对于理解和解决全球性问题之时同样具有解释力和建设性。跨国高等教育是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体现,其潜在风险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斯托克的治理理论对此提供了适切性的理论解释。第一,各国政府应在应对跨国高等教育风险中分担治理责任,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也能够并且应该承担相应责任。第二,跨国高等教育超越国家界限,需要国家间开展合作、共同承担责任,且责任往往无法明确划分。第三,跨国高等教育不仅是国家间的教育合作,也是经济贸易合

作,仅靠教育机构的努力无法满足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需要各个社会公共机构,甚至公共机构与私营机构的相互合作。第四,针对跨国高等教育的治理应在保证各国利益、符合各国法律的框架内保证跨国高等教育提供者的自治权。第五,针对跨国高等教育的治理和风险控制应建立新的治理机制,而非借助传统的政府命令手段。总而言之,跨国高等教育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兴领域,其质量风险的应对需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开展治理合作,并且充分保障教育提供者的自治权利。

三、多层次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及认证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为了应对跨国高等教育质量风险,世界各国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和国际组织纷纷开展专题调研和改革实践,并达成了一定共识,即高等教育机构与项目的质量保障和认证、对个人获得文凭的学术认可和职业认可是保证跨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鉴于高等教育机构和项目的质量保障是跨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根本,是文凭认可(学术的/职业的)的前提,本文主要探讨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及认证的做法和经验。

(一)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高等学校和项目提供者的基本责任

高等学校和类型多样的高等教育项目与课程计划提供者是跨国高等教育最主要的责任主体,他们在跨国高等教育课程、项目、计划实施过程中的教师选派、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等方面的理念和做法直接影响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如果不能充分调动起教育机构提供高质量教育服务的积极性,任何质量控制和学生保护机制的效果都将大打折扣^[6]。在教育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

和挑战,质量是生命线的论断越发具有说服力。跨国高等教育提供者有充足的动力提供高质量的跨国高等教育,质量将成为其在未来全球性教育市场得以立足的金字招牌。

(二)跨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宏观保障:国家质量监管框架的构建

《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首次将服务贸易列入国际贸易协定,教育是 GATS 的 12 个行业部门之一。GATS 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种服务模式为跨国高等教育的人员、项目、提供者和课程计划的流动搭建了桥梁。尽管如此,质量是跨国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不仅需要跨国教育提供者提升服务水平,更需要国家层面有针对性的质量监管框架和认证机制的构建。跨国高等教育是新兴的国际服务贸易类型,需要提供国和接收国各负其责并积极合作。

1. 接收国的视角

从接收国角度来看,建立跨国高等教育质量监管框架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跨国高等教育接收国主要是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大多尚未建立完备的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少数建立了高等教育质

量保障体系的国家在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方面仍然缺乏经验。目前,跨国教育接收国的普遍做法是制定针对跨国教育活动的专门法律监管条例。

接收国的质量监管框架建立在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管理文化环境下,资源投入和监管目的同样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各接收国的跨国教育质量监管框架建设表现出不同特点,主要体现在对跨国教育提供者和项目、课程管理的严格程度上。“认证”是严格管理的主要方式,这种管理方式通过制定学术要求和其他要求来加强对跨国高等教育的管理。“许可”和“登记”制度是宽松管理的主要方式,对跨国教育提供者、项目、计划等要求较低。从各接收国和地区的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监管来看,中国大陆是监管相对严格的代表,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的监管则相对宽松(见表 3)。

2. 输出国的视角

相较于接收国,输出国一般来自教育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一般都拥有健全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但是,跨国高等教育是新生事物且发展迅猛,绝大多数输出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无法完全监管跨国高等教育,甚至不具备监管跨国高等教育的能力。由于跨国高等

表 3 中国内地、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的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监管框架比较

| | 中国大陆 | 中国香港 | 马来西亚 |
|-----------|---|--|---|
| 监管机构或监管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以下简称《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 | 《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规管)条例》(Non-Local Highe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gulation) Ordinance) | 学术资格管理局 (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 MQA) |
| 监管宗旨 | 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只允许外国教育机构以中外合作办学的形式开展跨国教育。 | 对跨国教育提出最低限度的条件要求,为消费者提供广阔的可供选择的市場空间。 | 鼓励高水平教育机构、项目、课程等进入本国高等教育领域。 |
| 管理要求 | 《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对中国合作办学机构的设立、组织与管理、教育教学、资产与财务、变更与终止、法律责任等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和要求。 | ·登记制度(Registration)是《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规管)条例》对跨国教育机构的强制性要求; ·完成登记程序的跨国教育机构可以自愿参与认证程序(Accreditation),认证并非条例规定的强制性要求,由跨国教育机构自愿向当地认证机构申请。 | ·跨国教育机构有两种可以选择的方式进入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市场:申请独立的高等教育机构许可证或与当地的教育机构合作开展跨国教育; ·跨国教育机构只要满足授予学位的最低标准并获得办学许可即可开展跨国教育活动; ·认证机构由跨国教育机构自愿选择。 |

教育项目、课程质量关乎输出国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形象,近年来各输出国以本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为基础,尝试开展针对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工作。从目前的工作进展来看,各主要输出国仍然将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作为本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的组成部分,尚未针对高等教育的输出成立专门部门或颁布专门法律法规。

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一般依托大学的自我认证或独立的非营利机构的外部认证,如英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QAA)、澳大利亚大学质量署(Australian Universities Quality Agency, AUQA)和美国类型多样的私立认证机构。

为了规范跨国高等教育发展、保证跨国教育质量,输出国各级政府以及质量保障和认证机构一般采用出台强制性的管理条例(如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的《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2000年)》(*Education Services for Overseas Students Act 2000*)或指导性的行动指南的方式,为跨国教育活动提供质量标准和指导建议。

综上所述,尽管跨国高等教育在近 20 年内得到了大幅发展,但由于国际上尚未对跨国教育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达成一致,加之各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模式千差万别,无论是输出国还是接收国均无法单方面制定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业已出台的关于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条例、法规和指南更多的是从宏观层面对跨国高等教育提供者、项目、课程等因素进行原则性规定。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跨国高等教育的规范化发展,但是很难应用到具体的跨国教育实践中。

(三)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认证的国际和区域合作

从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认证的发展来看,国家层面的质量保障和认证仍然是唯一

具有法律效力的质量保障机制,并且通常由输出国的质量保障和认证机构负责。由于跨国高等教育涉及输出国和接收国双方的教育体制和利益诉求,输出国或接收国单方面的努力都无法得到跨国教育最优化的结果,只有针对跨国高等教育开展国际乃至区域性、全球性的合作,并充分发挥相关国际组织的作用,才能既保证跨国高等教育项目的质量,又兼顾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化等多方面的需求。

1. 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认证的国际合作

一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形成了风格各异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仍有部分国家尚不具备系统化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质量保障理念和方法的差异给各国开展相关合作带来了较大障碍。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由于担心本国高等教育质量在国际比较中处于劣势地位而消极应对,甚至明确反对由来已久的建设国际性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提议。

相较于传统高等教育,针对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和认证的发展更欠成熟,只有个别国家在这方面开展了国际合作,但这种合作往往是建立在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发展不平衡基础上的,英国和美国这两个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是重要的合作对象。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与其跨国高等教育接收国的质量保障机构保持合作,向接收国推介制定质量标准和评估方法的成功经验。美国的高等教育认证机构除了为本国跨国高等教育机构和项目提供认证外,经常因其良好的声誉被邀请为其他国家的跨国高等教育机构或项目提供认证。

除了“强-弱”合作外,欧洲一些国家早在上世纪末就曾尝试建立区域性的国际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机构。1999 年,由来自比利时弗兰

德、荷兰和德国的质量保障机构合作创建了实体性的跨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机构,并且共同开发了较为成熟的质量评估方法,成立专家评审小组。北欧的丹麦和芬兰也进行过类似的尝试。

2. 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认证的区域和全球合作

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在多方面的区域合作和全球合作不断加深。在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国际合作的基础上,不同区域范围和全球性的合作日益成为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新亮点。

(1) 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国际协会

上世纪末以来,面对世界高等教育风起云涌的发展形势,世界性、区域性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会陆续成立,其成员包括接受政府资助或独立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认证机构。当前,国际性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会种类繁多、规模各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构联合会(INQAAHE)、欧洲高等教育品质保证协会(ENQA)、亚太地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APQN)、非洲质量保障机构联合会(AFQN)等。这些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会主要致力于开展关于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为成员单位的质量保障实践提供意见和建议,为成员单位提供沟通和交流平台。随着跨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评估办法及相关政策问题已经成为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会的重要议题。

(2) 联合制定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指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制定的《跨境高等教育质量指南》的前言明确提出,该指南的宗旨是保护学生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免受低质量的跨国教育项目和声誉恶劣的教育机构的影响,保持跨境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从而不断满足人们的社会、

经济和文化需求。基于相同的目的和宗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亚太地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共同开发了《跨境教育规范管理框架的工具包》,欧洲高等教育品质保证协会制定了《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Quality Assurance in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制定了《跨境高等教育:能力建设的道路》。这些行动指南和发展报告总结了全球跨国高等教育的最新发展情况,为各国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认证标准、方法的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有助于增进国际和区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合作。

参考文献:

- [1]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Quality Agency (2011). Quality Assurance of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The Experiences of Australia and India[EB/OL]. http://www.auqa.edu.au/files/otherpublications/quality_assurance_of_transnational_higher_education_the_experiences_of_australia_and_india.pdf; 4, 2014-10-19.
- [2] UNESCO. Guidelines for Quality Provision in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EB/OL].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guidelines_E.indd.pdf; 7, 2014-10-21.
- [3] [4] British Council.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The Evolution of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Data, Definitions, Opportunities and Impacts Analysis [EB/OL].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sites/british-council.uk2/files/the_shape_of_things_to_come_2.pdf; 16, 17, 2014-11-01.
- [5] 格里·斯托克. 作为理论的治理: 五个论点[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1999(1): 20-21.
- [6] OECD. Quality and Recogni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Cross-Border Challenge[EB/OL]. http://biblioteca.esec.pt/cdi/ebooks/docs/Quality_higher_educ.pdf; 27, 2014-11-07.

编辑 郭伟 校对 许方舟

德国高等教育改革及新变化

文 / 王志强

一、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三重理由

综观过去几年德国的高校改革,人们不难发现,近 10 年促使德国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动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全球化和由此带来的教育国际化进程;以创造共同高校空间和欧洲教育一体化为目标的“博洛尼亚进程”;德国统一所致的教育模式趋同化。

(一)国际层面的挑战: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进程

全球化进程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也涉及教育领域,由此带来的教育国际化和在国际层面对教育资源的激烈竞争,对迄今为止在国家层面上行之有效的德国教育模式和国家教育管理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并以各种不同方式促使其进行改革。教育国际化也使在国际层面对未来精英人力资源的竞争不断加剧。全球化使德国的科研体系和高校格局面临新的挑战。为此,德国政府和高校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倡议,使高校体制更加适应新的国际化要求。这些改革新举措的推出在很多方面改变了德国大学的办学方式和治理模式,如引入以学士和硕士为主的二级学位制、允许征收(一定比例的)学费、进行选拔考试、设立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加强高校和高校外科研机构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些改革的目标是使德国在越来越激烈

的国际竞争中重新获得教育和科研领域的领导地位,并能吸引世界各地年轻人赴德国留学,将高等教育国际化推向更高的层次。目前,德国高校约有 25 万名外国学生,德国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最重要的留学生接收国之一。

(二)欧洲层面的挑战:欧洲教育一体化和博洛尼亚进程的实施

除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进程对德国高校的影响外,在欧洲层面,以教育一体化为目标的“博洛尼亚进程”是使德国进行高校改革的又一重要动因。1999 年,29 个欧洲国家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提出了“博洛尼亚进程”。这一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计划为欧洲范围内高等教育系统确定了共同框架,其目的是进一步扩大欧洲高等教育在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如同 1999 年欧洲国家签订的《博洛尼亚宣言》所规定的,到 2010 年为止,建立共同的欧洲高校区域空间。传统上,德国高等教育只有硕士、博士二级学位体系,学士毕业类似于“中期考试”。在欧洲层面实施“博洛尼亚进程”意味着德国要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其目标是,将大学学制由二级学位制转向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并引进全欧洲认可的学分制,这一转向和两者之间的兼容过程给德国高等教育体制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欧盟通过高校改革提升欧洲国家高校之间的兼容性,这一强制性高校改革改变

作者简介:王志强,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导,上外欧盟研究中心项目组成员

了德国迄今为止行之有效的大学办学方式。德国大学学制、课堂形式、教育治理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欧盟层面,促进高校教育流动、提升国际竞争力和提高就业能力是“博洛尼亚进程”的三个主要目标。其中,最基本的目标包括建立较容易理解和具有可比性的学位体系,将德国原先的硕士学位体系改为含有学士制和本、硕连读制的二级学位体系,采用学分制和欧洲学分转换体制(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 ECTS),消除学生流动障碍,促进高等教育间的流动和兼容。这种流动不仅包括区域流动,也包括文化能力、高校、学科之间的交流,促进欧洲在教育质量提升方面的合作。同时,藉此在欧洲范围内扩大高校培训范围,重视终身学习,提高学生的高校参与权和决策权,促进欧洲高校区域空间的吸引力,使欧洲高校和欧洲研究进一步结合,特别重要的是将博士学习阶段融入“博洛尼亚进程”。

(三)国家层面的挑战:德国统一所致的教育体制趋同化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德国的统一,联邦德国的中小学和高等教育体制模式也进入新联邦州,即德国东部地区。因此,在新联邦州出现大学模式转型现象。除了政治体制一体化外,统一后的德国在东部地区完成了教育和高校体制趋同化。这也导致了德国高等教育机构及教育行为体职能和任务的变化。

二、高校改革及其结果

上文所述的引发德国高校改革的三大动因,从不同层面使迄今为止在国家层面行之有效的德国教育模式和教育治理面临挑战。由此,教育改革,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为使德国更好地适应在全球化和欧盟教育政策背景下的教育发展新特点,在 21 世纪来临

之际,德国已在不同层面达成共识,启动教育改革,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进程。面对新的挑战,德国若不进行相应的教育改革,受到世界高度赞誉的德国教育模式将无法与变化中的国际教育同步发展,并由此失去紧跟国际教育发展的机会。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德国在过去数十年中,尤其从 1999 年起,启动了高校改革进程。高校改革波及各个层面,包括高校学习制度,学科毕业制度,高校管理和高等教育治理,国家在联邦、州和乡镇层面的教育权限,高等教育行为体等。以此为改革内容的德国高校改革改变了德国教育模式,在改革领域和内容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的改革成果如下:德国统一后,德国中小学和高校体制趋同化;在“博洛尼亚进程”框架下实施高校学习结构改革;欧盟教育政策转换为成员国国家教育政策(主要针对“博洛尼亚进程”中的欧洲国家);签署高校协定;在高校引进高等教育竞争原则和绩效原则;实施联邦和联邦州大学卓越计划;征收大学学费;(联邦和联邦州)实施研究和创新一揽子计划;引入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竞争原则;开设双元制大学课程;在联邦和联邦州层面实施研究能力提升计划;实施高校国际化和大学课程国际化战略、科学国际化和国际化政策;进行高校体制机构结构改革;扩大高校自主管理权;开放第三教育途径;实施青年教授制;实施女教授项目计划;扩建私立高校等。

(一)在“博洛尼亚进程”框架下实施大学结构改革

按照“博洛尼亚进程”的要求,德国将欧盟教育政策融入其国家教育政策,在“博洛尼亚进程”框架内,完成了相应的大学结构改革,将高校学制从理工硕士/文科硕士和博士的二级学位制转变为三级学位制:本科、硕士和博士。尽管这一学位体制改革对德国来说是被动地

接受“博洛尼亚进程”的要求,但这一改革在客观上提升了德国大学与欧洲大学之间的兼容性。

(二) 高校协定

2007 年,联邦政府和联邦州政府达成了“高校协定 2020”,以此满足因高中毕业生数量翻倍而对大学学习名额需求不断增加的新现状。根据“高校协定 2020”,在 2010 年结束第一阶段项目后,“高校协定 II”继续满足日益增长的大学学习名额需求^[1]。一方面,联邦政府继续执行“高校协定”,并顺利完成“高校协定 III”的协商;另一方面,高校应当为好的师资和高质量的课程支付更多的费用,向需要职业培训的人提供更多进入高校学习的机会。^[2]

(三) 引进高等教育竞争原则及绩效原则,实施“大学卓越计划”

如果说,对接“博洛尼亚进程”是德国高校进行被动改革的动因所在,那么,德国提出的“大学卓越计划”则是主动而为的改革举措,以此推动德国大学均质化发展,促进德国高校科学与研究,提升德国大学的国际竞争力。传统的德国大学非常重视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公平。为应对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提高大学竞争力,在高校发展中,竞争原则、绩效原则和公平原则逐渐受到重视。除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公平外,业绩和效益也被视为高校追求的目标之一。为提高高校国际竞争力,联邦政府和各联邦州政府为德国高校启动了“大学卓越计划”。2006 年 1 月 20 日,在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高校发展方面具有“智囊”作用的德国科学委员会和德国科学基金会在“大学卓越计划”第一轮选拔中公布总计为 19 亿欧元的联邦-联邦州-大学卓越计划项目的三个资助方向:建设 30 个杰出研究中心,每年为精英研究团队提供平均 650 万欧元的研究经费;为促进科学新生力量建立 40 个研究院,研究院每年可分别得到 100 万

欧元的资助;特别资助得到国际认可的精英大学(其数量待定),预计为之每年投入 2.1 亿欧元,推动大学尖端研究的发展。德国科学基金会和科学委员会认为,“大学卓越计划”,将在德国高校中引发独特的推进效应。在争夺精英研究团队、精英研究院和精英大学的多层次竞争中,2006 年首次选拔出了 3 所高校,2007 年又选拔出了 6 所高校,到 2012 年,总共有 11 所高校被选为精英大学。截至 2011 年,联邦政府层面承担其中 75% 的费用,受资助高校所在的联邦州承担 25% 的费用^[3],对其资助的重点放在科研方面。正如 2013 年德国联合政府《联合执政协议》所规定的那样,应该保持和扩大联邦和联邦州的“大学卓越计划”受益范围。对此,应进一步将与科学事务相关的资助对象纳入新的资助范围。^[4]

(四) 征收大学学费的尝试(现在已经废除)

在德国高校改革进程中,德国高校改变了长期以来不收学费的方式。基于绩效原则这一高校发展新理念,在萨克森州、巴登符腾堡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和巴伐利亚州之后,黑森州作为第五个联邦州进行了征收学费的尝试。按照 2006 年 5 月 5 日联邦州政府内阁会议的决定,自 2007-2008 学年冬季学期起,黑森州的高校每学期征收 500 欧元的学费。专家估计,由于征收学费,每年有大约 14 亿欧元流进高校账户^[5]。2008 年,大学学费平均占高校总收入的大约 5%。在此期间,征收大学学费的联邦州相继停止收费。

(五) 二元制高等职业教育和高校国际化战略

将职业教育和高校教育相结合,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和以此为基础的双元制高校发展成为德国高校改革另一亮点^[6]。在这方面,巴登符腾堡州将职业学院转变为双元制高校。迄今为止,德国在 16 个联邦州相继推出了

高等职业教育,德国高等职业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此外,德国尤为重视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为之推出的德国高校国际化战略使德国高校进一步融入教育国际化进程。通过课程国际化方式和在海外建立大学合作计划,提升德国大学国际化优势和国际竞争力^[7]。在此期间,德国先后在海外建立的合作高校有新加坡慕尼黑工业大学、开罗沃尔姆大学和斯图加特大学、首尔魏玛音乐大学。2014年,德国高校大约有30.1万名外国学生,其中,约有1/4的学生在德国获得了高校入学资格。分布在全球的德国留学生大约有7.6万名,主要在荷兰、英国、奥地利和美国等国求学。

(六) 扩建私立高等学校

在德国,除国立高校、教会高校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建立了多所国家认可的私立高等院校。德国建立了大约有13所私立高校,如欧洲商学院,以及15所神学院。这些机构受国家的监督和调控,并且面向每一个高中毕业后获得大学入学资格的(或者具有同等资格证书的)学生招生。然而,约96%的大学生选择公立高校。

三、高等教育和高校政策的行为体新变化

德国高校改革不仅给高校生态带来了新变化,而且改变了高等教育机构及其任务,如办学方式、高等教育行为体的任务和角色都得到进一步优化。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新型高校教育治理体系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挑战,高校国际化和欧盟在高校教育领域的一体化政策(建立共同高校区域)也给德国高校格局带来新变化。在德国高校改革进程中,德国高校教育行为体的任务和功能得到新的界定,联邦、联邦州、地方层面政府管理职责和高校管理职责得到相应的调整。在这方面,德

国高校管理体制和机构化改革涉及欧盟、联邦、联邦州和高校四个层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德国强化了国家作为高等教育政策行为体的作用;在高校教育事业方面,联邦制也引入竞争性机制;联邦政府成为共同参与和建构欧盟教育一体化政策的中间人;推出“博洛尼亚进程”国家协同机制;高校自治权得到扩大;国家、高校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形成了跨机构合作。

(一) 欧盟层面:联邦政府共同参与和建构欧盟教育一体化政策

在欧盟层面,联邦政府共同参与制定欧盟教育政策。按照《基本法》,联邦政府在欧盟层面代表德国维护国家利益。这也涉及欧盟教育政策和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的落实。鉴于欧盟及其机构在教育政策制定方面的角色,在欧盟教育政策建构过程中,联邦政府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联邦政府代表联邦和联邦州维护国家和联邦州利益。另一方面,按照欧盟条约,联邦政府应通过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将欧盟教育政策转化为国家政策,并由联邦州付诸实施。如同《基本法》所规定的那样,联邦州拥有教育权限。这尤其涉及《博洛尼亚宣言》的实施和1999-2010年“博洛尼亚进程”在德国的落实。为此,德国建立了相应的机构,设立了“博洛尼亚进程-国家协同机构”。

“博洛尼亚进程-国家协同机制”是落实“博洛尼亚进程”的高校教育行为体跨机构合作联盟,由以下行为体构成:联邦德国教育及研究部、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大学校长联席会议、联邦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学生自由联合会、德国雇主协会、德国教育和科学工会、学位认证委员会和德国大学生协会等。这一跨机构合作联盟旨在落实和贯彻以“建立欧洲共同高校空间”为主要目标的“博洛尼亚进程”。

（二）联邦（国家）层面：加强国家作为高等教育政策行为体的作用

鉴于德国二战后实行的联邦制，教育科研的主导权和教育主管机构不在联邦国家层面，而在联邦州层面。因此，德国各联邦州教育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在高校改革过程中，联邦政府作为高等教育政策行为体的作用不容忽视，在本次改革过程中，国家更多地介入高校教育和科研领域。为进一步促进高校改革和高校发展，突破联邦、联邦州所拥有的教育权限划分，加强联邦和联邦州之间的协同治理能力，联邦政府在国家层面采取了相应的创新措施，如“高校协议”和“科研创新一揽子计划”。

（三）联邦和联邦州层面的互动：联邦制由合作方式转向竞争性机制

在德国高校改革进程中，德国联邦制权限，尤其是涉及教育领域的权限规定发生了变化，即由原先划分明确的联邦和联邦州的不同教育事务权限转向了联邦和联邦州合作式，并引入竞争性机制。这一变化可追溯到 2006 年启动的德国联邦制改革。这一联邦制改革取消了影响联邦和联邦州以及联邦州之间合作的制度性障碍，对联邦和联邦州之间的任务和权限进行了新的界定。在联邦州层面引入的竞争性原则和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往联邦州财政均衡化，允许联邦州基于自身经济基础和实力发展教育事业。在这一前提下，由联邦和联邦州共同推出的“大学卓越计划”才得以实施，推动了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四）高校层面：自治权扩大

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的行为体，在高校改革过程中，德国高校的自治权得到了扩大，如校长遴选、教授聘任、课程设置、教学活动、教育国际化等方面。国家、高校和非国家高等教育行为体协同合作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在此基础

上形成了更加有利于贯彻执行高等教育政策的多层次治理结构。

四、国家应对高等教育改革带来的宪法困境

在建构和履行高等教育权限方面，联邦、州、乡镇、高校、大学校长联席会议和文化部以及联邦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有着不同的权限划分和工作任务。这是由《基本法》决定并受其影响的。一方面，《基本法》确立了联邦州教育政策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基本法》允许国家在宏观层面对教育政策的实施进行监管。这便会产生以下问题：联邦、联邦州和乡镇在教育方面的关系如何依照宪法调控，对此有哪些最佳机制，会出现哪些问题，如何克服这些问题。

在全球化所致的新挑战背景下，迄今为止，正常运行的高校治理体系受到了质疑。作为欧盟成员国，德国政府有义务将欧盟教育政策转化为国内法律，落实欧盟教育政策的规定和方针。在落实“博洛尼亚进程”范围内，德国对本国高等教育政策进行了调整，并完成相应的高校改革。由于实施教育措施的权限在州层面，这使得德国教育政策的改革受到了质疑。鉴于此，在过去 20 年中，德国在联邦和联邦州层面以及大学层面推出了诸种改革措施。这里尤其要提及的是，国家在高等教育政策方面拥有比以往更大的权限。联邦、联邦教育部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大学卓越计划”“博洛尼亚进程”“高校国际化”等高校一揽子计划的实施都体现了国家在高校改革中的职能和作用。按照《基本法》作为监管人，国家在教育方面拥有有限的权限，但通过联邦和联邦州教育权限的重新界定和权限的扩大，以及新型倡议的方式，国家获得了更多介入高校事业的权限。

（下转第 33 页）

2006—2014 年德国大学学费改革(上)

文 / 韩 丁

摘 要:2006—2014 年,德国大学进行了学费改革,经历了从不收费到收费再到不收费的过程。文章详细介绍了德国 16 个联邦州中 7 个联邦州大学收费的年限和额度,以及减免学费的法律条款,并通过对大学学费历史的回顾和对德国媒体与学者就大学收费的反应和评价的研究,总结归纳德国大学学费改革对大学教育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德国大学;学费改革;收费历史;免学费

随着下萨克森州自 2014—2015 学年冬季学期(2014 年 10 月开学)起停止收取大学学费^①,德国大学收费的大幕也随之落下,重返免费时代。德国大学收取学费的政策从 2006—2007 学年冬季学期开始正式实施。自始至终,大学是否应该收费都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既是政治焦点,也是大学生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将介绍德国大学学费改革的始末,并分析收取学费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最终取消学费的原因。

一、德国大学学费的历史

在德国大学成立之初,大学教育是收费的。欧洲大学起源于中世纪,那时大学的学费比较高昂,并且种类繁多。学生除支付学费外,还需要缴纳考试费、文章抄写费、学校管理员费、特殊事项经费等。学生是否还要缴纳听课费取决于这所学校教授的工资由谁来支付。如果该校教授的工资由领主、所在城市政府或由该校的创立者(或出资人)来支付,那么这位教授的课就是免费的。由于领主和城市政府财富多寡不尽相同,有些薪俸不足以维持大学教授的生计,这些教授也开设私教课(Privatvorlesung)以

赚取一些额外报酬。此外,还有不拿大学工资的老师,他们的薪俸就是学生缴纳的听课费。例如,1755 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执教之初就是私人教师(Privatdozent),直至 1770 年,他才成为教授。当时唯一不收费的大学是天主教修会——耶稣会举办的大学,但该大学的入学要求和平时淘汰制的考试非常严格,起到了筛选的作用。在中世纪,学费可以延迟交付,只需要每学期末由系主任出具一份勤奋学习证明(Fleisszeugnis)。19 世纪以后,大学学费不再由教师直接收取,而是由大学的下属机构收取。1897 年,普鲁士薪酬改革将大学教授的薪俸纳入了公务员薪酬条例管辖范围内。为此,大学需要将所收学费的一部分上交国家财政部门。1920 年,《帝国公务员薪酬法》直接将大学学费的一部分规定为公立大学教授的薪酬组成部分。1923 年,德国政府出台政策规定大学收取固定的学费以维持运作,同时将学费的一部分作为课时费发给教授。第三帝国时期,一直由考官直接收取的博士课程的学费也纳入国家财政收入,不再归考官个人。二战结束以后,东西德的大学学费政策走上

作者简介:韩丁,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德国锡根大学中国办事处主任

了不同的道路:东德不再收取任何大学学费;西德则恢复了 1918 年以前的收费政策,学费由固定的学费和根据课时(Semesterwochenstunden, SWS)计算的听课费组成。根据课程的类型不同,听课费用也不同。通常,大课(Vorlesung)和练习课(Übung)每节 2.5 马克,研讨课(Seminar)的费用则在 2~5 马克之间。但黑森州是一个例外,根据《黑森州宪法》规定,所有黑森州的本地学生在黑森州上学学费全免。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学生运动的兴起,西德的大学政策引起了广泛争议,很多人认为应该学习黑森州取消学费,当时新兴的应用科技大学(Fachhochschule)起到了推动作用。应用科技大学的前身大多是工程师学校和高等经济学校(Ingenieur-und Höhere Wirtschaftsschule),而此类学校在当时属于免费的中等教育。但随着将应用科技大学并入高等教育领域,是否收学费就成了一个争议的焦点。1970 年,在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各联邦州州长共同签署决议,决定从 1970-1971 学年冬季学期起取消联邦范围内的所有大学的学费,从此开启了德国大学免费的时代。该决议虽然得到了贯彻,但并未写入德国《大学框架法》(Hochschulrahmengesetz, HRC)^[4]。这为以后的争论埋下了隐患。

二、新一轮的德国大学学费改革

(一)改革背景及各联邦州的情况

由于东西德合并给经济情况较好的前西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5],经济不景气导致 1993 年德国教育财政缺口一度高达 40 亿马克^[6]。为了填补这些缺口,从 1998-1999 学年冬季学期开始,陆续有 10 个联邦州开始向超过规定学习时间的超长滞留学生(Langzeitstudierende)收取惩罚性学费,借此督促他们尽快毕业,不要再“赖”在学校占用公共资源^[4]。1998 年,红绿两党(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联合执政之初,就将禁

止大学收费写入了两党联合执政协议中^[5]。2002 年,德国《高校框架法》第六次修订法草案中加入了禁止对大学生第一个学位收取学费的条款,但在对草案进行审议时,由各联邦州代表组成的联邦参议院表示反对该项禁令,不过,联邦议会最终表决通过了该修订法,红绿联盟成功地实现了其政治目标^[6]。然而,分歧并没有就此被消除,反对党控制的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简称巴符州)、萨克森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简称萨安州)、汉堡州和萨尔州 6 个联邦州,以该联邦学费禁令干涉各州立法权为由,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诉讼^[7]。经过近 3 年的审判,德国宪法法院于 2005 年 1 月 26 日判决学费禁令和联邦宪法相违背,并因此无效。自此,德国大学收取学费道路上的障碍被扫清了。^[8]

尽管 6 个联邦州的诉讼获得了胜利,但并没有全部实施收取学费的政策,也有些没有参加起诉的联邦州加入了收费的行列。其中,参加起诉的萨克森州和萨安州虽然赢得了诉讼,但最终也没有引入大学学费政策。黑森州、下萨克森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简称北威州)并没有参加诉讼,却在解禁后收取了学费。前后一共有 7 个联邦州在 2006 年至 2014 年间收取了大学学费,比起诉的联邦州数量还多了一个。

虽然,大学学费禁令于 2005 年 1 月就被联邦宪法法院撤销了,但直到 2006-2007 学年冬季学期才有联邦州正式开始收取学费。其原因在于相关的法律需要时间起草,财政系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人员也需要培训。没有参加诉讼的下萨克森州和北威州成了第一批收费的联邦州,两州于 2006 年 10 月开始向州内的高校所有学生收取学费。下萨克森州内所有大学在校生统一缴纳每学期 500 欧元的学费;北威州将收费与否的决定权交给了各所学校,大学有权决定是否收费,一方面这使得大学的自治权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将随之而来的法律

问题推给了大学。学生如果不满收费政策,需直接起诉其就读的大学,因为是学校决定收费的,而不是州政府。巴符州、巴伐利亚州、汉堡、黑森州和萨尔州也紧随其后陆续出台了收费政策(见表 1)。

(二)各收费联邦州收取学费的情况和学费减免政策

1.巴登符腾堡州

巴符州从 2007 夏季学期开始收取学费,不区分综合大学(Universitaet)和应用科技大学(Fachhochschule),额度为每学期 500 欧元。巴符州将应用科技大学的公共服务相关的专业规定为免费专业。此外,如休学学期、实习学期、医学实习年,以及博士阶段的学习也在免费之列。不仅如此,巴符州还规定了因下列个人原因可以免除学费的情形:有一个 14 岁以下孩子需要抚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兄弟姐妹,且其中两人没有享受免学费政策,这样一人可以免除 6 个学期以内的学费,如果该生没有学满 6 个学期,其兄弟姐妹可以享受剩余免费学期;根据《社会保障法》第九次修正案第二章规

定的残疾等级划分,属于严重就学困难的情形;具有超常天赋的或学习期间成绩优异的学生。

巴符州政府还规定,所收取的学费,只能用于学校的教学,不得挪作他用。

2011 年 11 月,将州内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和德国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联盟政府赶下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和绿党执政联盟,早在州选举之前就承诺,如果赢得选举,将取消大学学费。自 2012 夏季学期起,巴符州取消统一大学学费。此后,学士和与之衔接的硕士学位教育均不再收费,但继续教育范畴内的硕士阶段教育则可以收取学费,学费额度制定由大学决定,且不设上限。

2.巴伐利亚州

巴伐利亚州政府 2005 年 10 月作出决议,新的《巴伐利亚州高等教育法》于 2006 年 5 月生效,该法规定巴伐利亚州的大学于 2006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收费。综合大学和艺术大学可以收取的额度为每学期 300~500 欧元,应用科技大学可以收取的额度为每学期 100~500 欧元。巴伐利亚州也将收费权下放给各个大学,

大学借此可以自由制定学费标准,且即便在同一所高校内也可以因专业不同而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巴伐利亚州免除了休学学期、实习学期、医学实习年和 6 个学期内博士阶段学习的学费。该州的预科教育也是免费的。同时,巴伐利亚州规定有下列情况,也免除学费:学生有一个 18 岁以下或残疾孩子需要抚养;学生家长获得 3 个以上子女补贴(Kindergeld);学生家长供养另一个孩子上大学,且该大学收取学费;学生在获得助学贷款的情况下,生活

表 1 德国各联邦州开始和停止收取学费时间及收取额度^①

| 联邦州 | 引入学费政策时间 | 取消学费政策时间 | 学费额度 |
|-------------|--------------|--------------|----------------------|
| 巴登符腾堡州 | 2007 夏季学期 | 2012 夏季学期 | 全州统一 500 欧元/学期 |
| 巴伐利亚州 | 2007 夏季学期 | 2013/14 冬季学期 | 学校决定,最高不超过 500 欧元/学期 |
| 柏林州 | - | - | - |
| 勃兰登堡州 | - | - | - |
| 不莱梅州 | - | - | - |
| 汉堡州 | 2007 夏季学期 | 2012/13 冬季学期 | 全州统一 375 欧元/学期 |
| 黑森州 | 2007/08 冬季学期 | 2008/09 冬季学期 | 全州统一 500 欧元/学期 |
|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 | - | - | - |
| 下萨克森州 | 2006/07 冬季学期 | 2014/15 冬季学期 | 全州统一 500 欧元/学期 |
|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 2006/07 冬季学期 | 2011/12 冬季学期 | 学校决定,最高不超过 500 欧元/学期 |
| 莱茵兰法尔茨州 | - | - | - |
| 萨尔州 | 2007/08 冬季学期 | 2010 夏季学期 | 全州统一 500 欧元/学期 |
| 萨克森州 | - | - | - |
|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 - | - | - |
| 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 | - | - | - |
| 图灵根州 | - | - | - |

依然窘迫。

如何认定生活是否依旧窘迫,由大学自行判断。同时,学校可以自行决定选取最多 10% 的成绩特别优秀的在校生免除其学费。学费的用途被规定为改善学习条件,且在决定学费的用途时,学生应适当参与决定。

巴伐利亚州议会于 2013 年 4 月通过决议,自 2013-2014 学年冬季学期开始取消大学学费。执政党基督教社会联盟(简称基社盟)也投了赞同票。大学学费制度由基社盟于 2007 年引入巴伐利亚州,但在 2012 年的巴伐利亚州公民表决中,超过 135 万选民反对大学收费。2013 年是巴伐利亚州选举年,执政党基社盟为谋求连任,几乎在一夜间改变了对学费的立场,而继续持反对态度的自民党则在 2013 年的州选举中只获得 3% 的选票,未达到 5% 的下限,无缘联合执政。

3. 汉堡州

2006 年,汉堡议会通过《大学资助法》,规定从 2007 夏季学期开始汉堡州的公立大学每学期收取 500 欧元学费。2008 年 6 月,汉堡议会变更了学费的额度,从 2008-2009 学年冬季学期开始,大学学费从每学期 500 欧元降为 375 欧元。汉堡州实行后付费制度(nachgelagerte Studiengebuehren),即学生在大学毕业后一次性缴纳学费,如果毕业生年收入未超过 3 万欧元,还可以延期缴纳。

除警察大学和财经大学外,汉堡所有大学的学生都需缴费。但还是有人因特殊情况无需缴纳费用,包括休学学期、医学实习年、博士生、公共-法律领域的培训师,以及根据协议免缴税款的学生,抚养一个 14 岁以下或残疾孩子的学生和本人有残疾并到达就学困难程度的学生。

汉堡的大学有权决定是否在窘困情况下延期或免除学生学费。学生如果在学校的管理机构中或学生组织中工作或曾经工作过,大学

有权免除该生的学费。收取的学费仅可以用于教学。用收取的学费维持的人员或设备配置在制定招生计划时不能作为参考依据,简而言之,收取的学费只能用于改善现有的师生比例,不能作为扩招之用。

2011 年,汉堡州选举中社民党一举获得 48.3% 的选票,时隔十年后重新执掌汉堡州。新政府执政之初,左党要求其立刻取消大学学费,但社民党表示州财政没有经费给大学以填补因取消学费而产生的资金缺口。因此,汉堡州于 2012-2013 学年冬季学期才取消大学学费。

4. 黑森州

因为黑森州宪法里规定了所有教育免费,高等教育也包含其中,所以黑森州的争议自始至终较其他州更为激烈。2006 年 10 月颁布的《黑森州大学学费法》宣布自 2007-2008 学年冬季学期开始收取大学学费。其实,早在 2004 年夏季学期开始,黑森州的大学已经向超长滞留留学生收费。

《黑森州大学学费法》详细区分了基本学位学费(Grundstudienbeitrag)、第二学位学费(Zweitstudienbeitrag)和超长滞留学费(Langzeitstudienbetrag)。基本学位指获取的第一个就业资格学位^②,与之衔接的是进一步就业资格学位^③。在此类基本学位规定学习时间内及超出规定学习时间 4 个学期以内,每学期收取 500 欧元学费。第二学位是指学生在获得第一个就业资格学位后又攻读一个学位,且这个学位不是与第一学位相衔接的硕士学位。此类学位学费也为每学期 500 欧元。但大学有权提高此类学费,最高不得超过 1500 欧元。如果超出规定学期 4 个学期以上,则需要缴纳超长滞留学费,每学期学费的额度将在原学费基础上提高 200 欧元。

法律还规定,在开学前,家中有一个未满 14 岁的孩子需要抚养的学生,可以享受最高 6 学期的学费免除政策;由国家间或校际友好协

议规定了互免学费的,可以免除学费。如果大学认为与某些国家的合作特别重要,也可以免除该国家的赴德学生的学费。

同样,黑森州规定了如果学生因需缴纳学费而使得生活窘困,或有严重残疾的和有严重疾病的学生,应当减免学费。10%的学生可以因优异的成绩获得免除学费的奖励。与别的州不同的是,黑森州不免除休学学期、医学实习年和博士生的学费。相同的是,所收取的学费只能用于改善教学条件,不能挪作他用。

2008 年 6 月,州议会在反对党社民党、绿党和左党的多数表决下通过自 2008-2009 学年冬季学期起,取消普通大学学费和超长滞留学生学费。这样,黑森州就成为第一个取消大学学费的联邦州,其收费政策仅实行了一年。

注释:

①这里的大学学费仅指大学第一学位和与之衔接的硕士学位的普通学费,不含超长学习时间学费(Langzeitstudiengebühren)和第二学位学费(Studiengebühr für Zweitstudium),以及老年大学生学费(Studiengebühr für Seniorenstudium)等特殊学

费。本文中如无特别指出,均指普通学费。

②通常指学士学位。

③通常指硕士学位。

参考文献:

[1] [4] [8] Christian Blomeyer. Studiengebühren und Studienbeiträge[M]. Hamburg: Verlag Dashöfer GmbH, 2011.

[2] 冯涛,陈校.德国公立大学助学贷款政策及其借鉴[J].德国研究,2014(4):112-121.

[3] 许宽华,陈国权.收取学费——难矣[J].德国研究,1996(4):46-49.

[5] 贺锋.德国高校收费前后[J].教育,2006(8):51-51.

[6] [7] Andreas Hadamitzky, Alexander Geist, Korbinian von Blanckenburg. Studiengebührenmodelle in der Praxis[J]. Das Hochschulwesen,2008(1):6-11.

[9] Matthias-Wolfgang Stoetzer, Carolin Beyer, Julia Mattheis, Saskia Schultheiß. Der Einfluss der Studiengebühren auf die Zahl der Studienanfänger an deutschen Hochschulen [J]. Jenaer 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forschung, 2014(1):1-35.

编辑 吕伊雯 校对 潘雅

(上接第 28 页)

德国高校面临的另一挑战是,在全球化层面应对高校面临的全球性竞争。这便要求国家更多地关注高等教育的发展。但是,这又使国家置于宪法困境。按照《基本法》,教育政策和高校政策制定属联邦州权限。鉴于此,需要在联邦和联邦州权限划分方面对《基本法》进行修改。

参考文献:

[1]Autorengruppe Bildungsberichterstattung. (Hg.). Bildung in Deutschland[M].Bielefeld: W. Bertelsmann Verlag, 2014:127.

[2]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 Koalition – svertrag zwischen CDU,CSU und SPD,18.Legislaturperiode, 2013, S26[EB/OL]. <http://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StatischeSeiten/Breg/koalitionsvertrag-inhaltsverzeichnis.html>, 2015-05-05.

[3] [5]Der Fischer Weltalmanach: Bildung und Forschung[M].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6: 736.

[4] [7]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 Koalition – svertrag zwischen CDU,CSU und SPD,18.Legislaturperiode, 2013, S. 27[EB/OL]. <http://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StatischeSeiten/Breg/koalitionsvertrag-inhaltsverzeichnis.html>, 2015-05-05.

[6]Autorengruppe Bildungsberichterstattung. (Hg.). Bildung in Deutschland[M].Bielefeld: W. Bertelsmann Verlag, 2014:123.

[6]Autorengruppe Bildungsberichterstattung. (Hg.). Bildung in Deutschland[M].Bielefeld: W. Bertelsmann Verlag, 2014:123.

编辑 吕伊雯 校对 潘雅

菲律宾社区教育初探

——基于在卡布尧希望日托中心的访谈

文 / 孙建光

摘要:社区教育是当今教育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学校和社区的关系也从逐步隔离走向融合。文章通过对菲律宾亚当森大学与卡布尧市南威利镇合办的“卡布尧希望日托中心”的志愿教师和学生家长的访谈,获得了菲律宾社区教育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简要分析了菲律宾社区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菲律宾;社区教育;日托中心

教育是人类传承文化与生活体验的重要途径,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教育也经历了从个体的口口相传到集体化、实体化和制度化的发展历程。作为现代文化与文明的传承载体,学校具有重要的地位。社区是社会学范畴中人们社会生活呈现的一个空间存在,是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是学校组织所处的外在环境”^[1]。近年来,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社区与社会的关系。美国学者莱拉·考斯汀(Lela Costin)最早提出了“学校-社区-学生”关系理念,通过三方努力来培养人格健全的社会人才^[2]。加拿大大学者迈克尔·弗兰(Michael Fullan)提出了学校社区一体化的构想,即打破学校与社区间的界限,建立一个“共生的”“多元的”“不可分的整体”^[3]。美国学者诺维拉·基思(Novella Z. Keith)提出了“建立社区与学校间的平等关系,形成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社会化网络”的观点^[4]。国内学者也非常重视对社区与学校关系的研

究。很多学者都认可家庭、学校和社会合作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在整体教育网络中,这三者各自发挥独有的教育优势,对青少年的教育培养形成有效的、合理的协同力^[5]。学校、家庭、社区的合作是教育发展的内在需求^[6]。田静博士认为,学校与社区的关系经历了3个阶段:学校与社区相互隔离阶段、学校与社区联合阶段、学校与社区走向融合阶段^[7]。教育的空间不再囿于学校,而是和家庭、社区生活密切联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校与社区的共同发展,最终实现终身学习的目标。

一、菲律宾学校与社区教育的发展现状

菲律宾社区教育理念的提出时间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其办学实践最早可以追溯到1908年中央政府授权的、全国范围的市民-教育讲座活动。现代的学校与社区活动始于1938年在卡皮兹省(Capiz)的一次实验——在校监何塞·V·阿吉拉尔(José V. Aguilar)的领导下,

作者简介:孙建光,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项目(编号:苏教师[2012]39号)

卡皮兹省的学校使用当地稻种进行二期水稻种植实验,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地大米供给不足的情况。自此,学校主导的很多活动逐渐扩展到社区生活的其他领域,如健康与卫生、家庭美化、食品生产、生活休闲方面^[8]。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如下建议,中小学发展而成的社区性学校要“通过积极参与社区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成为能够更有效地教育孩子、青年和成年人的平台”^[9]。从1949年起,菲律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社区-学校”合作项目。这个从基础教育学校最先开展的活动,后来延伸到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其中,高校与社区的合作旨在让人们在工作场所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所成就。目前,菲律宾的很多高校都在积极开展师生社会实践活动,体验社区生活,开展社区基础教育的助教助学活动,努力构建学校与社区合作发展的模式。

二、卡布尧希望日托中心的建立背景与基本情况

亚当森大学(Adamson University)作为菲律宾天主教大学,是公认的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素质教育的主要机构之一。该校设立了专门的综合社区推广服务机构,积极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和大学的社区推广服务,为社会底层和被边缘化的群体组织各类活动及提供相关服务。亚当森大学的合作社区之一就是位于卡布尧市(City of Cabuyao)南威利(Southville)镇的卡布尧生活合作发展中心。

根据2012年官方统计数据,卡布尧市总人口为294830人,全市年收入约为9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2亿元)^[10],居民人均年收入约为438.77元人民币。事实上,该市绝大多数人口的收入水平达不到平均值,很多人都处在极度贫困中,接受教育对他们来说是非常

奢侈的事情。实现学校与社区合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卡布尧希望日托中心”项目由亚当森大学与卡布尧生活合作发展中心于2007年合作发起,并于一年后正式成立。中心的面积不大,只有一间约40平米的教室;教学设施比较简陋,只有3张课桌、1块黑板、2台旧电风扇。目前,中心开设了幼儿园一年级和二年级课程,在校生总数约为80人,共有6名志愿教师;4个班次轮转使用教室,每个班次最大容量是20人。只有成为亚当森大学社区合作项目的成员,才能获得在卡布尧希望日托中心就读的资格。只有接受亚当森大学关于价值观的培训并达到合格标准,才能获得成员资格。

三、对学生家长和志愿教师的访谈

(一)对家长的访谈

为了更深入了解社区教育的发展现状,我们对卡布尧希望日托中心的学生家长进行了访谈。受访者是两位母亲,名为卡门西塔(Carmencita)和埃米恩(Emilene)。我们首先围绕日托中心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进行了讨论。根据访谈内容翻译整理如下:

日托中心的教育费用不是那么昂贵,每月的费用只有20比索(约合人民币2.87元)。如果家长一时拿不出一个学年的费用,也可以选择分期支付全年学费,甚至是按月支付学费。所以,学费支付对家长来说是宽松而且方便的。以前没有社区日托中心,有些家庭把孩子送到社区外的学校,不仅学费昂贵,而且路途较远,也会额外花费时间和费用。现在,日托中心就在社区内,非常方便家长接送孩子。

此外,和社区外的学校相比,社区学校便于家长和教师的交流,也更容易让家长观察孩子的课堂参与情况。

我们接着讨论的是在社区外接受教育时遇到的问题。根据访谈内容翻译整理如下:

第一,入学年龄问题。社区外的日托中心最低入学年龄是 6 岁,而在希望日托中心,4 岁就可以入学了。

第二,外面的学校规模较大,因此学校也比较拥挤,人数较多,像希望日托中心则比较宽松。

(二)对教师的访谈

我们还与日托中心的三位志愿教师进行了访谈,分别是贝丝(Beth)、玛丽赛斯(Marithess)和梅尔达(Melda)。我们谈论的问题是日托中心对教师的影响。根据访谈内容翻译整理如下:

日托中心对她们的首要影响是增强了她们的信心。只要在亚当森大学接受系统的短期教学培训并达到合格标准,她们就能成为受人尊敬的志愿教师。志愿者的工作提高了她们的自信,也给予了她们提升技能、继续学业的机会。例如,任教于希望日托中心,让贝丝认识到自身价值。后来,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教育学学士学位。而且,在中心任教让她们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统一的教师制服让她们与众不同。虽然这些教师大部分都是中学毕业,但她们有教学的激情和奉献精神。例如,梅尔达的亲身体会就很有代表性——没有做志愿教师之前,她的邻居并没有关注她,但是在她主动请缨成为志愿教师后,邻居把她当作真正的教师加以尊敬。

我们接着讨论了日托中心对孩子的影响。根据访谈内容翻译整理如下:

孩子们变得更加有礼貌,懂得使用“po”和“opo”^①。他们在日托中心学习阅读与计算,拥有了基础的阅读和计算能力。这正是菲律宾多年来基础教育的一个缺失。

通过访谈和相关调研,我们认为大多数家长和教师都对卡布尧希望日托中心的教学效果予以肯定。他们认为亚当森大学的这个合作

项目具有延续性,而不是像“Gawad-Kalinga 社区发展基金会”^②等其他非政府机构推行的项目一样缺乏延续性。家长非常感谢志愿教师们在没有酬劳的情况下无私教育他们的孩子。而且,家长对卡布尧希望日托中心的教学方法也是非常肯定的,认为该中心的教学方法比其他日托中心都要先进,因为这个中心毕业的学生进入小学后,大多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日托中心对社区的影响是让父母知道基础教育和把孩子们送到学校的重要意义。

四、菲律宾社区教育面临的挑战

亚当森大学和卡布尧市南威利镇的合作,只是菲律宾学校与社区合作的一个缩影。其中有不少措施值得借鉴,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菲律宾社区教育所面临的挑战。菲律宾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很多家庭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更不要说学费、交通费、伙食费等送孩子上学所产生的费用了。此外,迅速增长的人口让菲律宾本来就已经不堪重负的教育体系更加难以为继。政府投入不足,主要依靠私人财团支持的社区教育体系很难胜任整个国家的人才培养重任。毫无疑问,本已匮乏的社区教育资源更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师资力量薄弱,是当前菲律宾社区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前文笔者访谈的希望日托中心的教师,很多就是由中学毕业的家庭主妇担任。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政府必须想方设法谋发展,适当控制人口增长,做好社区教育的配套政策和设施,对社区教师进行培训,并多渠道招募合格人才投身社区教育。

注释:

^① po 和 opo 是菲律宾官方语言之一“他加禄语”(Tagalog)中的词汇,属于敬语,po 意思是“请”;opo 意思是“是的”。

(下转第 41 页)

韩国职业培训体系分析

文 / 韩舒静

摘要: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其经济发展过程被视为亚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案例,而有保障的优秀劳动力培养体系是其在工业化进程中快速崛起的重要推动力。韩国的职业培训体系作为成功典范,值得中国研究和借鉴。文章对韩国职业培训体系的培训类型与培训费用贷款情况,培训的管理、实施与评估机构进行了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韩国职业培训体系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韩国;职业培训;培训类型;评估

一、概述

韩国的职业培训体系通过为制造业培训高技能劳动力而带动了韩国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的工业化发展。韩国的培训体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根据不同工业发展阶段技术工人的供需情况,进行相应人才培养。韩国职业培训体系是政府政策主导的成功案例。政府将开展公共培训项目作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优先战略,强制企业实施职业培训并邀请雇主成为合作伙伴。

在韩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市场对于高质量劳动力的稳定需求催生了韩国职业培训体系的建立。在建立之初,职业培训体系致力于将毫无技能的青年人训练成为高技能人才;当今,韩国职业培训体系的职能扩大到为所有产业工人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因此,在韩国,“职业培训”指的是提供给所有产业工人(包括所有在职和即将就业的工人)的“培训项目”,以帮助他们获取职业竞争力。从更广义层

面上来讲,它是指开发提升终身就业竞争力的教育培训项目和相关活动的“职业能力开发培训”,包含了培训计划、培训流程、媒体开发、研究、设备支持等相关内容。

二、培训类型与培训费用贷款情况

(一)在职培训

按照培训费用支付主体类型,在职培训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企业资助型培训”或称“就业保险退还金培训”,即企业承担为员工开设培训课程的费用,在此基础上,企业可以通过就业保险基金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第二类是“员工主导型培训”,即培训费用由员工自己支付。

1. 企业资助型培训

企业资助型培训包括集体培训、在岗培训、远程培训(通过网络等)等多种形式,具体培训可能由企业自行实施,也可能委托给相关培训机构。

培训的部分费用由就业保险进行补贴。因

作者简介:韩舒静,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国际交流合作处交流科科长

为考虑到中小企业开展培训项目的难度较大,所以就业保险在进行培训费用的补贴时,针对中小企业的资助系数和资金限额会相对较高。

此外,企业为进行中长期培训的职工支付培训费用的同时提供带薪假期,而由此产生的费用,企业可以通过就业保险得到部分补贴。例如,当员工一次性培训的时间达到 30 小时或以上时,由此产生的部分培训费用和该名员工的工资将通过就业保险补贴给企业。再如,当员工的一次性培训时间达到 120 小时以上并且需要 30 天以上的带薪假期时,就业保险除了对由此产生的培训费用和支付给受训员工的工资进行部分补贴外,还会为因雇佣替代员工而产生的工资进行部分补贴。

2. 员工主导型培训

对于没有机会接受“企业资助型培训”的群体,他们在接受职业培训时,可以得到“员工职业能力提升资助基金”项目和“明日卡”系统(Naeil Baeum Card System)项目的资助。

“明日卡”系统项目通常资助那些打零工人士、计划在 90 天内跳槽人员或已经休无薪假 90 天以上的人士。“员工职业能力提升资助基金”项目的资助对象是短期工、劳务派遣人员、兼职人员、小时工、中小企业雇员和自愿缴存就业保险的个体人员。

(二)中小企业定制培训

中小企业定制培训旨在缩小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员工获得培训机会的差距。目前,韩国共有 4 个相关项目。

第一,“人力资源开发能力扩大项目”从 2011 年开始运作,为实施职业能力培训有困难的中小企业提供设备和人员。

第二,“中小企业学习组织支持项目”为中小企业学习实践活动提供基础设施,帮助中小企业员工获得职业知识。中小企业在实施职业培训时,往往面临基础设施缺乏、技能人才外

流等问题。“中小企业学习组织支持项目”于 2006 年开始运行,帮助中小企业进行针对他们各自业务领域的职业培训,将学习和业务紧密联系,员工培训与工作同时进行。

第三,“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训项目”主要为优先资助的中小企业的业主和员工提供优秀培训机构的高级课程。此项目为参加培训的员工支付工资(工资金额为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乘以培训小时数)和全部培训费用。

第四,“中小企业系统性在岗培训项目”于 2012 年开始实施,此项目为中小企业在企业培训师培训、岗位分析、模块开发、培训实施、评估和外部咨询等方面提供帮助。

(三)失业群体培训

失业群体培训旨在帮助失业人群获得新技能以提升他们的再就业能力。从 2011 年开始,所有的失业群体培训都划归在“明日卡”系统项目下执行。具体申请过程如下:申请者到居住地所属职业介绍所进行工作申请登记—进行培训咨询—准备个人培训计划—申请一张“明日卡”—申请一张银行卡—收到“明日卡”—申请培训项目—支付培训项目中的自费部分—参加培训。

地区劳动部门下属的职业介绍所会为失业人群推荐有资质的培训机构和项目,失业人群也可以通过职业培训网站查找相关信息。人们会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以及培训项目是否在失业保险的报销范围内来选择培训课程。

(四)战略领域培训

韩国战略领域培训的根本目的是保障政府在国家关键性战略产业、人才紧缺型产业、经济增长引擎产业等战略领域的人才培养的主导地位。韩国战略领域培训主要有 3 类。

1.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此类培训旨在为韩国关键领域和新兴产业培养技工、技师等中等技术人才,但私营企

业不能参加。此类培训主要分为两年制技师培训课程(培养中高级人才)和一年制技工培训课程(培养中级人才)。

2. 国家关键性战略产业职业培训

此类培训课程旨在为关键性战略产业的人才紧缺岗位或未来用工需求增加的岗位进行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人群一般是 15 岁以上、在职业介绍所进行过登记的失业人员,以及高中毕业后没有继续深造的学生。培训费用以及培训期间产生的餐费和交通费全部由政府承担。培训周期从 3 个月(350 小时)到 12 个月(1400 小时)不等。

3. 专业人才培养

此类培训旨在培养高级技能人才。由韩国就业与劳动部总负责,具体培训项目由战略与财政部,知识经济部,教育与科技部,文化与旅游部,健康与福利部,农业部,环境部,土地、交通和海事部,中小企业工商管理部门,金融服务委员会,韩国通信委员会等部门负责实施。专业人才培养包括面向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培训(如环境部开设的气候变化项目),面向大专毕业生、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培训(如知识经济部开设的活力专家项目),面向在职员工的培训(如文化与旅游部下属的韩国电影艺术学会开设的课程)。

(五) 培训费用贷款情况

1. 学费贷款

对于参加职业学院、网络大学或技工学校举办的培训的在职人员,一部分培训费用由就业保险承担,其余部分个人可以申请贷款。

2. 培训设施设备费用贷款

韩国贷款系统一般会向企业和培训机构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支持企业和培训机构修建培训设施和购买培训设备。一般来讲,申请小额短期贷款的企业或培训机构往往有优先权;再者,与大型企业或培训机构相比,中小企

业在贷款时更有优势。每个企业或培训机构的设施设备贷款总额度是 60 亿韩元,每年的额度是 20 亿韩元。此项举措旨在使贷款惠及更多的企业或培训机构。

3. 培训期间生活费用贷款

培训期间的生活费用贷款项目是从 2009 年开始实施的,其目的是减轻失业人群和临时工人群在接受长期职业培训时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此项贷款只适用于参加韩国就业与劳动部所资助的 4 周及更长时间的培训项目的失业人群或临时工人群。年收入在 2400 万韩元以下的临时工作人员或者拥有失业保险记录并且年收入在 4000 万韩元(含配偶收入)以下的失业人员有资格申请此项贷款。每月的贷款额度是 100 万韩元(临时工的总贷款额度是 300 万韩元,失业人员的总贷款额度是 600 万韩元),贷款年利率是 1%,贷款人最多在 5 年内分期还清贷款。参训人员向韩国工人赔偿与福利服务部门提交贷款申请,之后由该部门进行审批。贷款审批通过的参训人员要与一家金融机构签订贷款协议,并由此金融机构发放贷款。

三、培训的管理、实施与评估机构

(一) 行政机构

在经历多次部门重组后,从 2012 年开始,由职业技能开发政策部门及其下属三个部门负责韩国的职业培训体系管理。职业技能开发政策部负责制定整体的职业能力开发政策并管理公立培训机构,其下属的职业技能鉴定部负责国家技术资格鉴定及技能技术推广,人力资源开发部通过实施政策来支持大中小型企业的员工能力开发和针对失业人群的培训,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机构负责向提供在职培训的用人单位分配培训经费,并在中小企业定制培训和培训设施方面提供支持。作为地方组织的 49 个职业介绍所负责数据发布、培训经费使用、

培训机构管理等工作。

(二) 职业培训机构

韩国职业培训机构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类。典型的公立培训机构是韩国理工学院(Korea Polytechnic Colleges), 此类院校以前主要是为传统制造业培养劳动力, 但如今也为绿色产业和高科技行业提供中等技术工人。除了面向本地居民和企业外, 此类机构也为失业人群提供再就业培训, 为在职员工提供能力提升培训、生活技能培训等。截至 2011 年, 韩国共有 7014 所私立培训机构, 其中包括 56 个职业培训集团, 874 个就业与劳动部指定培训机构, 以及其他 1769 个学术团体、终身教育机构等。

(三) 职业教育教师培训机构

韩国技术与教育大学(Kore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成立于 1992 年, 是一所培养职业教育教师的四年制大学。这所大学在培养职业教育教师的同时, 为在职职业教育教师提供短期课程和研究生课程。截至 2010 年, 该大学设置了 6 所学院, 3 个系和 17 个专业, 每年培养约 900 名职业教育教师。^[4]

(四) TV 工作网

TV 工作网(TV Work Net)是一个 24 小时独家播报职业、就业、能力开发信息的网络平台。平均每天有 3 万人访问工作网, 其意义在于基于服务系统, 随时随地提供可靠的就业信息, 与提供职业指导、工作实习和就业服务的线下职业介绍所形成互补。

(五) 研发和评估统计机构

韩国能力开发院通过开展针对职业能力开发相关政策的研究以及在 4 个研究实验室和 8 个组织中实施相关项目, 为职业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反馈。韩国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机构则负责培训教材和标准的开发, 以及电子学习内容的开发和宣传。

自 1998 年金融危机以来, 就业与劳动部、

韩国职业能力开发院每年都会联合实施“培训机构和培训过程评估”, 对数量众多的培训项目的质量进行监管, 遴选优秀培训机构, 淘汰质量不达标机构, 进而提升韩国培训机构的竞争力。

为了统计分析职业培训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 韩国职业能力开发院、韩国劳动研究院、韩国就业信息服务部门等相关组织会定期开展劳动力和培训需求研究、人力资本研究、教育和就业研究、韩国青年调查等活动, 并建立数据库, 为政策完善提供基础性数据。

四、思考与总结

总体来讲, 韩国职业培训体系作为成功范本, 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但是, 它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 如培训场所有限, 再如自从所有的失业群体培训都划归在“明日卡”系统项目下执行后, 参训人员的再就业率持续下降等, 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借鉴的过程中进行思考和规避。

第一, 就业情况的多样性导致职业培训出现盲区。例如, 特殊劳动力(劳务派遣人员、外包人员、小时工、自由职业者等)的人数快速增加, 但是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只相当于正式工的 33.8%, 而且大多数特殊劳动力是没有就业保险的, 这导致政府很难执行统一的培训政策。此类情况在中国也同样存在, 建立适用于此类人群的职业培训体系的需求在不断增长。

第二, 由于韩国职业培训并不完全以产业和企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为出发点, 劳动力的供求不平衡现象仍未得到妥善解决。虽然“明日卡”系统项目通过扩大培训市场和增加求职者的培训选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基于产业劳动力需求的培训仍然不足。韩国的培训咨询体系正在向规范化、系统化发展, 但市场对劳动力技能的需求与失业人员接受的培训课程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此

外,产业的发展程度、劳动力类型等都存在着巨大的地区性差异。中国在借鉴过程中,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重视这个问题,出台配套的职业培训政策来平衡此种差异。^[2]

第三,韩国将就业保险与职业技能开发项目进行了整合,但是并没有达到吸引企业投资培训项目的预期效果。企业高度依赖政府进行人力资源的培养。这就印证了一些学者的看法,即韩国的职业培训体系仍然是在对企业的强制管理下进行运作。此外,韩国中小企业面临着技能工人紧缺以及中小企业熟练技能工人频繁跳槽至大企业的窘境。因此,政府如何有效介入培训市场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命题。可以这样说,韩国现有的职业培训体系成功地从宏观层面反映出了行业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在应对产业结构变革时,没有做到有效整合培训体系的各个方面,从而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韩国职业培训体系的各

个方面仍坚持固有模式,拖延执行新政策,这正是问题所在。因此,出台具有创新性的职业培训政策用以改善培训效果迫在眉睫。

第四,如何有效利用韩国职业培训模式经验,也是我国在借鉴过程中需要思考的问题。韩国在经济发展初期,通过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援助,得以修建大量的职业培训设施,特别是随着设施设备的迅速开发,保证了韩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服务于经济发展的优秀劳动力输出的培训体系。中国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状况、国家发展战略、产业布局等具体国情,在深入思考后制定并实施因地制宜的职业培训政策。

参考文献:

[1]王义智,李大卫,董刚,张兴会.中外职业技术教育[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454-457.

[2]陶蓓.韩国职业技术教育的现状及趋势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研究,2006(8):57-58.

编辑 许方舟 校对 郭伟

(上接第 36 页)

② Gawad-Kalinga 译为“给予照顾”,官方称为“Gawad-Kalinga 社区发展基金会”项目,发起于1995年12月26日。该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扶贫和国家建设活动,其目标是到2024年帮助500万个贫困家庭脱贫。

参考文献:

[1][7]田静.从隔离走向融合:学校与社区的关系与变革探析[J].继续教育研究,2010(2):107-109.

[2]Lela Costin. School Social Work Practice: A New Model [J]. Social Work, 1975(20):135-139.

[3][加拿大]迈克尔·弗兰.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M].加拿大多伦多国际学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64.

[4]Novella Z. Keith. Can Urban School Reform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Be Joined? A Potential of Community Schools[J]. Education and Urban Society,

1996, 28(2):237-268.

[5]刘欣宝.家校合作创新模式与国内外经验借鉴[M].哈尔滨:哈尔滨地图出版社,2006:183-266.

[6]彭茜,郭凯.家庭、学校和社区合作的功能及其运作机制[J].教育评论,2001(4):28.

[8]Stuart A. Anderson. The Community School in the Philippines[J]. The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1958,58(6):337-343.

[9]Floyd W. Reeves, Viriato Camacho, Paul R. Hanna, A. C. Lewis. Report of the Mission to the Philippines[Z]. Paris: UNESCO Educational Missions, 1949:36.

[10]City Government of Cabuyao [EB/OL].http://www.cityofcabuyao.gov.ph/profile.php, 2015-02-15.

编辑 许方舟 校对 郭伟

质量与公平并行:澳大利亚中小学教育改革探析

文 / 黄艳霞

摘要:近年,澳大利亚对中小学教育进行了质量与公平并行的全面改革,在教育质量方面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竞争力,使其满足社会需求;在教育公平方面强调结果公平,并将之与教育质量联系在一起。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加强教育硬件设施建设、制定国家统一课程、提升高中生职业技能、建立全国智慧学校伙伴关系、加快信息化进程、促进机构建设与信息公开等。以上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着教师能力有限、资源投入不足、课程灵活度不高等问题。

关键词:教育质量;教育公平;中小学;教育改革;澳大利亚

一、背景

澳大利亚政府、社会和学校一直以来高度认可且非常重视教育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据经合组织发布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报告显示,澳大利亚中小学教育质量自 2000 年以来处于下滑状态。2000 年,澳大利亚学生成绩在 PISA 中排名第四;2009 年,该排名下降至第九位。此外,澳大利亚政府部门的多项调查显示:澳大利亚教育公平远未达到预期目标,中学毕业生就业技能不足等。为此,澳大利亚教育、就业与劳动关系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hip, DEEWR)于 2008 年提出中小学全面教育改革计划,以促进中小学教育公平,特别是结果公平,提升教育质量。

二、改革措施

(一)加强学校硬件设施建设

DEEWR 于 2009 年启动了预算为 162 亿澳

元的教育革新构建项目(Building the Education Revolution, BER),其目标是为全国中小学的硬件设施更新和建设提供支持,为学生、家庭和社区建设适于学习的环境。该计划包括“21 世纪的小学”“21 世纪中学科学和语言中心”“全国骄傲学校”三个子项目。其中,“21 世纪的小学”项目获得最多资助,约为 141 亿澳元,主要帮助澳大利亚各类小学建造图书馆、多功能教室、室内运动中心、艺术表演中心,更新和改进现有设施等;“21 世纪中学科学和语言中心”项目经费预算为 8.218 亿澳元,将在全国符合条件的中学建设新的科学实验室和语言学习中心,促进中学生相关能力的培养;“全国骄傲学校”项目经费预算为 12.88 亿澳元,主要用于中小学现有建筑修缮、校园绿化、户外学习场所建设、运动场设施完善、特殊需要学生专门设施建设等。2010 年 5 月成立的执行委员会负责对上述所有项目进行评估和审查,确保经费充分用于项目运行。此次改革还开发了新的 21 世纪小学报告工具,要求获得资助的学校通过

作者简介:黄艳霞,广西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这一工具汇报具体项目成本和实施情况。

(二)制定国家课程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学校没有统一的国家课程大纲和教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享有较大自主权。2008 年 12 月,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的教育部长在《墨尔本宣言:澳大利亚青年人教育目标》(*Melbourne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al Goals for Young Australians*)中决定,必须为中小学制定统一的国家课程大纲,全国所有学生必须达到大纲要求。自 2010 年起,澳大利亚开始在全国中小学实施国家课程大纲,该课程大纲涉及 1~12 年级所有课程内容。

澳大利亚国家课程大纲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教育公平和卓越。为了促进教育公平,国家课程大纲明确要求所有课程在目标和内容上必须包含澳大利亚所有民族和地区的信息,如土著居民和拖雷斯海峡岛民的历史和文化、澳大利亚和亚洲的联系等;对于教育卓越,国家课程大纲明确要求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数学能力、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力、批判和创新思维能力、人际和社会交往能力、道德行为能力、多种文化理解能力,且要求每类能力包含知识、技能、性格、行为四个方面^[1]。国家课程大纲的制定致力于实现《墨尔本宣言:澳大利亚青年人教育目标》中所确立的教育目标,即“培养善于学习、充满自信和具有创造力的澳大利亚人,培养了解社会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公民”。^[2]

为确保目标的达成,澳大利亚明确每门课程学习结束后每个年级学生所需达到的具体能力要求,使所有年级、所有课程的能力要求相互衔接、贯通。长期以来,教育界一直比较注重对学生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忽略课程教学对学生性格特征和行为养成的影响,而澳大利亚国家课程大纲极为重视课程教学对学生性格特征和行为养成的影响。国家课程大纲

依据能力要求明确规定了各年级学生在学完每门课程后所应达到的知识、技能、性格和行为特征要求,这为教师教学和学生评估提供了详细的依据。

(三)提升高中生职业技能

从 2008 年起,澳大利亚会在 10 年内投入 25 亿澳元,用于建立学生职业技能训练中心(Trade Training Centres, TTC),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必须让所有高中生接受职业教育和训练。TTC 工作重点包括建立地区技能培训中心或与城市联合开展技能培训;为来自农村地区或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学生,特别是土著学生,提供支持;帮助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达到三级或以上;与地方企业合作,开拓地区就业机会;改进学校已有的“从学校到工作”项目,提高 12 年级学生的毕业率^[3]。以上工作将更广泛地建立起学校、学生、企业之间的联系,为高中生提供更多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机会。

除了建立 TTC 以外,澳大利亚还将实施“年轻人转变”项目,即通过长期的教育改革,帮助中学毕业生提高职业技能,为其中学后继续接受教育或参加工作做好准备。这一项目由一系列子项目构成,如“年轻人联系”项目、“学校、企业和社区合作”项目、“年轻人合作”项目等。其中,“年轻人联系”项目主要帮助已经离校或准备离校的学生达到 12 年级教育水平;“年轻人合作”项目主要是政府与学生签订合同,以提高学生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比例,确保其具备多种技能。

(四)建立智慧学校合作伙伴关系

改革将致力于建立“全国智慧学校合作伙伴”关系(Smarter Schools National Partnerships, SSNP),促进学校间的合作与交流,提升教育质量。合作伙伴关系分为以下三类。

1. 帮助处境不利学生学校联盟

该联盟的预算为 15 亿澳元,主要任务是缩

小处境不利学生与其他学生在数学、读写、毕业后收入等方面的差距。约 1700 所学校(约占澳大利亚中小学总数的 17%) 将从该项目中获益, 获益学生人数约为 46.4 万名(约占澳大利亚中小学生总数的 13%), 其中包括约 6.5 万名土著学生(约占所有中小学土著学生的 42%)。措施主要包括激励有经验的校长和教师到弱势学校工作, 帮助学生制订个人学习计划, 鼓励学生参与学校治理, 提供成人学习项目, 鼓励跨校领导, 与地方企业合作提供生活化教学等。^[4]

2. 数学和识字水平提升联盟

该联盟的主要目标是提升澳大利亚所有中小学生的数学和识字水平, 统计各州和领地在数学和识字方面低于一定标准的学生数量, 为这些学生的水平提升提供专门资助。该联盟的预算为 5.4 亿澳元, 其中, 1.5 亿澳元将依据低于标准的学生人数分配给学校, 3.5 亿澳元用于对达到预期目标的州和领地进行奖励, 0.4 亿澳元用于为部分不发达地区的学校提供特别资助。其主要措施包括为教师提供相应技能训练和专业发展机会及必要的教学资源, 鼓励学校领导持续改进学校绩效, 鼓励学校进行交流、对学生追踪调查等。

3. 教师质量提高联盟

该联盟的预算为 5.5 亿澳元, 由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签定合约, 致力于提升教师质量。工作重点主要包括制定全国教师职业标准, 统一不同地区教师资格准入制度; 加强农村地区与偏远地区教师队伍建设; 突出大学在中小学教师培养中的作用, 建立教师和学校领导培训与提升制度。

(五) 加快信息化进程

2010 年, DEEWR 决定投入 22 亿澳元用于实施数字教育革新计划 (Digital Education Revolution, DER), 帮助学生为应对未来数字社

会做好教育、培训、生活等方面的准备。具体目标包括方便学生的网络学习, 使其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便利地获取课程等资源; 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加强学生家长与教师、学校领导的网络沟通, 为家长了解学生情况提供便利; 创新信息技术使用模式, 使师生通过数字技术达到学习目标; 帮助学校领导制定学校信息和通信技术规划。^[5]

DEEWR 将与宽带、通信和数字经济部 (Department of Broadband, Communications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紧密合作, 通过一系列项目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最重要的项目有三个: “全国宽带网络教育和技术服务”项目, 目的是通过宽带网络建设, 使教师和学生能够随时随地获取资源, 为其提供学生提供教育、培训、技能提升的机会, 为其提供终身教育服务; “网络课程资源和数字化”项目, 目的是为课程资源共享开发相应的数字系统和提供必要的硬件设施, 实现学校之间、学校内部的无缝连接; “建设网络课程支持体系”项目, 目的是为实施国家课程提供支持, 特别是提高教师的数字教学资源使用能力。

(六) 提高学校决策能力和信息公开程度

此次改革增加了地方的管理权限, 投入 4.75 亿澳元用于提高地区学校的决策能力和水平。2012-2013 年为第一个阶段, 有超过 1000 所学校参与这一项目, 其中, 约一半的学校是地区性或偏远地区的学校; 第二阶段于 2015 年开始, 主要对第一阶段的工作进行评估。

改革的另一举措是提高学校信息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为了做到这一点, 此次改革建设了新的网站——“我的学校”。在该网站上, 人们可以查阅到每一所学校的教师、课程、绩效、学生成绩调查评估结果等方面的信息。其中, 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国家课程和学校评估的信息。因为国家课程实施时间不长, 许多家长

和学生对此还不够了解,所以,网站公布了国家课程的总体目标和内容,以及各年级各门课程的具体要求。此外,全国评估项目还对各学校的教学进行评估,帮助学生和家长了解学校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墨尔本宣言:澳大利亚青年人教育目标》所设定的教育目标。学生和家长可以在网站上查阅相关学校的评估报告和不同学校的对比信息。

三、总结

(一)改革主题

澳大利亚中小学教育改革的最大特点是以提升教育质量与公平为主题。改革提出必须为所有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这不仅是为了学生的明天,更是为了提高澳大利亚的竞争力。改革主要关注学生的国际竞争力和社会需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改革特别提出实施国家课程和加强学生职业技能训练。在质量影响因素中,特别重视教师的作用,关注教师质量的提升。改革特别设立了多个项目和专门的预算,对教师信息化、教师流动、教师质量提升等提供特别资助,完善教师激励机制,建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同时,改革要求为不同群体提供同等的受教育机会,让弱势群体的学业成就得到较大程度提升,使其与主要群体的差异逐渐减小,实现结果公平。

教育质量与公平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现代化数字技术的支持,为此,信息化建设也成为改革的重中之重。为应对全球教育信息化进程,澳大利亚将信息化贯穿于中小学教育改革的三个主要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完善必需的硬件设施,为各项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第二个环节是借助信息化促进政府、学校事务的公开化和透明度,如建设“我的学校”网站、国家课程网站等;第三个环节是借助信息化改革教学各环节,如促进教师信息化能力提升、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完

善师生交流网络等。

(二)改革成效

在此次改革中,澳大利亚已经为全国实施 9~12 年级教育的学校购买了 96.7 万台计算机,生机比已经达到 1:1;建设了国家课程网站和“我的学校”网站,前者列举了国家课程大纲所有内容和各年级各课程的能力要求,后者收录了所有中小学的评估结果、绩效、学生数、教学特点等详细数据;开发了网上诊断工具,帮助教师对学生的评估结果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为学生提供改进建议和相关学习资源;开始实施国家数字和文字评估项目,每年 5 月将对所有 3 年级、5 年级、7 年级和 9 年级学生的阅读、写作、语言交流和数字能力进行评估。

学生职业技能提升改革项目为期 10 年,第一轮训练于 2008 年开始,在前三轮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约有 1060 所学校受益(约占中学总数的 40%),其中,超过 600 所学校处于偏远地区。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约有 370 个项目得以开展,经费使用达 12 亿澳元,建立了 146 个 TTC,88 个 TTC 在建,使得约 369 所学校的学生受益^[6]。第四轮项目使用经费达 1.81 亿澳元,开发了 90 个项目,约 170 所中学受益。第五轮申请已于 2013 年 4 月结束,该轮项目投入 2 亿澳元,帮助更多学校建设 TTC。

BER 项目已经为将近 9500 所学校的约 2.4 万个建设项目提供了经费支持。其中,“21 世纪的小学”项目共有 10475 个项目立项,约 7920 所学校得以修建图书馆、教室等^[7];“21 世纪科学和语言中心”项目建设了约 537 个科学中心和语言中心^[8];“全国骄傲学校”支持了约 9462 所学校的 12639 个项目立项,用于校园环境建设。第一轮项目于 2009 年完成,约有 60% 的学校完成项目;第二轮项目于 2010 年完成,约有 40% 的学校完成项目。^[9]

约有 2659 所中小学参与了“智慧学校伙伴”项目。其中,约有 1075 所学校加入数学和识字水平提升联盟,约有 1100 所学校(约占澳大利亚所有中小学校的 11%)和 41.7 万名学生(约占澳大利亚所有中小学生的 12%)受益,其中包括约 2.8 万名土著学生(约占澳大利亚中小学土著学生的 18%)^[10];帮助处境不利的学生联盟的成员学校约有 1737 所;2659 所中小学参与了教师质量提高联盟以提高教师水平。

2008-2010 年,改革制定了 1~12 年级的英语、数学、科学和历史课程大纲;2010-2012 年制定了 1~12 年级的地理、外语和艺术课程大纲;2011-2013 年,制定了 1~12 年级的健康和体育、技术(信息技术、设计技术)、经济和商业、公民学等课程大纲。目前,澳大利亚国家课程大纲的制定已全部分期完成,所有课程大纲亦在课程网站公布,所有人可自由查询。此次改革还成立了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管理局(Australian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Authority, ACARA),该局由 13 个理事会组成,理事会成员由各州和领地政府任命的专家组成。该局除负责制定国家课程大纲外,还负责全国中小学课程的管理和评估,为课程实施提供各方面的支持。目前,ACARA 不仅完成了所有国家课程大纲的制定和国家课程网站的建设,还制定了各个年级国家课程评估标准和细则,用于指导教师教学和学生学学习,满足公众对中小学绩效信息了解的需要。

(三)改革挑战

DER 建设主要为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了硬件设施,但是,要使其促进教育质量提升还需要不断的努力。首先,教师使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需要不断提高,特别是将现代信息技术用于教学方法和内容创新的能力需要提高,更多的时间和资源需要投向教师培训;其次,由于“我的学校”网站和国家课程网为家长和

学生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小学绩效、学生各科考试成绩等方面的信息,有可能导致绩效暂时不高的学校受到家长的歧视,从而处于更不利的境地。

中学生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已经建成,其最大的难题是如何确定技能的内容和培训的方法。由于社会发展较快,对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学校需要不断更新其技能要求标准和培训内容。了解相关就业信息、制订新的技能标准、更新教学方法和内容,都需要持续的资源投入。

学校的教室、运动场等硬件设施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目前也依据政府改革的要求,向社区开放这些场所和设施。学校也依据维护的需求,向使用学校设施的社区居民收取一定的费用。这些费用非常低,难以满足设施维护的需要。

澳大利亚国家课程大纲的实施也存在着一些难题。首先,是全国课程大纲与课程灵活性的矛盾。虽然该课程大纲指出,在达到标准的基础上,教师可以灵活安排教学过程和教学内容,但是全国共用一套标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不同地区、不同学校教学的灵活性,特别对于特殊群体(如母语非英语人群、经济条件不利人群、残障人群等)。其次,是资源需求大与资源有限的矛盾。国家课程大纲要求学校教好每一名学生,而要真正达到这一目标,还需要更多的资源保障。

参考文献:

[1][2]Australian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Authority. General Capabilities in the Australian Curriculum[R].Sydney: ACARA, 2012.

[3]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Trade Training Centres in Schools Program. Program Guidelines[Z]. Canberr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2012.

(下转第 51 页)

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基础教育的改革

文 / 杨志明 孙河川

摘要:美国的高等教育堪称世界一流,但其基础教育质量不容乐观。自 2009 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对美国基础教育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其中包括通过加速立法促进教育改革;加大对基础教育的经费投入;提高教育教学标准以提升学生学业成就;更新教育评估指标体系;制定新的校长和教师评估标准;打造高效优质的教师队伍;实施问责奖优的教育政策;以教育经费为杠杆,推动教育问责和教育中央集权化。

关键词:美国;奥巴马政府;基础教育;教育改革;教育立法;经费投入

2009 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美国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导致中青年失业率不断上升、众多企业濒临倒闭、基础教育质量下滑等棘手的社会问题。2009 年 11 月,奥巴马当选美国第 44 任总统,并开始采取多项变革策略来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基础教育变革被视为振兴美国经济的核心国策之一。基础教育的成败事关每名儿童及其家庭,奥巴马认为“实现更平等、更公平和更公正社会的关键是打造世界一流教育,每一名美国儿童都应该接受世界一流教育。美国必须改革学校,提高学生成绩,缩小成绩差距,帮助儿童成功^[1]。”奥巴马政府对美国的基础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包括加速教育立法、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提升中小学校教育质量等。

一、加速教育立法

针对基础教育,奥巴马政府加速教育立法,

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律,旨在从国家层面加强对基础教育的关注程度和扶持力度,改善美国基础教育的薄弱地位,为促进美国基础教育发展成为世界一流教育奠定基础。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政府颁布了不少具有重要意义的教育法律,以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提升。其中最典型的有 2009 年颁布的《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2010 年颁布的《改革蓝图:中小学教育法再授权》(*A Blueprint for Reform: The Reauthorization of 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教育是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项目,旨在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技术素养、工程素养和数学素养。时至今日,通过立法的形式,STEM 教育已成为美国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奥巴马在 2015 年国情咨文演讲中,再次提出一系列教育改革举措,如加强全美的基础教育、增加对早期教育的投入

作者简介:杨志明,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孙河川,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国家一般课题“教育督导评估指标体系的国际比较研究”成果(编号:BDA120028)

等,使得教育改革成为全美的关注焦点。由此可见,美国政府近六年来将发展基础教育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为了有效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加速制订、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二、加大经费投入

奥巴马政府始终将提升基础教育质量作为振兴美国社会的动力和源泉,政府每年通过制订法律加大对基础教育的经费投入力度,改善基础教育薄弱的局面。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任不久就签署了《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该法明确指出“将教育置于优先发展地位,向基础教育投放 800 多亿美元”^[2]。可见,奥巴马政府将提升基础教育质量作为美国教育变革的首要任务,并辅以资金扶持,促进学校的变革和发展,以提高学生学业成就,激发教育系统活力,为政府推行后续的基础教育变革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财政上,美国联邦政府拨款 5000 万美元用于“中学毕业促进计划”^[3]。在 2011 年财政预算中,对中小学学生的 STEM 教育投入高达 10 亿美元;在 2013 年财政预算中,教育经费达 698 亿美元,较 2012 年度的 681 亿美元增加了 17 亿美元,增长幅度为 2.5%^[4],其中,1.5 亿美元用于监测和收集学生从学前教育阶段到高中毕业阶段的成绩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可以判断和了解学生的成长过程,了解学校校长和教师是否为改进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质量采取了有效的策略和方法、学校教育效能和教学效能的质量、学生之间的成绩差异等,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奥巴马在 2015 年国情咨文中表示:联邦政府计划增加 27 亿美元的教育经费投入,共计 750 亿美元。其中,弱势群体幼儿教育成为 2015 年美国基础教育关注的焦点之一。

三、全方位提升教育质量

2010 年 3 月,美国联邦教育部发布了《改革蓝图:中小学教育法再授权》,奥巴马政府对布什政府于 2002 年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进行了修订。随后的一段时期,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改进措施。

(一)提高教育标准,提升学生学业成绩

奥巴马政府倡导将全美各州的教育标准上升至世界级标准(World-class Standards),鼓励全美各州修订更高的学业标准,更新评估标准。一方面,提高所有学生的学业成绩,为其今后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或就业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通过提升评估标准,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学校的办学质量,如《改革蓝图:中小学教育法再授权》就提出要为学生制订更高的学业标准,并且鼓励各州依据这一标准,修订或制订评估指标体系,改变以往的学生评估体系,为学生步入大学及就业做好充分的准备。此外,2013 年奥巴马政府提出“连接教育”计划(Connect ED),将《国家教育技术计划》中的设想转为现实,力争让学校拥有现代化技术设备,让每个地区的教师和学生通过互联网实现对优质数字化学习资源的有效利用。奥巴马还表示,在学校放假期间,众多学生容易遗忘已学知识,延长学生的在校学习时间对于提高学生学业成绩和技能非常重要。

(二)及时更新教育评估指标体系

美国联邦政府鼓励各州改进其教育评估体系,使之与新的教育质量相匹配,即更新之后的评估指标要能够提升中小学办学质量、提高学生学业成绩,为其继续接受教育或就业做必要的准备。新的教育评估指标体系一方面能够更加精确地评估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发展状况,以此了解学生是否掌握了未来发展

所具备的知识与技能;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测评州、学区、学校、校长和教师是如何教育学生的,帮助教师改进教学,统计出来的评估数据信息也能供家长和学生清楚地了解学生的水平。在美国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奥巴马政府对基础教育评估采取了继承与发展的举措。在完善教育督导评估指标体系的过程中,不仅保留了全美传统的每年开展的阅读与数学测评等项目,而且为评估体系增设了新的教育要素,如加入了学生的出勤率、毕业率、学校氛围等项目,将评估指标具体化并增强其可操作性,同时,减少了考试成绩在评估学生和教育质量中所占的比重^[5]。此外,着重强调用更科学的评估方式和方法确保评估的可靠、有效、切实可行。

(三)制定新的校长和教师评估标准

奥巴马提出,联邦政府教育改革的目标是“提高校长和教师的工作绩效,确保优秀的校长和教师能够分布于每一所学校和每一间教室”^[6]。各州政府要制定新的校长和教师评估标准,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相应的校长和教师评估指标体系。此外,校长和教师的评估标准主要依据学生学业成就的进步幅度、课堂行为表现等指标来确定,进而确保各州之间高效校长、高效教师与高效学生的共同发展。

(四)打造高效优质的教师队伍

奥巴马认为,“要想取得教育改革和创新的成功,关键在于教师;美国青少年素质的高低,以及美国未来的发展状况也取决于教师”。因此,奥巴马政府成立以来始终将教师改革作为教育改革事业的核心,主张吸引优秀人才,将其融入教师队伍,留住现任优秀教师,保证中小学办学质量的稳步提升。为此,美国联邦政府专门设立了 50 亿美元的专项奖励资金和创新基金,其中,43.5 亿美元用于奖励教师^[7]。同时,通过“美国职业阶梯”计划,鼓励优秀的

专家和教师到相对薄弱的学校任教,以发挥其引领作用,改变教育落后状况。奥巴马在 2012 年国情咨文中对教师在教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予以充分肯定,指出一名好教师能够让一位梦想摆脱困境的孩子获得良好的发展机会。随后,奥巴马在 2013 年度财政预算中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对 STEM 教育的投入。他承诺,“为了让学生毕业后能够掌握胜任未来工作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在未来的 10 年内我们要培养 10 万名科学和数学教师”。奥巴马政府专门设立了“教师服务奖学金”,并规定在师资匮乏的地区任教满四年的大学毕业生可获得等同于研究生两年学费的奖励资助。以上举措对于吸引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优秀人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五)实施问责奖优的教育政策

奥巴马政府采用了新的问责制,强调通过严格奖惩的激励方式,鉴别学校的效能高低和学生在学业及其他方面的进步幅度。奖励办学效能高、学生进步幅度大、与其他学校差距减小的学校。对于办学效能低下、学生无明显进步的学校实行严格的问责,并以学生州统考成绩等数据为证据,对效能低下的学校采取干预措施,要求各州对未取得明显进步且成绩垫底的 5% 的学校,采取多种措施以推动其教学改进。目前,美国各州都存在薄弱学校,教育效能和教育质量低下是这些学校发展不利的根本因素。奥巴马政府非常关注这些薄弱学校的改进,在新版《中小学教育法》中承诺尽量满足薄弱学校的要求,从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加大对各州薄弱学校的扶持力度,不断寻求更加有效的改进措施,积极帮助其提升效能、摆脱困境。此外,联邦政府积极支持一些具有一定基础的学校开展创新性教育,不断提升学校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例如,《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规定将 6.5 亿

美元用于资助各州和地区的教育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开展教育创新项目。

四、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

(一)以立法的形式继续推进基础教育改革

奥巴马政府为了保证既定教育目标的实现,以立法的形式体现国家对基础教育的关注程度,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措施,强化改革的执行力度。奥巴马政府不断推出相关立法以保证基础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主要表现为继承、改进和创新。奥巴马政府基于对美国基础教育情况的掌握,对于一些优秀的教育方式和理念予以保留,对前任领导人颁布的相关教育法律进行修订,并在此基础上规划全美基础教育发展的长期和近期目标,提出新的教改目标,引导全美各州围绕国家教育目标开展基础教育改革。此外,美国联邦政府因学校发展程度不同,给予各校不同的物质和政策支持。一方面,针对改革时期出现各种问题的薄弱学校,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教育法律,更加明确政府对不同程度薄弱学校的扶持程度,如人力、财力、物力等多方面的投入以及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鼓励具有发展潜力的示范学校积极推进教育创新,进一步提升学校办学质量和办学效能。

(二)以经费投入为杠杆,实现教育的中央集权化

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社会出现了各种复杂问题,其中,在教育方面反映最突出的是各州政府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基础教育的发展。对此,奥巴马政府巧妙地将教育经费的投入作为教育改革的指挥棒,利用经费投入杠杆,强制各州教育主管部门按照联邦政府的要求,积极主动地开展中小学改进活动,为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法制基础和问责基础,为社会注入

了新的活力。自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领域的投入,一方面是为了继续推进教育改革,巩固改革成果;另一方面是为了让教育事业带动美国经济的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奥巴马政府在基础教育领域的经费投入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全美各州对中央政府的经费依附程度越来越高。因此,美国联邦政府在全美各州教育事务上的影响力和干预能力得到了强化,逐步朝着中央政府教育集权化的方向发展。

(三)制定高标准,全方位提升基础教育质量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美国基础教育无论在办学理念、经费投入,还是在教育公平、师资质量等方面均出现了诸多问题,教育质量明显下滑。美国联邦政府在制定教育标准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改进措施。第一,提高全美教育教学标准,以此来扭转学生知识和能力与当今时代需求不符的局面。第二,更新教育评估指标体系,提升评估标准。尽管全美各州都制定了自己的教育评估标准体系,但是州与州之间的评估标准参差不齐,部分地区的评估标准相对较低,要求中小学生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很难与国家发展水平和要求相匹配。为了更精确地评估学生的学业成就,更好地评定学生是否掌握了获得成功所需的技能,联邦政府建立了更适合测评学生发展、教育质量和教育效能的监测数据系统。第三,制定新的校长和教师评估标准,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师资队伍。领导层是中小学校的灵魂和核心,而教师的专业素质直接影响学校办学质量的高低,两者共同决定着学校的教育质量、教育效能和未来发展。因此,制定专门的评估标准来督导校长和教师十分必要。第四,推出以问责奖优为主的教育政策,激发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教育

效能。第五,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扶植力度,进而改变其发展的困境;对于已经脱离办学困境的学校,则应支持其进行改革创新,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为了让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领域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不断加大对 STEM 教育的支持力度、深度和广度,反复强调将网络技术引入美国的每一间课堂。在学生的学习时间维度上,他提出向亚洲国家学习,延长全美中小学学生的在校学习时间、作业时间等。

参考文献:

[1][6]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Planning, Evaluation and Policy Development. ESEA: A Blueprint for Reform[EB/OL].<http://www2.ed.gov/policy/elsec/leg/blueprint/index.html>,2015-06.

[2]Recovery.Gov.ContractGrant and Load Programs

[EB/OL].<http://www.recovery.gov/Transparency/fundingoverview/Pages/contractsgrantsloans-details>, 2015-06.

[3]张晓娟,薛留增.美国 2010 财政年度教育预算综述[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09(6):57-59.

[4]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Fiscal Year 2013 Budget Summary [EB/OL].<http://www.ed.gov/about/overview/budget/budget13/summary/13summary.Pdf>, 2015-06.

[5]史静寰.当代美国教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90-191.

[7]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Guidance on the State Fiscal Stabilization Fund Program [EB/OL].<http://www.ed.gov/programs/statestabilization/guidance.pdf>,2009-04.

编辑 朱婷婷 校对 吴婷

(上接第 46 页)

[4]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Smarter Schools 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School Communities Fast Facts [Z]. Canberr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1.

[5]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Strategic Plan to Gui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gital Education Revolution Initiative and Related Initiatives[R]. Canberr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8.

[6]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Trade Training Centres in Schools Program: Delivering on Time and Already Achieving Results[R]. Canberr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2.

[7]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Primary Schools for the 21st Century Successful Schools and Projects [EB/OL].

<http://deewr.gov.au/primary-schools-21st-century-successful-schools-and-projects>, 2013-07-02.

[8]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Science and Language Centres for 21st Century Secondary Schools Successful Schools and Projects[EB/OL]. <http://deewr.gov.au/science-and-language-centres-21st-century-secondary-schools-successful-schools-and-projects>, 2013-07-02.

[9]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National School Pride Program Successful Schools and Projects[EB/OL]. <http://deewr.gov.au/national-school-pride-program-successful-schools-and-projects>, 2013-07-02.

[10]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Smarter Schools 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literacy and Numeracy Fast Facts[Z]. Canberr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1.

编辑 朱婷婷 校对 吴婷

• 孔子学院:中国与世界的纽带

编者按:习近平主席指出,孔子学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自 2004 年 11 月 21 日,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成立以来,孔子学院积极开展汉语教学和文化交流活动,为推动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 2014 年 12 月 7 日,全球 126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475 所孔子学院和 851 个孔子课堂。孔子学院已不再是单一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而是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文明使者,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交流、互鉴、合作的新平台。

用热爱与坚持铸就中赞友谊的桥梁

——访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何懿

采访、整理 / 潘雅 张金晓

摘要: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创建于 2010 年,自揭牌以来,越来越多的赞比亚人开始学习汉语。赞比亚大学校长曾评价说,孔子学院项目把中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上了新的高度。何懿教授于 2010 年受国家汉办及河北经贸大学选派,到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工作,担任中方院长。学院从初期筹备到现在的发展壮大,何懿教授不辞辛劳,亲力亲为。在 2008 年第三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上,她被评为全球孔子学院年度先进个人。2014 年,赞比亚教育部为表彰其为传播中华语言和文化,促进中赞传统友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特颁发嘉奖信。何懿教授指出,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是中赞友谊的桥梁;孔子学院应通过多元化方式推进本土化汉语教学,并尊重当地的国情与民俗;对外汉语工作者不但要具备优秀的综合素质,还要对这份事业有着强烈的热爱,拥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关键词: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语言和文化传播;交流与合作;对外汉语工作者

一、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是中赞友谊的桥梁

《世界教育信息》: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成立的背景。

何懿: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位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直接领导,河北经贸大学与赞比亚大学合作建设,成立于 2010 年 7 月 26 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委员戴炳国先生出访非洲四国时,在赞比亚总统府签署协议并授牌,赞比亚大学校长与河北经贸大学党委书记共同接受孔院牌匾。2014 年 6 月,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访问赞比亚期间,出席了中赞孔子学院大楼的奠基仪式。

中赞友好源远流长,赞比亚是非洲中南部地区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两国在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采访整理:潘雅,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世界教育信息杂志;张金晓,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

赞比亚开国元勋卡翁达总统与毛泽东主席的友情、坦赞铁路等,都是中赞两国人民耳熟能详的见证两国密切关系的事例。因此,在赞比亚建立孔子学院对于进一步发展中赞友好合作关系,加深传统友谊有着长久重要的意义。

2010年,河北经贸大学党委响应国家汉办号召,果断做出抽调高水平师资力量,与赞比亚大学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的决定。学院成立之前,河北经贸大学多次派出主管外事的校长及国际交流中心主任等相关负责人前往赞比亚大学洽谈、协商。当年7月,河北经贸大学党委书记率团前往赞比亚接受孔子学院牌匾,并与赞比亚大学签署了两校合作办学的执行协议。我接受了国家汉办和河北经贸大学的选派,开始了建立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的前期筹备工作。在推进赞大孔子学院发展过程中,河北经贸大学校级领导高度重视,动员全校各系、各部门及广大师生参与孔子学院的建设,选派合格师资、拓宽办学渠道、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合作与管理、出台职称评定奖励机制、鼓励教师到孔子学院任教等,全力以赴支持孔子学院的发展。

二、汉语教学纳入赞比亚公立教育体系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谈一谈学院成立以来取得的进展和成绩。

何懿:5年来,我们以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为中心,在赞比亚全国建立了18个汉语教学点,开设了各种类型的汉语课及中国文化课,学生总数已达7200多人,教学成绩显著;同时,我们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方式进行中华语言和文化的传播,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赞比亚国内的3所公立大学,赞比亚大学、穆隆古希大学和铜带大学都在积极推进汉语教学的发展。在中外双方院校的努力和孔子学院的推动下,赞比亚大学学术委员会通过决议,从2013年新学期开始,将汉语正式纳入

赞比亚大学教育体系。穆隆古希大学已于2012年将汉语作为学分课程纳入大学教育体系,铜带大学也在积极行动中。将汉语教学纳入赞比亚公立大学教育体系,实现了汉语教学稳步、规范发展的良性循环。

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还与赞比亚教育部合作,在赞比亚全国10个省遴选出1所中学作为试点,开展基础教育阶段公立学校的汉语教学项目。该项目从2014年1月开始正式授课,这意味着汉语教学被纳入了赞比亚公立中学教育体系。在此影响下,赞比亚教育部在2014年发文,要求全国所有公立学校都要开设外语课程,并将汉语、法语、葡萄牙语3种语言纳入必修课程体系中,其意义重大深远。

在赞比亚大学校长及各部门的协调组织下,我们成功举办了9次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通过率达到97%;组织了5次少儿汉语水平考试,参加人数已达200人,通过率达98%;组织了2次汉语水平口语考试,2013年通过率达到100%,10多名学生获得奖学金。

除了开展常规的汉语教学和文化活动外,我们也非常注重对孔子学院项目及中赞文化异同的调研,并完成了孔子学院总部的科研项目。我们计划编写适合赞比亚特色的本土化汉语教材,并探讨如何更快、更好地融入所在国、所在大学,更好地传播中华语言和文化,尝试走出一条更适合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从建院至今,海内外大量媒体对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学和文化活动进行了采访和报道。如今的赞大孔院已经将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推向赞比亚全国各重点大、中、小学,成为当地社会瞩目的焦点。

三、孔子学院通过多元化方式推广汉语教学

《世界教育信息》: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是如何通过举办活动,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多

元化方式来推广汉语教学的?

何懿:结合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节庆,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组织了汉语演讲比赛等多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参加者达到 10734 人次。此外,还举办了国家汉办组织的“孔子学院大春晚”等文化活动,高达 1.4 万余人次参与其中。2013 年、2014 年春节期间,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积极配合国家汉办网络孔子学院,在赞比亚大学及其他教学点选拔节目参加“孔子学院网络大春晚”活动。2013 年、2014 年春节前夕,在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倡导的“赞比亚中国春节庙会”活动中,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教师、志愿者和学生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我们还在赞比亚当地组织了中国电影展、中国建设成就展及中国传统节目展示,深受好评,获得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颁发的优秀组织协调奖。

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与赞比亚国家电视台于 2012 年 8 月开始合作拍摄中华语言、中华武术等电视节目。这是首次在赞比亚开设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传播节目,对促进中赞文化交流具有深远的影响。该合作项目至今运行良好,节目内容越来越丰富,学生及当地民众参与踊跃,社会反响强烈。此外,我们与赞比亚大学广播电台合作的文化宣传节目连续播出了 3 年多,收听率达到 70%。赞比亚大学网站上还专门设立了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网页,反响良好。

四、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和教育援助事业

《世界教育信息》: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除了在汉语推广方面作出了大量贡献,还积极推动当地公益事业和教育援助事业的发展,请您详细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何懿:从建院至今,我们一直热心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为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树立了良好形象。2012-2014 年,赞比亚大学孔子学

院连续 3 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与中国水电集团赞比亚分公司、中国援赞医疗队合作举办“六一情暖孤儿院,中赞友谊亲体验”活动,向孤儿院捐赠介绍中国风光及文化的书籍和光盘,并带领孤儿院的儿童到中国水电建设工地参观,亲身感受中赞友好。

为彻底改善办学条件,我们一直积极推进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大楼建设项目。在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的积极支持下,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多次与赞比亚司法部、教育部、工程部官员,以及赞比亚大学校长协商,加快了项目进程。2012 年第七届孔子学院大会期间,我们与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积极配合,邀请了赞比亚大学校长、理事会理事长及赞比亚教育部、工程部的官员亲往中国,签署了《援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大楼设计合同及初步设计审查会议纪要》。2013 年 12 月,中赞双方签署了大楼施工合同。2014 年 6 月,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了中赞孔子学院大楼奠基揭幕仪式,引起了广泛关注。该大楼的建立是一项标志性工程,将极大地改善孔子学院的办学设施,提升孔子学院的外在形象,加快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传播。

我们还选拔赞比亚当地教师参加中国国家汉办组织的本土汉语师资培训等活动,使赞比亚当地的汉语教师队伍得到了良好的建设和发展,并积极配合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及河北经贸大学,选拔了赞比亚教育部、公立大学高层管理人员和教师参加中国商务部主办的非洲地区经贸类教师培训、校长论坛及其他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了两国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了合作与交流。

五、孔子学院积极迎接挑战,发展势头良好

《世界教育信息》: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未来的发展规划是怎样的?

何懿:由于在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差异,在与赞比亚同事合作的过程中,他们的办事风格和工作效率有时候令中方工作人员颇为烦恼,合作过程中也产生过一些不和谐。关于如何应对困难,我认为,合作双方需要相互宽容与谅解,多为对方着想,学会从另一个角度去考量事物,权衡得失,多多包容。

关于面临的挑战,由于赞比亚是经济欠发达国家,要在更深、更广的层面开展汉语教育也就受到限制,如受办学场地和办学资金的制约等,孔子学院的办学规模受到限制。因此,我们需要因地制宜,逐步改善和利用当地的办学优势,扬长避短,灵活应对孔子学院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为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制定了清晰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第一,进一步密切合作双方大学的联系,开展“2+2”或“3+1”合作培养本科生及师资交流项目。第二,加快培养本土汉语教师的步伐,选拔当地优秀教师和学生,到中国或在本地接受培训,让本土化的种子尽快生根发芽,不断成长。第三,加强岗中培训,建立在职教师和志愿者的考核、考察制度,确保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第四,根据非洲特殊情况,和相关部门、大学、学院及企业合作,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项目,开设实用性课程,如实用商务贸易、中医养生保健、中华武术技能、中文翻译、中文导游、中文秘书、中华厨艺、汽车修理、农业养殖等课程,把语言教学和实用技能培养结合起来。第五,加强与中国在赞企业及赞比亚大中型企业的联系,合作办学或开展文化活动,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提升市场开发及自我发展的能力。第六,进一步扩展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传播的空间。目前,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已经走出首都卢萨卡,发展到了全国,形成了“一院多点”的办学模式,而且教学方式和手段也日趋多样化。除

常规教学外,还有孔院动态网站、广播汉语教学节目及电视汉语和文化传播节目。网络及远程教育空间还很广阔,前景良好,我们将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方式及手段,让中华语言和文化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第七,目前,我们申报了两所孔子课堂。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考虑申报更多的孔子课堂,并使之成为当地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的示范课堂。第八,开展大学和中学汉语夏(冬)令营、“汉语桥”及各类中文比赛项目,继续组织各类访华团,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及讲座,增进当地社会团体及民众对中国的直观了解,增进中赞两国人民的感情。第九,孔子学院大楼竣工后,将大大改善办学条件,我们将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加大汉语教学与文化活动开展力度。第十,我们正在筹建赞比亚文化研究中心,力争尽快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扩大与非洲其他国家及全球孔院的联系与合作,出版语言和文化刊物,培养汉语教学及文化研究兼通的新一代汉学家。

六、语言是沟通与理解的桥梁和纽带

《世界教育信息》:您怎么看待孔子学院,在全球特别是非洲地区的发展?要成功开展对外汉语教育,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何懿:孔子学院在非洲地区发展很快,这有着诸多原因。首先,非洲人民热情友善,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感。随着中国对非援助力度的加大,与非洲各国交往的日益密切,无论从文化还是实际需求上考量,非洲人民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热爱都在与日俱增;其次,非洲人的语言天赋高,接受力强,这也促使了孔子学院在非洲地区快速而顺利地发展;最后,中国与非洲地区国家在经济等领域有着密切的合作,双方对汉语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这也鞭策着孔子学院的发展。

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的创建和发展,加速

了赞比亚大学和河北经贸大学国际化发展的进程。校际间的合作、师生的交流、各种项目的运行，带来了更多的新理念与先进的办学模式，促进了办学思路的改变、办学模式的更新、办学方法的改进与提高。与此同时，汉语教学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开展，改变了赞比亚人民对中国的看法，甚至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节奏。他们过去通过武打电影及道听途说得来的中国印象，被亲身感受中国、体验中国文化、目睹中国人的工作作风及办事效率与风格所取代。孔子学院以语言和文化架起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桥梁，消除了语言障碍，解除了误解，增进了友谊，促进了交流。

语言是沟通与理解的桥梁和纽带，孔子学院在非洲的发展对中国与非洲国家来说都是好事，消除了语言障碍，扩大了交往，拓展了合作深度与广度，增进了互相理解，发展了传统友谊。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孔子学院发展过程中，要尊重非洲国家的国情与民俗，平等相处，和谐发展。

七、热爱是对外汉语教育工作者的永恒动力

《世界教育信息》：成为一名合格的对外汉语教育工作者，应该具备哪些素养？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又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何懿：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对外汉语教育工作者，除了必备的专业知识、教学技能、中华才艺及独立工作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外，最重要的是对这份工作或者说这一事业持有特殊的热爱。热爱会让你永远保持旺盛的精力和良好的心理状态；热爱会使你勤勉努力、全力以赴；热爱会让你不辞辛劳、无私奉献；热爱激励着你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锲而不舍！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除了以上的要求外，更重要的是人性化加制度化的管理，具有海纳百川、宽容大度的胸襟，灵活

机动地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及以不变应万变的冷静与沉着。

《世界教育信息》：您当年是怎么走上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与推广之路的？您对未来要踏上对外汉语教育之路的年轻人有何指导性的建议？

何懿：我从小就有走遍世界、传播文化的梦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教师、当记者是我的职业理想。到大学任教后，我从事新闻采编与写作评论的教学工作，自己也做过兼职记者、编辑等工作，并担任新闻节目专家评论员。后来，受国务院侨办选派，我两次到菲律宾任华语教学督导，负责马尼拉地区 10 多所华校的华文教学，作报告、策划专题、办演讲、搞竞赛，还利用课余时间撰写了教学教研方面的文章，在菲律宾《商报》《世界日报》《联合日报》等当地主流媒体发表。那时，我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终生热爱的事业——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从此便一发不可收。2007 年至 2009 年，我又被国家汉办、河北经贸大学选派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孔子学院工作，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化，成为当地第一位孔院汉语教师，自编了《日常汉语会话》《导游咨询行程》《认识尼泊尔》等汉语教材，还创立加德满都大学孔子学院网站，广泛传播中华语言和文化。此外，我积极配合国家汉办相关部门进行当地汉语教学实际情况的调查，并撰写了相关的调研报告等。

2004 年至 2014 年，从华语教学督导到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再到教师兼孔子学院中方院长，10 年来，我乐此不疲，对这份事业钟爱有加。我辛苦并快乐着——无论艰难困苦，疾病伤痛，孤独寂寞，远离亲人，我无怨无悔！因为我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职业，从事了自己最热爱的工作，追求着自己最美好的理想！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梦想带你飞向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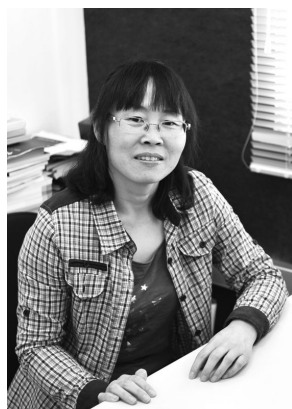
编辑 吕伊雯 校对 李广平

• 孔子学院:中国与世界的纽带

打造中巴教育文化交流的互动平台

——访巴西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乔建珍

采访、整理 / 郭 伟 潘 雅



摘 要:巴西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以下简称里约孔子学院)是里约热内卢市的第一家孔子学院。里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乔建珍担任里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期间,她编写了《精英汉语》《跟我学汉语》等教材,并亲自讲授“中国文化介绍”“中国语言与文化”等课程,其中,“中国文化介绍”课程是目前全球唯一一门用葡萄牙语讲授的有关中国文化的课程。为表彰其在中巴文化教育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2014年6月,巴西劳动部授予乔院长五一劳动者勋章,这也是该奖章首次被授予外国人。为充分了解里约孔子学院在中巴文化教育交流中的作用,本刊对乔院长进行了专访。

在采访中,乔院长指出,里约孔子学院是中巴文化教育交流的产物,在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开设课程、教学质量等方面不断改进,并积极在巴西开展一系列教育援助活动,深化了中巴之间的友谊;巴西政府非常重视并积极推动教育国际化进程,里约孔子学院应明确自身责任,更好地发挥中巴合作交流的桥梁作用。

关键词:里约孔子学院;教育援助;合作交流;教育国际化

一、里约孔子学院是中巴教育交流的产物

《世界教育信息》: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里约孔子学院的发展历程。

乔建珍:里约孔子学院由中国国家汉办和巴西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签约成立,中方合作院校是河北大学,于2011年8月31日正式揭牌运营。成立以来,里约孔子学院开设了一系列汉语课程,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

2012年,里约孔子学院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文化周活动,开设了“功夫班”,举办了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中巴关系等主题的讲座,在里约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同时,里约孔子学院的“汉语”及用葡语讲授的“中国文化介绍”两门课程进入了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的学分制体系。2013年6月,里约孔子学院和里约州政府在州长宫签署了合作协议,将“中国语言与文化”课程纳入里约州立职业学校的正式课程体系,这在巴西历史上尚属首次。2013年7月,里约孔

采访整理:郭伟、潘雅,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世界教育信息杂志编辑、记者

子学院参加了由州政府组织的“艺术周”活动,其中,剪纸、折纸等中国文化活动引起了中学师生及家长的极大关注。2013年7月,里约孔子学院组织了首届“里约孔子学院夏令营”活动,20位来自巴西3个州的4所大学的孔子学院学生度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文化体验之旅。2013年10月,里约孔子学院组织了巴西第一支教育工作者访华团,该访华团以里约州教育厅厅长和一位联邦议员为领队,共10人,进行了为期10天的河北省高校、中小学、双语学校,河北省教育厅,国家汉办,巴西驻华使馆等参观交流活动。2014年9月,里约孔子学院和州政府合作的双语学校大楼正式举行揭牌仪式。2014年11月,我本人接受巴西影响最大的媒体——《环球报》(O GLOBO)专访,专访内容以“汉语将成为巴西第二语言”为题,该报道在巴西引起了极大的轰动。2014年11月,里约孔子学院在圣灵州联邦大学举办了首次中国文化周活动,这是充分落实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巴西时两国元首见证签署的“在巴西联邦大学开设汉语课程”协议的前奏,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2014年12月,在厦门举办的全球孔子学院大会上,巴西里约孔子学院获得“全球优秀孔子学院”称号,是当年拉美地区唯一一所获此殊荣的孔子学院。2015年2月,巴西首所葡中双语学校正式进入运行阶段。这标志着中巴文化教育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里约孔子学院发展硕果累累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谈谈里约孔子学院的最新发展动态。

乔建珍:2015年,里约孔子学院在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开设课程、教学质量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首先,教学点由原来位于里约

市的2个扩大到了分布在3个州的6个。除继续为其所在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国际交换生开设学分制课程——“汉语”“中国文化介绍”,及为里约州立职业学校开设的“中国语言与文化”课程外,里约孔子学院在另外两个州——圣灵州和戈伊亚斯州开设了新的教学点,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巴西民众对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需要。圣灵州联邦大学教学点的开办是充分落实中国国家汉办和巴西教育部于2014年7月签署的在巴西圣灵州联邦大学开办汉语教学首个教学点的举措。对此,新华社、国家汉办主页以“学中文为认识世界打开新窗口”为题进行了报道。戈伊亚斯州阿纳波利斯私立大学的汉语教学点也已经开始正常授课,该州政府和当地市政府极为重视。这也是他们自20世纪90年代和河北省建立友好省州关系以来第一次将汉语纳入学校课程。汉语课程的引入让他们颇为自豪。

2015年,里约孔子学院新到任6位志愿者。志愿者不熟悉当地语言,而巴西人的英语水平普遍不高。为此,我们积极协调了各开设汉语课程的大学,免费为新来的志愿者提供葡语课程,以帮助其尽早突破语言关,尽快投入工作。另外,针对志愿者缺乏教学经验的问题,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每周集体备课、相互听课、老志愿者带新志愿者等,还通过视频备课将总部和其他州教学点的教师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切磋,共同备课,畅谈经验教训。这大大提高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深得学生好评。

同时,按照这学期的实际教学情况和志愿者人数,我们设置了志愿者行政岗位,让教学任务相对较少的志愿者担任行政工作,并根据每个志愿者的特长将教学以外的工作责任到

人。此举充分调动了志愿者的工作积极性,使其有机会充分展示自己的潜能,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这是他们在国内不会拥有的经历,深受志愿者教师欢迎。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介绍一下里约孔子学院在办学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

乔建珍:里约孔子学院自建立以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第一,我们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课程全部被纳入学分制选课系统。第二,课程设置不断完善,课程门类不断增加。除了普通汉语课程外,我们还开设了“商务汉语”“书法与国画”等课程。第三,办学规模稳步提高,学生来源多样,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并得到大量巴西网民的支持。第四,在巴西乃至整个拉美地区的影响力逐渐提高。国内外媒体曾对里约孔子学院的工作进行过多次报道,其中不乏《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美洲版)》等国家级媒体,以及巴西的《南美侨报》及最有影响力媒体——《环球报》。

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里约孔子学院毕竟成立时间短,经验不足,还有以下几点有待提高。第一,加强与国内院校合作,提高里约孔子学院教师及志愿者教师的巴西葡语水平。因为巴西的英语普及率很低,如果教师不通晓当地语言,很难进行正常教学。争取使志愿者教师在派出前就在国内接受基本的葡语培训;到岗后,需进一步接受语言培训,尽快适应岗位对语言的要求,开展较高质量的教学。第二,努力编写本土化教材。目前,巴西学校使用的汉语教材,除了《精英汉语》是针对巴西学生编写的以外,其他教材的内容大多落后于时代发展,不适合巴西国情。里约孔子学院要立足于研究型大学及学校现有的强大的葡语对外汉语教师队伍,努力开发适合巴

西学生的汉语教材。第三,努力进行本土化管理。在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学院应将管理进一步本土化,尽量体现合作办学的最大优势,提高里约孔子学院的工作效率。第四,进一步和巴西各级政府合作,扩大里约孔子学院的影响。

三、里约孔子学院积极开展教育援助活动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介绍一下里约孔子学院开展了哪些教育援助活动?

乔建珍:第一,面向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的在校学生及教职员工开设免费课程。2012年,我们和学校人力资源部合作,开设了专门针对全校教职员工的“中国语言与文化”课程,学员来自学校的各个部门。这个班的教学效果非常好,使孔子学院与学校各个院系及不同行政部门建立了紧密联系,为孔子学院各项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很大便利。

第二,2013年开始和里约州政府合作开设汉语教学实验课程,将汉语教育免费引进里约州立职业学校。巴西的就业率较低,此举也为该专业的学生就业增添了砝码,颇受师生欢迎。

第三,2014年4月,我们在里约北部的贫民窟区学校举办了一次大型文化活动,其中包括孔子学院介绍、“迷你”汉语课、太极拳表演、葫芦丝表演,使里约贫民窟区的孩子首次在自己的学校里接触了中国文化。

第四,2013年7月,应里约州教育厅邀请,我们举办了第二届艺术周活动,将剪纸、折纸、中国音乐带给学生和家,让他们近距离接触中国传统文化。

第五,2014年9月开始,为里约圣灵州联邦大学亚洲研究所的师生开设单独课程,满足他们对汉语学习的需求,方便他们未来来华开

展汉语研究。

第六,认真落实 2014 年 7 月中国国家汉办与巴西教育部签署的有关协议,并和巴西教育部一起,将汉语纳入巴西的“语言无国界”项目,服务于“科学无国界”项目的来华留学的巴西学生,协助巴西教育部、巴西科技部、巴西高等教育人员促进会的项目推动。

《世界教育信息》:由里约孔子学院主导的巴西中葡双语教学学校已经开始招生了,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乔建珍:里约州政府极为重视此项目,学校的校址选在了有着 160 年历史的原葡萄牙皇室公主的行宫,该行宫为州保护建筑,建筑的翻新施工等共耗资 800 多万美元。学校教学区的建筑面积有 1018.4 平方米,设施齐全,包括教室、图书室、实验室、体操室、音乐室、礼堂、游泳池、食堂等。

我们完全按照巴西教育体系高中阶段的要求将该双语学校定位成“全日制双语学校”,并将汉语课程的开设按不同阶段、不同目的进行了专门的设计。比如,为将来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开设 3 年制的“中国语言与文化”课程;为毕业后直接就业的高三学生开设“商务汉语”课程。同时,课程设计中增加了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和汉语口语水平考试(HSKK)的内容,服务于有志在毕业后来华留学的学生。我们还专门按照实际就业情况,针对毕业后欲在中资公司、巴西公司及与商业有关领域工作的学生,设计了商务汉语考试(BCT)培训,充分体现巴西教育为就业服务的理念。同时,在 3 年的高中课程中设置了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毽球、棋类、跳绳等)、中国传统乐器(葫芦丝、笛子等)音乐、书法、国画等课程,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四、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和质量提升 是巴西近期的教育改革重点

《世界教育信息》:近期,巴西在推动教育改革方面有哪些新举措?请您就里约州的具体情况谈一谈巴西的教育改革。

乔建珍:巴西在教育发展上不均衡,并且强调精英教育。进入新世纪后,巴西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家长送孩子上学,并将之写入法律。受教育的人数虽然逐年提高,但在义务教育阶段还是未能实现让适龄儿童全部入学的目标。相比而言,大学入学率更低,大学生的毕业率也不尽如人意。当地大部分黑人、印第安人一直以来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传统,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因此,巴西虽然在教育方面投入很高,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6%,公立学校也全部免费,但中小学阶段公立学校的条件极差,教育质量也不高。由此导致巴西中小学阶段私立学校质量较好,不过大学阶段公立学校质量较好。为解决大学阶段录取比例中的民族分配问题,巴西政府应规定将大学录取的部分配额给黑人和印第安人。

2011 年,巴西开始实施“科学无国界”项目。根据该计划,2011 年至 2014 年巴西共公派 7.5 万名学生,企业赞助 2.6 万名学生,其中分配给美国 1.8 万个名额,中国 5000 个名额。此举旨在大力促进巴西高等教育的发展,解决巴西一直以来面临的劳动力素质低下问题。劳动力素质低下是严重制约巴西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里约州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教育水平,努力促进学生就业,降低该州青少年的犯罪比例。从 2012 年起,州政府和企业与各国的使领馆、语言推广机构合作,实施复合型人才培养

项目,预计在该州建立全日制学校(巴西的学校一般都是半日制)若干所,这些学校全部为新建学校,所有学校都有合作伙伴帮助解决其师资、课程、就业等问题。这一项目实施以来颇受好评,目前已有 27 所学校在此框架下建立起来。

五、孔子学院应担起文化交流的重任, 支持巴西教育国际化发展

《世界教育信息》:巴西在教育国际化方面有何进展?

乔建珍:巴西有一系列政府支持的组织和国际化会议及各类奖学金项目来推动巴西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巴西大学科英布拉集团会议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 6 届,2014 年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球 35 个国家的大学校长、国际处处长及相关机构的代表;2015 年 3 月,巴西举办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金砖国家教育部长会议,讨论如何促进金砖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巴西的“科学无国界”计划包括“请进来”“走出去”两部分,力推巴西与世界的融合;巴西是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与相关国家的教育交流非常密切,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机会较多。

里约州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一向大力推进教育国际化。近几年,在复合型人才培养框架体系下,该州已派遣师生到不同国家进行交流。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以里约孔子学院为例,谈谈孔子学院在促进中巴交流中的作用。

乔建珍:从 2009 年至今,巴西已经建立了 8 家孔子学院,这些孔子学院成为中巴关系的桥梁。以里约孔子学院为例,除了日常的教学工作外,还参与一系列大型活动和会议的筹备及接待工作,如 2012 年的联合国环境发展大

会、2013 年的联合会杯、2014 年的世界杯、2014 年的金砖国家巴西峰会、2014 年中巴建交 40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2016 年即将举办的奥运会志愿者语言项目等。里约孔子学院扮演着民间大使的角色,以自身特有的魅力促进中巴两国的交流与合作。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孔子学院应该如何在海外更好地发展,如何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乔建珍: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随着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不断加深,中国与巴西的关系也发展到了 40 多年来的最佳阶段。巴西人民了解中国的欲望愈加强烈、对汉语的需求也日渐旺盛,在此情况下,孔子学院在巴西的发展显得尤其重要。如要扩大孔子学院在巴西的影响,以下 4 点尤为重要。第一,本土化。努力使孔子学院的课程设置、教材、各项管理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传统习俗,这也是孔子学院实现长久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第二,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巴西与中国相距遥远,巴西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极少。针对目前巴西人民渴望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孔子学院应该先从文化互动入手,多举办电影节、展览、演出等活动,增加巴西民众对中国的直观了解。这也符合巴西人的学习习惯,会极大地促进孔子学院的汉语推广工作。第三,提高教学质量。教学质量是孔子学院生存的基础,我们必须在目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争取使各门课程在巴西教育部的课程评估中都能达到优良水平。第四,进一步和巴西各级部门加强合作,将汉语纳入到巴西的义务教育体系,使汉语教学实现“从娃娃抓起”,将孔子学院的课程纳入巴西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为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编辑 吴婷 校对 朱婷婷

台湾高校教学发展机构的特点与启示

文 / 侍朝霞

摘要:台湾于 2004 年推出的“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旨在重塑以教学为核心的大学教学氛围,促进大学教学品质的提升。同时,2004 年启动“迈向顶尖大学计划”,目的是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受政策及计划的推动,台湾各高校纷纷建立教学发展机构,以促进教学能力和研究能力的提升。台湾高校教学发展机构注重教与学共同发展,在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同时,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学习资源。文章以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淡江大学和东吴大学四所大学为例,分析台湾高校教学发展机构的建立背景、基本情况及特点,并提出对大陆的启示。

关键词:台湾;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机构;教师专业发展

2011 年,教育部和财政部决定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提出要建立一批高等学校教师教学示范中心。随后,有 30 多所大学成立了教师发展示范中心,但由于尚处在探索阶段、理论不充足、模式运作不成熟,该中心运作效果不明显。

台湾多所高校在 2005 年前后成立了促进教学发展的机构,以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促进学生学习以及其他各项辅助措施三方面为中心工作。通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台湾各高校教学发展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教师的教學能力,促进了整体教学质量的提升。

一、产生背景

台湾自 1987 年解除“戒严令”后,很多大学纷纷建立。由于台湾人口有限,大学的增多势必引起生源争夺问题。为此,台湾各高校不断

降低招生标准,导致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了大学的教学质量。1996 年,台湾“行政院”发布《教育改革总咨议报告书》,指出大学教学质量的下降除了受高校扩招的影响,教师课程研发及教学方法革新能力不足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台湾高校一直存在“重研究、轻教学”的现象,一直以“研究:教学:服务 = 6:3:1 或 7:2:1”的比例来衡量大学教师的表现。2003 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修订《大学相关规定》,该规定要求既要追求高校数量的扩充,也要追求教学质量的提升,从而把公众焦点聚焦到“质量”上。此后,台湾在政策上开始在这方面给予高校自上而下的帮助。

2004 年 12 月,台湾推行“奖励大学卓越计划”,主要目标包括引导大学注重教学质量、增强学生的学习意愿等,要求参与申请的学校必须设有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专门机构。“奖励大学卓越计划”是竞争性计划,以五年为一周

作者单位:侍朝霞,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期,首先由大学向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然后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将各校是否具有教师教学支持机构或举措纳入申请条件及参考指标中,并对其进行考核。审核通过的大学将得到教育主管部门提供的经费,得到经费的学校需要继续加强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教育主管部门会根据各高校的办学绩效调整奖励比率。第一期“奖励大学卓越计划”推行期间,有 13 所院校通过审核得到补助,执行效果优异,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促进了各高校相关教学发展机构的建立,提升了教师教学能力以及教学质量。

与此同时,教育主管部门推出“迈向顶尖大学计划”,在第一阶段投入 500 亿新台币,强调学校特色的发挥和教师教学技能的提高。申请该计划资助的高校需满足教学卓越的指标,包括:完善的教学质量检核评估机制,教师教学及专业发展的协助措施(如设立教学资源中心)及绩效教师教学评鉴、教师奖励淘汰机制,系所开设的课程规划过程及定期检讨评估机制等。该计划的实施也推动了高校教学发展机构的发展。

二、概况

台湾各高校的教学发展机构命名各不相同,其中 40%以上选用“教学发展中心”,约 14%选用“教学资源中心”。但通过调查发现,在所有教学发展机构中,名称包含“教学”两个字的占 80%以上,这说明多数院校都以发展教学为主要任务。

本文选取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淡江大学、东吴大学进行分析。这四所大学既涵盖公私大学,包括综合性大学、师范类大学等类型,且均获得了“奖励教学卓越计划”或“迈向顶尖大学计划”的资助,其教学发展机构功能较健全,涵盖职能较全面。其中,淡江大学明确将学校定位为教学型大学。

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的教学发展机构命名为“教学发展中心”,东吴大学的教学发展机构命名为“教学资源中心”。淡江大学在 1995 年就已成立了“教育发展中心”,于 2006 年获得“奖励大学卓越计划”的补助后,将“教育发展中心”更名为“学习与教学中心”,职能更加侧重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发展。四所大学的教学发展机构概况见表 1。

表 1 四所大学的教学发展机构概况

| 学校 | 中心名称 | 成立时间(年) | 人数(人) | 受资助的计划名称 |
|--------|---------|---------|-------|----------|
| 台湾大学 | 教学发展中心 | 2006 | 41 | 迈向顶尖大学计划 |
| 台湾师范大学 | 教学发展中心 | 2007 | 13 | 迈向顶尖大学计划 |
| 东吴大学 | 教学资源中心 | 2006 | 24 | 奖励大学卓越计划 |
| 淡江大学 | 学习与教学中心 | 2006 | 28 | 奖励大学卓越计划 |

就台湾高校教学发展机构的行政级别而言,公立大学的教学发展机构多数属于二级行政单位,隶属于教务处,私立大学的教学发展机构多数属于一级行政单位。例如,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的“教学发展中心”都属于二级行政单位,而东吴大学的“教学资源中心”和淡江大学的“学习与教学中心”属于一级行政单位。

在总结众多美国大学教学发展机构的经验基础上,学者李世忠指出理想的教学发展机构需由六方面构成,即教学发展、教材发展、教室发展、媒体服务、远距教学、教学研究。研究发现,教学发展、学生学习是台湾高校教学发展机构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与工作职能。其中,台湾大学的“教学发展中心”由 41 人构成,分为中心办公室、教师发展组、数字媒体组、学习促进组、规划研究组,是台湾人数最多、职能范围最广的高校教学发展机构。台湾师范大学的“教学发展中心”由 13 人构成,分为教师教学促进组、学生学习促进组、综合企划组,围绕“教师”与“学生”展开工作,各组职能清晰,目标明确。东吴大学的“教学资源中心”由 24 人构成,

分为教师教学发展组、学生学习发展组、教学科技推广组、教学评鉴研究组,目的是通过媒介技术、教师评价等方法提升教学品质,成为一流教学型大学。淡江大学的“学习与教学中心”由 28 人构成,分为教师教学发展组、学生学习发展组、远距教学发展组,在台湾所有私立大学的教学发展机构中,不论是所拥有的人数还是职能涵盖范围,都属于领先地位。

三、特点

(一)政府推动高校教学发展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台湾政府 2004 年推出“奖励大学卓越计划”和“迈向顶尖大学计划”,顺应政策,多数高校教学发展机构的成立时间集中于 2005—2007 年。政府推出竞争性计划,由学校提出申请,政府按照审核结果为学校提供资助,同时要求获得资助的学校继续推行促进教学发展的措施,依此良性循环。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获得“迈向顶尖大学计划”的资助次数分别是 8 次和 6 次,东吴大学连续六年获得“奖励大学卓越计划”资助,淡江大学也获得 6 次“奖励大学卓越计划”资助。

(二)重视新教师的入职教育

教师专业发展包括职前培养、入职教育以及职后培训,而其中对新入职教师的入职教育往往被忽视,但在台湾高校教学发展机构中,对新教师的辅导与支持占很大比重。比如,台湾大学的“教学发展中心”开展新教师研习营,同时制定了教师传习制度,即通过组织新教师的相互讨论以及有经验教师的帮带,帮助新教师成长;淡江大学设有新任教师工作坊,帮助新教师学习和了解学校历史、学校规章制度以及各部门的工作职能,让新教师有归属感,能快速融入淡江大学;东吴大学对新教师的支持举措主要表现在每学年开始对新入职教师进

行的针对性辅导,及为其准备的新教师手册。此外,东吴大学自 2007 年开始实行“伙伴教师”计划,即由资深教师和新教师组成互助伙伴,通过这种方式协助新教师快速融入学校环境。

(三)通过多种方式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台湾高校教学发展机构的成立旨在提高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教学质量。台湾的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聘任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大学教师在通过专家面试审核后,若入职后学校不为其提供相应的教育技能方面的引导,容易导致很多教师虽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但教学却不得法。各高校教学发展机构将会通过多种形式帮助教师,如举办卓越教学讲座;针对教学优秀者给予奖励,并组织获奖者在研讨会中分享经验。教学发展机构还注重教师专业发展的连续性,会定期举行关于教师专业成长的讲座,并专门开辟教师教学专业成长网站,让教师随时随地关注自己的成长。

(四)充分利用数字媒体技术

数字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对传统教育教学手段和形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高校教学发展机构一方面积极研究现代教育技术的使用,另一方面积极实践推广。例如,台湾大学设立了“学习资源交流网”“学习开放空间”“学习策略资源网”,充分利用网络空间,为学生提供学业方面的帮助;台湾师范大学和东吴大学通过设立电子报方式,对教学资源 and 活动内容进行定期更新,保证信息的及时和内容的丰富;淡江大学运用多媒体教学、远距教学,综合计算机、网络等媒介,推动网络教学的发展,让学习免受时间、地点等因素的限制。

四、启示

(一)加强政府政策引导,成立专门机构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数据调查显示,大陆高校教师对学校提供

的进修和培训机会评价中仅 43% 满意, 56% 不满意, 说明大陆高校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方面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大陆设有教学发展机构的高校较少。1998 年, 清华大学率先成立教学研究与培训中心。截至 2010 年, 大陆共有 15 所高校建立教学发展中心。2012 年,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批准包括厦门大学在内的 30 所高校设立教学发展中心。至此, 大陆成立教师发展专门机构的高校仅有 30 所, 而大陆高等学校(不含独立学院)总数为 2542 所。为了激励高校建立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机构, 大陆应制定相关政策, 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 同时, 高校本身要把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 注重新教师入职指导, 缩短其职业的迷茫期

入职指导或教育是教师专业化发展过程中的桥梁, 连接着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入职教育的成功实施可以帮助初任教师顺利转换角色。研究表明, 初入教师行业的前几年是新教师成长的关键期, 也是充满困难和挑战的时期。初任教师过渡期的顺利转化会坚定其教师职业定向; 反之, 若这一时期的困难没有得到解决, 则会使其受到打击。大陆应加强新教师入职期间的培训与指导, 以及对新教师的关注。例如, 高校可以设立专门的帮带小组, 并给予资金支持。

(三) 提高学生能力, 促进教与学共同发展

台湾高校教学发展机构在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同时, 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帮助。例如, 设立专门课时辅导教师、对学生提供定时定点服务、成立“读书会”、为学生的学习成长组织专门讲座等。同时, 台湾高校注重对教学助理的管理, 为教学助理提供专门培训, 加强对教学助理的评价等。教学发展机构负责对教学助理的选拔、培训及评价。教学助理可以协助教师完成教学工作, 在台湾高校已经普及。

大陆高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因地制宜地引进教学助理制度, 既可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又能促进学生社交等实践能力的提升。

(四) 拓展活动形式, 使活动更加多样性和多元化

台湾高校教学发展机构涉及教师个人发展、专业发展、组织发展等方面。多样性的活动可以增强教师的幸福感、成就感, 同时可以积极调动教师的参与性。大陆高校教学发展机构的的活动形式多以举办学术会议、教师进修讲座、对外访学等为主。为了更好地促进教学发展机构的发展, 大陆高校教学发展机构首先可以组织教师群体共同学习, 使其结为伙伴; 其次, 对教师发展的不同阶段给予足够重视, 制定相应计划, 对新入职教师不仅要进行教学技能提升的帮助, 还要进行适当的感情疏导; 再次, 应建立健全教学发展机构的网络平台, 充分发挥网络对外交流速度快、资源新的优势, 利用视频、图书馆、电子期刊、微格教学等资源来丰富网络中心的内容, 发挥其强大的功能。

参考文献:

- [1] 台湾大学教学发展中心[EB/OL].<http://ctld.ntu.edu.tw/>, 2013-01-20.
- [2] 台湾师范大学教学发展中心[EB/OL].<http://www.ctld.ntnu.edu.tw/>, 2013-01-26.
- [3] 东吴大学教学资源中心[EB/OL].<http://ctl.scu.edu.tw/>, 2013-03-25.
- [4] 淡江大学学习与教学中心[EB/OL].<http://tpd.tku.edu.tw/>, 2013-03-20.
- [5] 朱信号, 宋文红. 我国台湾地区高校教学发展中心设立背景、现状、特征及启示[J]. 现代大学教育, 2013(4): 49-56.
- [6] 石洋. 台湾高校教师发展组织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3.
- [7] 王军, 林杰. 台湾地区高校教师教学促进的组织与举措[J]. 中国大学教学, 2012(12): 72-75.

编辑 吴婷 校对 朱婷婷

现代大学书院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基于大中华区^①十五所书院的研究

文 / 庄 瑜

摘 要:近年来,通识教育一直颇受高等教育界关注,而书院通识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一种形态,亦有其特点和规律。大中华区现代大学书院目前形成了三种典型模式,即精英模式、大众模式和传统模式。文章基于大中华区十五所书院的案例,对三类模式做了分析与研究,并就现代大学书院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进行了梳理与探讨。

关键词:书院;通识教育;课程;大中华区

近年来,通识教育一直颇受高等教育界关注,而书院通识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一种形态,也获得了一定关注。2014年,两岸三地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论坛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7所高校共同发起成立“亚太高校书院联盟”,以共同探索书院制教育模式改革与发展规律,为培养人格健全、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作贡献。2015年,书院联盟举办了两岸四地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论坛,并邀请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波士顿大学代表介绍其住宿制学院的特色情况,以为两岸四地高校书院提供借鉴。同时,与会代表分成三组,按照管理人员及教师组、学术研究组、学生代表组进行了研讨交流,细化了讨论内容,并结集出版了《现代高校书院制教育研究》一书。^[1]

书院的通识教育是书院研究的核心,也是书院院本课程研究的基础。文章基于大中华区

十五所书院,对书院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进行了研究。文章首先从书院的三种典型模式分析入手,之后根据课程形式进行分类并归纳不同课程类型的特征,从中剖析书院通识教育的启示。

一、书院的三种典型模式

目前,大中华区大学形成了三种典型的书院类型,即精英模式、大众模式和传统模式。三种模式的代表分别是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孟宪承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传统书院。

(一) 精英模式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是精英模式的典型代表^[2]。元培学院的建立可以追述至2001年。当时,北京大学认为本科教育是整个高等教育的初级阶段,也是一所大学成为优秀大学的关键,为实践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故开办“元培计划实验班”。元培计划实验班的录取分数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各省的高考文科状元或国家级学科竞赛一等奖得主。

作者单位:庄瑜,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2007 年,北京大学本科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正式成立“元培学院”,该学院为非专业类本科学院。元培学院在招收学生的时候,不细分专业,只区分文理两个大类,学生入学时主要修读通识课程和宽口径的基础课程。元培学院为学生配备了导师,协助学生选择和安排自己的课程,建构个性化知识结构。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学生在全面了解北京大学各专业的课程设置后,结合自身实际并在导师指导下,可在全校专业范围内选择专业。

(二) 大众模式

华东师范大学孟宪承书院是大众模式的代表^[3]。华东师范大学孟宪承书院与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不同,面向华东师范大学的公费师范生,以培养优秀教师和未来教育家为目标。书院秉持学校首任校长孟宪承所提出的“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与社会的发展”办学思想。每名学生进入书院后都有双重身份,即既是其专业所在院系的学生,也是孟宪承书院的学生;第一课堂的专业学习与学术发展由专业所在院系负责,第一课堂之外的学习生活与养成教育主要由书院负责。此外,书院专门设立了“教师教育课程”模块,作为书院学生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传统模式

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是传统模式的代表^[4]。香港中文大学共有九大书院,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之精神推行通识教育,与华东师范大学孟宪承书院相似,其学生身上贴上了两张标签,一张是书院的,一张是学院的,学院的主要职责是开展“学科为本”的教学,书院则负责提供“学生为本”的教育。书院提供众多非形式教育机会,与正规课程一同培养学生的人际关系技巧、文化品位、自信心、责任感等。以钱穆先生创办的新亚书院为例,创院宗旨在于承续中国传统文化,并使其与现代

学术结合。崇基书院则强调学生要对中国及西方的主要文化传统有所体会及评估。

整体而言,三种模式的共同特点都是以设立书(学)院的形式来推进通识教育的实施。不同之处是三种不同类型的模式分别有着自己的价值理念和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价值理念切实地体现在书院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

二、书院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教育大辞典》对“通识教育”阐述为:近代关于教育目的和内容的一种教育思想以及据此实施的教育^[5]。在高等教育阶段,通识教育指大学生均应接受的有关共同内容的教育,通常分属若干学科领域,提供内容宽泛的教育,与专门教育有别。书院开放式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旨在帮助学生培养个人品德,发展心智,提高综合素质修养,获得人文精神的熏陶。课程形式一般分为形式教育和非形式教育两种类型。

(一) 形式教育

形式教育是以课堂学习为主的教育。书院承担的课程主要是书院通识课程,其与大学通识课程两者共同组成通识课程体系。

1. 课程开设原则

形式教育的开设原则因校而异,分类方式与各书院的培养目标与内容相关联,与一般的大学课程开设原则有所不同,具有明显的院本特征。本文将列举四类较有代表性的课程开设原则。

(1) 分段而治

香港中文大学的善衡书院的通识教育课程分为两段:启导课程和总结课程。启导课程旨在明新,引导书院新生了解大学环境,积极投入学习及书院生活;总结课程旨在引导高年级学生及时把握机会,检视大学生活,进而前瞻一生^[6]。初入大学的学生与高年级学生在价

值观念、思维特征、行为方式、生活习性等方面都有差异,根据年级段而设置的课程符合学生发展的规律,即启导课程有助于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总结课程对于即将面临职场的学生而言起到指引推动的作用。

(2) 因人而异

台湾中正大学的紫荆书院让书院学生自行规划与实施课程。书院学生可以评估本身需求,向书院通识教育中心提出课程申请,通识教育中心将协助规划适当课程^[7]。根据学生个人学习兴趣规划课程,对于学生和通识教育中心皆是一种挑战,既要求学生审视自己的学习兴趣和爱好,也要求通识教育中心有足够的课程资源,满足学生的个人需要,是互相督促与提升的双赢系统。

(3) 设块而施

复旦大学复旦学院推行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方案分为以下六大模块^[8]:文史经典与文化遗产、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学精神与科学探索、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台湾中正大学紫荆书院则是以行动与问题解决导向为设计理念,围绕核心能力指标设立课程,核心能力包括十大模块,即思考与创新、道德思辩与实践、生命探索与生涯规划、公民素养与社会参与、人文关怀与环境保育、沟通表达与团队合作、国际视野与多元文化、美感与艺术、问题分析与解决等^[9]。将通识教育分块而设,反映了不同书院的学生培养目标,同时把书院的核心精神融于其中,复旦学院的文理兼并、紫荆书院的多元国际化视野在所设的通识课程模块中都展现分明。以紫荆书院的“思考与创新”模块为例,在第三学期课程中开设“创意思考与实践”,“思考”部分是通过创造力(包括流畅性、应变性、原创性及精进性)的理论解释,并配合跨界的创新案例,让学生理解创意的内涵

并懂得欣赏,“实践”则是让学生动手制作一些作品。这充分体现了紫荆书院“鼓励书院学生面对复杂多变的时代,在充分理解的前提下,对于问题的本质进行系统的正、反思考,并进行有意义的开创”的教育目标。

(4) 取小而精

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推崇的人生价值是智慧与修养,人生榜样不是亿万富翁,而是学富五车的思想家、学问家。每学期主要课程一般只有 3~4 门,但每门课需要学生完成大量的课前阅读和课后作业。学生在学期间,需要深度研修中西方经典著作,还必须完成古汉语、古希腊语、拉丁语等古典文明语言学习,兼修艺术理论及其技能等课程^[10]。博雅学院在众书院中可谓独树一帜,“小”体现于课程数量较少方面,“精”体现在每年从入校新生中精选 30 名学生,是一所为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模式而专门设置的学院。这样的课程设置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并更强调治学的严谨,课程也始终贯穿“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教学理念,目的是帮助学生学会做人 and 做事。

2. 课程选择原则

形式教育的课程选择原则较为宽松,学生有较强的自主性,同时书院会根据学生的选择进行课程的改进与增设。另外,课程选择有年级特征,与书院的核心精神相匹配。

(1) 个人兴趣

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在不同的书院选修自己喜欢的课程,各书院也可以根据学生需求开设通识课程,形成一种新的开放式双向选择的通识教育模式。书院根据学生需求开设通识课程是双向课程选择原则的精华所在,其相当于为每名学生量身定做一份培养方案,也对学校的课程流动与师资配备提出了更高要求。

(2) 年级导向

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针对不同年级学生而

设立,学生必须在规定的年级选择相应课程。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规定,学生大一上学期必修《大学生活与学习》、大二及以上必修《学术与书院生活》系列课程、最后一年第一学期必修《专题讨论》^[11]。台湾中正大学紫荆书院要求学生四个学期分别选修以下课程:中正讲座(第一学期)、生涯知能(第二学期)、创意思考与实践(第三学期)和服务学习(第四学期)^[12]。年级导向体现了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划,课程并非独立设置,而是在书院核心精神之下的目标导向性设计,并与大学生的成长规律相配合。

3. 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与书院建立的核心精神与价值相挂钩,属于“院本课程”。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着重中国传统文化,故学院的通识课程包括文化、社会、大学、人际关系等,加深学生对中国文化、香港社会、大学生活等的认识与了解^[13]。台湾“清华大学”的厚德书院以服务学习、体现社会关怀的精神为主旨,课程主要涉及服务学习、社会探究、生涯探索三个方面^[14]。载物书院以跨领域多元学习、培养创意创新创业能力为主旨,课程分为新生探索、服务课程和大二学生主题探究式的跨领域课程(如环境与社会)^[15]。华东师范大学孟宪承书院是以师范学生为主导的书院,针对师范学生实习和求职的特色,开发了《师范生求职实战演练课》,由书院参与该课程开发的教师担任不同主题课的授课教师^[16]。台湾中正大学的紫荆学院体现了“结合老成与少壮以从事创造性学习,并谋求知识与生命热情的融合”的教育目的,开设生涯规划、服务学习、国际观、创新力、领导力与沟通力等方面的课程^[17]。院本课程内容宽且实用,不同于专业课程,更强调学生对于社会的感知、能力的提升、文化的熏陶、未来的规划等,并将书院的价值理念糅合在课堂中,潜移默化地为学生的个体发展提供新路径。

4. 课程教学模式

书院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模式突破常规,包括学者引领、经典导读、助教相辅、小班讨论、多元考核、网络互动等富有特色的形式。

5. 学分系统

用学分打通的方式将不同的通识教育课程统一在一个学分体系中。台湾政治大学的博雅书院开设的通识课程,着重人文和自然通识,学生若修满书院开设的课程,可以抵消大学规定的 20 个通识课程学分中的人文自然通识类学分。博雅书院的通识课程包括大学之道、日常物理、全球化与区域发展、世界文明与历史思维等。^[18]

(二) 非形式教育

非形式教育主要指形式多样,有利于书院精神传递的座谈会、演讲、表演、专题讨论、社会实践、志愿活动等非课堂教学教育,一般在课余时间开设。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行知书院为例,该学院强调“教”与“育”相结合,整体构建了由知识课堂、实践课堂、文化课堂构成的人才培养体系,其中的“实践课堂”就是非形式教育的典型。

1. 分类方式

非形式教育可分为体验类(包括慢走、农村体验、与各领域杰出人士对谈、海外参与、文艺团体训练与企业实习等)、服务类(包括非政府组织实习、外籍子女陪伴、社工服务等)、专业类(包括口述史、博物馆志愿者、动物园讲解员等)、学习类(包括海外研修、外语学习营等)和个性类(包括以学生个人意愿为导向,尊重个体的需求等)。非形式教育的分类与一般意义的“课外活动”分类相似,但书院的非形式教育与形式教育相互依存,同时是形式教育的延展,更强调“知行合一”的理念。

2. 特色活动

台湾中正大学紫荆书院的“圆梦计划”是

该书院的一大特色,即学生可以在学期即将结束时提出申请,内容主要分为国际义工、学生交换以及筑梦计划。筑梦计划由学生个人或小组自行提出企划书,人数及内容不限,可以是环岛骑行、登山等,只要校方评估该活动对学生有益,便会给予经费补助^[19]。诸多书院的非形式教育已形成系统,如华东师范大学孟宪承书院的学生骨干领导力发展特训营、教师暴走授课挑战计划、微公益等^[20];西安交通大学仲英书院的谦谦君子养成之感恩关怀计划、博学近思计划、学友相携计划和自理自砺计划^[21]。复旦大学五大书院的特色文化品牌包括腾飞书院的腾飞论坛、腾飞定向和腾飞月;志德书院的书院日、志德学子高中行、志德登高和志德诗文化节;克卿书院的克卿人节和克卿峰会;任重书院的任重沙龙、任重年华和任重扫除日;希德书院的导师论坛和卿云讲会^[22]。特色活动不但是书院的品牌,也是学生进入书院后的功课,学生自主选择参加不同的特色活动,使之成为自己校园生活的常态,组织者也在活动策划中吸取经验。以华东师范大学孟宪承书院的学生骨干领导力发展特训营为例,从 2013 年至今已开展了四届,每届特训营的策划者间都互通有无,使特训营的组织更为细致、更有吸引力。

3. 评价方式

学生的参与情况将被列入考核,作为其是否能够继续留宿书院或是评定奖项的依据。非形式教育的评价相对灵活,旨在鼓励学生在课外充实自我,评价准则依据不同书院的培养目标而定。

(三) 形式教育与非形式教育交叉

书院致力于发展多元通识课程,教育类型亦有形式教育与非形式教育交融一体的方式。台湾政治大学的政大书院在“新生定位”部分的三门课程是形式教育与非形式教育相融合的方式:第一门为“学习生涯自我定位”,内容

包括营期活动及衔接课程(形式教育+非形式教育);第二门为“大学入门”,透过定位活动与自我探索,了解生活环境及学习资源(非形式教育);第三门为“新生专题”,以书院教育的精神与重要元素进行设计规划,引导新生适应大学学习方式与生活形态(形式教育+非形式教育)^[23]。华东师范大学的孟宪承书院以“生涯规划”为导向,开设“生涯规划”课程,同时通过规划大赛、个性辅导等形式与课程相配合,也是两类教育相结合的方式。

三、启示

在书院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有诸多不同于学院课堂的有利条件,因此得到不同于学校课堂通识教育的独特效果。书院通识教育在相对固定和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能够达到全方位、全时段的全人教育目的。书院通识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品德,发展心智,锻炼其为人处事的能力、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合作能力等,是形式多样的教育。书院的通识课程设置既能体现书院精神要旨,也能培养学生通用能力。

书院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的形式教育更应突出“院本”核心理念。以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为例,其参考国外博雅学院的经验,学生在本科期间研修中西方文明传统及经典著作,必修古汉语、古希腊语、拉丁语等古典语言,兼修艺术理论及技能。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着重中国传统文化,学院的通识课程包括文化、社会、大学、人际关系等。在课程选择方面,制定个性化的课程方案,满足学生的个体需求,在一定范围内,根据学生的要求设计课程类型与内容。同时,书院课程的学分与学校的学分系统应打通:可以混编,即将书院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融入大学的总学分中;可以抵扣,即在书院所修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可抵扣大学其他的必修课或选修课学分,因校而异;着重

学生的外语学习,建立稳固的海外研修项目,基于双方设计,根据书院的院本课程目标建立不同的海外研修项目,以华东师范大学孟宪承书院为例,其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建立合作,于寒暑假选派优秀的书院学生出国学习,发挥合作学院的教师教育优势,使海外研修具有充分的针对性。

书院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的非形式教育不只是丰富形式教育的必要手段,也是学生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学院通识教育着重“全人发展”的理念,融合学生的学习社区归属意识及跨学科需要。澳门大学的珍禧书院有高桌晚宴、院长晚宴、由校外嘉宾主讲的专题讲座或座谈会、兴趣小组、楼层活动及其他书院间的竞赛^[24];新加坡大学住宿书院则通过大师茶叙等活动来推动师生与生生间的互动与理解^[25]。各书院可建立稳固的校外实践基地,让学生感受真实世界,与知名企业、社会组织、博物馆、书店、艺术馆等签订实践协议,让学生体验优质资源,包括了解这些机构的物理环境、组织文化与人才需求。此外,还可建立书院网上课堂资源库。资源来源可以是已公开的世界知名大学公开课,也可以是书院举办的各类讲座或沙龙,通过视频或音频的方式存储在云端,学生根据个人兴趣选择学习。每位学生的观看记录都将被后台记录,作为评价方式之一。

注释:

①大中华区泛指所有有华人居住及活动的地区,如包括新加坡等地,本文特指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参考文献: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EB/OL].<http://www.buaa.edu.cn/index.htm>,2014-11-05.

[2]北京大学元培学院[EB/OL].<http://yuanpei.pku.edu.cn/category.php?cid=1&scid=10>,2014-10-09.

[3][16][20]华东师范大学孟宪承书院[EB/OL].<http://mxcsy.ecnu.edu.cn>,2014-11-17.

[4]香港中文大学书院[EB/OL].<http://www.cuhk.edu.hk/chinese/college/system.html>,2014-11-10.

[5]孔德懿,魏丹.通识教育视野下的创新人才培养[J].大学教育,2015(3):66-68.

[6]香港中文大学善衡书院[EB/OL].<http://www.shho.cuhk.edu.hk>,2014-12-05.

[7][9][12][17][19]台湾中正大学紫荆书院[EB/OL].<http://www.ccuelite.ccu.edu.tw/home.php>,2014-12-05.

[8][22]复旦大学复旦学院[EB/OL].<http://www.fudan.edu.cn/channels/view/48/>,2014-11-08.

[10]中山大学博雅学院[EB/OL].<http://lac.sysu.edu.cn/>,2014-12-10.

[11]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EB/OL].<http://www.uc.cuhk.edu.hk>,2014-12-11.

[13]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EB/OL].<http://www.na.cuhk.edu.hk/>,2014-12-11.

[14]台湾清华大学厚德书院[EB/OL].<http://www.college.nthu.edu.tw/files/11-1090-5273.php>,2014-12-10.

[15]台湾“清华大学”载物书院[EB/OL].<http://www.college.nthu.edu.tw/files/11-1090-5273.php>,2014-12-20.

[18][23]台湾政治大学政大书院[EB/OL].http://college.nccu.edu.tw/index.php?option=com_flexicontent&view=category&cid=147&Itemid=82,2014-12-20.

[21]西安交通大学仲英书院[EB/OL].<http://www.xjtu.edu.cn/bksy/438.html>,2014-12-20.

[24]澳门大学珍禧书院[EB/OL].<http://www.umac.mo/rc/pjc/sim/index.html>,2014-12-21.

[25]新加坡住宿书院[EB/OL].<http://utown.nus.edu.sg/about-university-town/residential-colleges/>,2014-12-21.

编辑 吴婷 校对 朱婷婷

综合 治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赋予教师权利是实现优质教育的关键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 2015 年 8 月 26 日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2015 年世界教师日的主题确定为“赋予教师权利、建设可持续社会”,并指出赋予教师更多权利是迈向优质教育和可持续社会的关键步骤。

世界教师日旨在赞扬和感谢全世界教师为教育事业和人类作出的贡献,并引起世界对教师的关注,帮助教师维护自身权利。在以知识、价值和道德为基础打造学习型 and 创意型社会的进程中,教师是提升国家实力与可持续性的关键成员。但是,教师队伍经常面临人员短缺、培训不足、地位偏低等一系列的挑战。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预测,若要在 2020 年时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各国家所需招募的初等教育教师总数高达 1260 万人。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王俊编译)

经合组织和欧盟联合报告： 移民家庭子女找工作受不公正对待

据经合组织官网 2015 年 7 月 2 日报道,根据经合组织与欧盟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移民家庭子女在经合组织国家,尤其是欧盟国家因受教育水平低下而在找工作方面面临挑战。在欧洲国家,移民家庭的青年的失业率比本土家庭的青年的失业率高 50%。虽然来自移民家庭的子女比他们的父母的就业率高,但还是不可

避免地受到就业歧视。

这份报告是第一份详细阐述经合组织国家和欧盟国家的移民及其子女发展情况的国际比较报告,尤其关注有移民背景的青年人。其中,关键指标包括就业、教育、收入、住房、卫生、公民参与、社会凝聚力等。报告指出,虽然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移民家庭子女比那些本土家庭子女更容易找到工作,但往往是那种收入很低且工作条件很差的工作。越来越多的移民拥有了打开希望之门的钥匙——高技能。然而,仅 1/3 的经合组织国家的移民和 1/4 的欧洲国家移民拥有高等教育学历,而且他们的最高学历是在国外获得的。与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移民相比,在世界范围内,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移民的就业率比本土家庭的人更低。公司在雇佣这些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移民时,往往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欧盟国家,受教育水平较高、拥有国外学位的移民群体中的 42% 在从事着低层次的工作。

(《世界教育信息》编辑部郭伟编译)

世界银行支持印尼贫困家庭子女接受教育

据世界银行官网 2015 年 8 月 20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于 2007 年启动的“家庭希望计划”(Family Hope Program)到 2014 年惠及了该国 33 个省的大约 300 万个贫困家庭,覆盖群体增加了 8 倍。

“家庭希望计划”的资助对象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家庭收入在印尼“全国贫困家庭数据库”中处于最底层(10%);二是家庭中有孕妇和(或)18 岁以下子女。根据家庭人口规模,

栏目说明:“环球零距离”由本刊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共同策划组稿,重点报道不同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最新教育资讯,文章主要来自我国驻外教育机构调研报告、本刊海内外通讯员编译稿件以及本刊编辑部采写、翻译的稿件。欢迎海内外作者积极赐稿,报名加入本刊通讯员队伍,投稿邮箱:edinfo@moe.edu.cn,QQ 交流群:237508254

每个贫困家庭可以获得数额不等的现金资助,平均每个家庭每年可以获得 180 万印尼盾(约合 152 美元)的资助,这大约是贫困家庭一年支出的 15%。获得资助的前提条件是贫困家庭的子女保持在校学习,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到健康诊所接受必要的医疗服务(如产检、免疫等)。印尼国内大约有 1.1 万名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帮助这些家庭达到计划所要求的资助条件。

为了促进贫困家庭的行为发生积极变化,该计划开始组织母亲们参加相关培训,内容包括健康与营养、父母教育实践、儿童保护、家庭支出管理等。相关评估结果表明,印尼学生完成小学教育后继续接受中等教育的几率提高了 8.8%,初中注册入学人数增加了一成。同时,接受产前检查的人数增加了 7.1%,儿童发育迟缓病例的发生率下降了 3%。如今,“家庭希望计划”帮助贫困家庭进行小型创业以补贴家庭收入。小型企业的女性创业者可以申请小额贷款。这些举措的重点不在于增加家庭收入,而是让贫困家庭的儿童有更好的机会摆脱贫困境况。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王俊编译)

高等教育

美国部分高校改名以吸引生源

据《世界日报》2015 年 7 月 13 日报道,由于招生人数持续下降,政府财务补助减少,美国部分高校通过增加研究生课程、变更校名等手段吸引更多学生,尤其是外州和外籍学生,如社区学院更名为州立学院,州立学院更名为大学等。

今年 6 月,佛蒙特州的卡斯尔顿州立学院校长正式提议将校名改为卡斯尔顿大学。该校校长称,学校近 5 年增加了 5 个专业研究所,改名为大学更能反映其实际水平,且能吸引更多拨

款和外州、外籍学生。据悉,该校理事会订立的本州学生学费为每年约 1 万美元,而校长提议外州学生学费为 2.5 万美元,目前正等待理事会核准。

新泽西州理查德·斯托克顿州立学院也以增设了研究生课程为依据,今年更名为斯托克顿大学。该校发言人承认,吸引更多外州学生是更名后的附带好处。阿拉巴马州原特洛伊州立大学早在 2004 年就将校名中的“州立”字眼删除,以“更真实地反映学生来源”。目前,该校外籍学生占学生总数的 12%,并提供课程供海外军人选修。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教育组程序供稿)

英国私立学校毕业生薪酬增长较快

据《英国卫报》2015 年 8 月 6 日报道,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在社会顶层行业中,从私立学校毕业的职工要比从公立学校毕业的职工薪酬增长速度更快。

根据报道,同样是在一个相似的社会地位高的行业里工作,在毕业后的 6 个月,毕业于私立学校的职工要比毕业于公立学校的职工平均多挣 1300 英镑;每年,私立学校毕业的职工平均能挣 24066 英镑,而公立学校毕业的职工只能挣 22735 英镑,他们的年收入差距是 1331 英镑;在他们工作 3 年半的时候,公立学校毕业的职工的平均年收入是 31586 英镑,而私立学校毕业的职工的平均年收入是 36035 英镑,比公立学校毕业的职工多挣 14%,这时,他们之间的年收入差距已高达 4450 英镑。

该项研究涉及的职业包括会计师、经济师、律师、药剂师、心理学家、高校教师、工程师和科学家,其数据已经发表在萨顿信托基金(Sutton Trust)和 upReach 招聘网站共同发布的一项报告中。该报告指出,英国私立学校的教育在薪酬回报方面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此前已有研究表明,教育背景不好的学生即使在大学时期表现很好,毕业之后也很难进入法律、经济等精英行业。该报告则进一步表明,教育背景不好的学生很难改变他们的处境,即使他们能进入精英行业,在薪酬方面仍处于弱势。

报告建议,在求职过程中,那些教育背景不好的毕业生应该被及早发现,而且在他们入职之后,雇主应该提供辅导计划和职业指导,让他们的优秀才能得到发挥。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姚秋兰编译)

全球调查:

超 7 成父母愿送子女出国接受高等教育

据国际教育博览顾问机构(ICEF)网站 2015 年 7 月 20 日报道,一项针对全球 16 个国家 5550 名父母的调查显示,有 77% 的父母愿意将子女送往国外大学接受本科或者研究生教育。

该调查结果来自汇丰银行(HSBC)“教育的价值”系列研究的最新报告——《为生活而学习》(Learning for Life),选取调查样本的 16 个国家以留学生输出国为主,包括巴西、中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等,调查对象是家庭中至少有一名 23 岁及以下子女的父母。

报告指出,亚洲国家或地区的父母在送子女出国接受本科教育的问题上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意愿,如马来西亚(80%)、中国香港(74%)、印度尼西亚(74%)、新加坡(74%)等,而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仅有约一半的父母表达了同样的意愿。与此同时,在印度(88%)、土耳其(83%)、中国内地(82%)、马来西亚(82%),则有超过 80% 的家长希望送子女到国外大学接受研究生教育。

家庭负担和费用支出是出国留学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34% 的父母表示不会考虑送子

女出国学习的主要原因是费用问题。在这一类型的父母群体中,有 26% 认为本国大学也能为子女提供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其中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的父母为主。尽管其余的父母乐于为子女出国留学支付高于本国大学学的费用,但是对高出部分的费用占国内大学学费的比例有更为明确的心理预期。例如,45% 的父母可承受的留学费用支出比例为 25%, 24% 的父母可承受 50% 的费用比例。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王俊编译)

职成教育

经合组织报告:

德国职业教育为年轻人创造良好就业机会

经合组织的最新一期职业技能报告显示,基于教育体系和劳动市场的紧密联系,德国在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优于绝大部分工业国家。OECD 秘书长古里亚表示,德国历来非常重视职业教育领域,能够积极帮助年轻人融入职场并推动其提升、发展。

根据已出炉的 2013 年数据统计,在 34 个 OECD 国家中有超过 3900 万名青年没有工作且未接受有效培训,较 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增加了约 500 万名。相对于其他国家,德国的情况明显较好,其 15~29 岁失业且未受训青年的比例为 9.7%。OECD 国家的平均比例为 14.9%,部分国家的情况较为严峻,如西班牙为 26.8%,希腊为 28.5%,土耳其为 31.3%。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罗毅供稿)

国际文凭课程职业教育项目在 在英国肯特试点成功

据国际文凭组织网站 2015 年 8 月 21 日报道,为期 4 年的国际文凭课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 职业教育项目 (Career-related Programme, CP) 试点已在英国肯特郡成功结束。该项目为 79 名参与者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和进一步学习的机会。

该项目是一种颇具创新性的项目课程,为 16~19 岁的想致力于与职业相关的课程学习的学生量身定制。该项目旨在让学生打好学术和实践两方面的基础,为进一步的学习和专业训练做好准备,以及发展广泛的与职业相关的能力,帮助学生积极参与到日益变化的工作领域之中。

肯特郡有 6 所高中参与了试点,该项目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提供了学习职业技能的机会,使他们获得了知识应用、批判性思维、沟通以及跨文化交流等相关技能。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邓静编译)

亚马逊公司携手美国社区学院 为雇员提供在职教育

据美国教育新闻网(www.educationnews.org) 2015 年 8 月 7 日报道,美国知名电子商务企业亚马逊公司(Amazon)携手常春藤技术社区学院(Ivy Tech Community College)在其位于印第安纳州杰斐逊维尔(Jeffersonville)的运营中心建立了现场教室,为约 2500 名雇员提供在职教育。

亚马逊公司面向全职工作满一年的雇员提供“职业选择”(Career Choice)项目,在四年内可为雇员支付学费总额的 95%,最高金额为 1.2 万美元。尽管该项目并未要求雇员所攻读学位必须与其在公司的岗位相关,但是大多数雇员仍然选择了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健康科学、会计等方向的学位课程。

常春藤技术社区学院在印第安纳州有 32 个教学点,为约 20 万名学习者提供社区学院教育。学院副学士学位或者其他资格证书的学费是每年 3995 美元。常春藤技术社区学院的校

长丽塔·休兹(Rita Shourds)表示,在最新信息技术的帮助下,亚马逊的雇员不用离开公司就可以如同在校园中一样便捷地接受教育。亚马逊公司与常春藤技术社区学院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确定市场需求较高的职业技能,并据此开设课程。首批开设的课程包括物流与信息技术、医疗账单与编码等。亚马逊公司特意将运营中心的现场教室设计成为开放式的玻璃幕墙结构,以鼓励其他雇员加入课程学习。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王俊编译)

基础教育

印度显著提高小学教育入学人数

据《印度快报》2015 年 7 月 7 日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 2015 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Education for All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指出,印度在提高小学教育入学人数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同时,印度在初中教育阶段努力推动相关政策以求达到同样的效果。

数据显示,2011 年,印度有超过 1600 万名初中教育适龄青少年没有入学接受教育。报告指出,印度为身心障碍儿童提供财政支持,帮助他们进入主流学校并适应基础设施。同时,印度就融合教育主题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建立相应的资源中心为学校提供支持。2012~2013 年,印度对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外部支持力度进行重新定位:基础教育经费支持从 1 亿美元降到 2700 万美元;中等教育经费支持从 2100 万美元增至 2.32 亿美元。此外,在孟加拉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尔、巴基斯坦和叙利亚,失去初中教育机会的青少年人数也超过了 100 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Irina Bokova)警告称,如果各个国家不承诺加

强教育援助,那么对于数百万儿童和青少年而言,国际社会所期待的提供 12 年免费优质教育的宏伟目标仍然遥不可及。2015 年,尽管世界教育援助增长了 6%,但是投入水平与 2010 年相比仍然落后了 4%,并且在未来几年有停滞不前的风险。相关预测数据表明,如果要为低等和中低等收入国家的每个人提供 12 年免费教育,所需资金缺口高达 390 亿美元。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王俊编译)

法国公布 2014 年版《国民教育大数据》

法国教育部最近发布 2014 年版《国民教育大数据》,全面提供了法国基础教育最新统计数据 and 指标(以 2013 年数据为主)。

2013 年,法国基础教育学校共计 63942 所,其中包括 15343 所学前教育学校、37237 所小学、7057 所初中、1583 所职业高中、2642 所普通和技术高中、80 所地方编制中学。

法国公立基础教育学校共计 55169 所,占基础教育学校总数的 86.28%。私立小学占小学总数的 13.82%;私立初中占初中总数的 25.31%;私立高中占高中总数的 39.79%;私立学前教育学校占学前教育学校总数的 0.83%。

2013 年,法国中小学教师共计 847259 人,其他工作人员 200249 人。其中,公立学校教师 711165 人,占教师总数的 83.94%。学前及小学教师中女性教师明显居多,占 83.28%;中学女性教师则占 59.77%。

中小学在校生共计 1274.78 万人。其中,公立学校学生 1017.45 万人,学前教育及小学生 676.06 万人,初中生 333.2 万人,职业高中生 65.03 万人,普通和技术高中生 147.06 万人。

2013 年,共有 65.82 万人获得初中毕业证书,获得率为 84.7%。共有 58.94 万人获得高中会考文凭,获得率为 86.9%,其中,30.53 万人获

得普通高中会考文凭,12.49 万人获得技术高中会考文凭,15.92 万人获得职业高中会考文凭。

2013 年,共有 19.4 万人获得职业能力证书,获得率为 83.8%;15.16 万人获得职业学习证书,获得率为 83.3%。

2013 年,法国教育经费总额为 1448 亿欧元,全民人均教育经费为 2200 欧元,学生平均教育经费为 8320 欧元。

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额的 29.2%,生均经费为 6220 欧元;中等教育经费总额占教育经费总额的 39%,生均经费为 9440 欧元;高等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额的 19.8%,生均经费为 11540 欧元;继续教育(培训)及其他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额的 12%。

从教育经费来源统计,国家政府经费占 57.0%,地方政府经费占 24.5%,家庭经费占 7.5%,企业经费占 8.4%,其他公共部门经费占 2.6%。工资等人事费用占教育经费支出的 3/4,且主要由国家政府承担。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陈跃、马燕生供稿)

英国 11 岁学生的读写及数学能力大幅提升

据英国教育部 2015 年 8 月 27 日报道,2015 年 5 月,近 58 万名 11 岁学生参加了第二关键阶段(Key stage 2)阅读、写作及数学能力测试,测试成绩于 8 月 27 日公布。测试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达到了预期标准,且比 2010 年的成绩有大幅提升。

在此次测试中,英国政府全方位引入更高的标准,禁止学生在数学测试中使用计算器(2014 年开始实行),同时引入了拼写、标点和语法测试(2013 年开始实行)。英国教育大臣尼克·吉布表示,测试结果的提高显示了政府为更多不同背景的年轻人提供的为进入中学做准备的教育是成功的。

此次测试统计数据显示,80%学生的阅读、写作及数学能力达到了 4 级水平,比 2009 年增长 18%;学生数学能力达到预期水平的比率为 87%,相当于 4.6 万名学生达到了预期水平,比 2014 年增长了 1%,比 2010 年增长了 8%;学生阅读能力达到预期水平的比率为 89%,这一历史新高比 2010 年增加了 6%,相当于 3.33 万名学生达到预期水平;80%的学生在拼写、标点和语法方面达到了预期水平,比 2014 年增长了 4%;在阅读、写作及数学方面达到 5 级水平的女生比男生至少多 1.4 万名,但高水平阶段的性别差距已经从 2014 年的 8%降至 2015 年的 5%;私立学校学生的阅读、写作及数学能力达到预期标准的比率从 2014 年的 67%提高至 2015 年的 71%。英国教育部将根据测试结果对各地区进行了排名,并为测试结果较差的地区提供改革方案,以促进其基础教育改革,力促教育公平。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段肖阳编译)

教育信息化

法国发起国民数字化教育创新服务计划

据法国教育部网站 2015 年 6 月 10 日报道,在“未来投资计划”框架下,法国教育部发起了多项数字化创新计划。这些计划由法国经济财政与工业部、数字化产业部及国家投资总署合作开发。

“未来投资计划”是研究与创新领域的一项全面投资计划,旨在推广和提升法国在数字化领域的应用能力,由法国国家投资总署负责实施。这些投资项目主要包括对基础研究项目、培训和技术转移的资助等。

为了创新发展数字化教育,法国发起了数字化教育计划。该计划囊括了工业部门、研究所、科研与发展部门、社会组织等多类机构与

社会团体。他们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教育目标:发展应用于教学的数字化技术和创新教学方式。每项计划都会获得相应的资助,这使得每个阶段的科研、生产及发展能有序进行。自 2011 年起,围绕数字化教育,法国已推出数项计划,主要包括 2011 年发起的一项旨在发展出版业、合作平台和数字化生产工具的倡议,10 项计划获得资助,其中,6 项计划与教学有关;2012 年发起的一项旨在针对学生个性化发展与教学资源分配、虚拟环境发展的倡议,15 项计划被采纳;2013 年发起的一项改善学校基础教学的倡议,10 项计划被选中,促进了多媒体和趣味教学的发展。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信息化国际比较研究中心井家鹏编译)

日本约 40%儿童使用智能手机

据日本 Benesse 教育信息网(www.benesse.co.jp/)2015 年 8 月 20 日报道,智能手机的普及和迅猛发展将信息化进程延伸到儿童领域。日本总务省的调查结果显示:约 10%的 0~1 岁儿童使用手机等信息终端;4~6 岁儿童的使用率约为 40%。

共 1750 人参与了此次调查,其中,1 岁以下儿童信息终端使用率(包括在父母引导下使用和观看信息终端的情况)占 10.5%;2 岁儿童信息终端使用率占 31.4%;4 岁儿童信息终端使用率占 41.4%;6 岁儿童信息终端使用率占 43.9%;小学 1~3 年级学生的信息终端使用率为 51.8%;小学 4~6 年级学生的信息终端使用率为 68.7%。可见,智能终端使用率随着儿童年龄的增加而明显跳升。

其中,儿童使用信息终端“浏览视频”的比重最高,占 6~7 成;在未上小学的儿童中,使用率较高的是“浏览照片”和“游戏”;小学生则是使用信息终端玩“游戏”的比重较高群体。另

外,调查结果显示,从婴幼儿阶段开始利用智
育辅导功能的父母较多,0~3 岁儿童的父母占
39.6%,4~6 岁儿童的父母占 36.7%。

对于智能手机使用理由的调查显示,儿童
未上小学前,父母在家照看小孩的同时需要做
家务,因而在脱不开手时会用到手机的占
58.7%;儿童与父母、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时会用
到手机的占 53.1%;外出游玩时等待期间会用
到手机的儿童占 42.9%。

调查显示,有六成父母对未上学儿童使用
智能终端表示“担心会影响儿童身心健康而感
到不安”;有半数以上的父母列举出智能终端的
优势,如“能让父母腾出照看小孩的时间做点其
他的事”“小孩的心情也会变好,不再哭闹”等。
此外,认为智能终端有利于提升儿童学习兴趣、
利用信息检索功能深入学习等方面的帮助的情
况如下:0~3 岁儿童的父母占 34.8%;4~6 岁儿
童的父母占 45.8%;小学 1~3 年级儿童的父母
占 48.5%;小学 4~6 年级儿童的父母占 57%。

智能手机的使用时间与利用内容由父母
支配的情况如下:0~3 岁儿童约占六成;4 岁以
上儿童约占八成。80.6%以上的父母认为信息
终端的使用有利于儿童未来更好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徐涵
编译)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将在高考中禁止学生佩戴智能型手表

据悉尼先驱晨报网 2015 年 8 月 23 日报
道,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考试协会近期采取
了新措施以防止不断变化的作弊手段,并宣布
高中毕业证书(HSC)考试中禁止学生佩戴智
慧型手表。新南威尔士学习研究理事会向全州
12 年级的高中生发布了今年 HSC 考试禁止携
带工具清单,第一项明令禁止携带的便是苹果手
表,其次是苹果手机、苹果平板电脑以及涂改液。

高中方面也在积极消除苹果手表对学生
的不良影响,如新南威尔士州著名的北悉尼男
校便在学校中全面禁止学生佩戴苹果手表。北
悉尼男校校长蒂莫西·赖特(Timothy Wright)说
到:“我校之所以全面禁止学生佩戴苹果手表,
是因为这些高科技产品直接威胁到‘学术诚
信’。苹果手表的功能非常强大,学生在完成学
习任务或者考试时只要佩戴上苹果手表便能
轻松且隐秘地获取大量的信息资料,这是一种
不良的学习捷径。”此外,蒂莫西·赖特校长表
示,学生佩戴苹果手表还存在其他潜在威胁,如
手表不显眼的特性以及可能附带的拍摄功能,
会威胁到教师及其他学生的个人隐私安全。

一些在线分类网站,如加姆特里(Gumtree)
网站,直接在网进行“代写作业”“代写论文”
交易,尤其在查茨伍德区、马塔区和奥本区的
扩散速度非常快。大学也同样面临学生作弊的
困扰,据悉尼大学报告,学术不端现象在校园
里蔓延,越来越多的学生愿意为作弊买单,包
括找人替考、借助高科技在考场作弊等。

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也让考试规则随之改
变。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相关政策规定,在考试
前,学生必须将智能终端统一放在透明塑料袋
中,并放置在课桌下。每位考生的身上、手腕上
均不允许佩戴任何物品,课桌里也不允许放置
任何物品,每间考场将新配置钟表供学生把握
考试时间。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徐涵
编译)

教育国际化

中德将加强青少年交流领域合作

近日,应中国教育部邀请,德国各州文教
部长联席会议(KMK)主席鲁希尔德·库尔特
(Brunhild Kurth)女士率团访华。期间,教育部

郝平副部长与库尔特女士就如何更好地促进中德两国青少年学生交流、加强汉语和德语在对方国家中小学的推广,以增进两国未来一代的相互理解进行了深入交流。为此,中德双方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青少年交流领域合作的联合意向性声明》,约定开展学生双向交流、举办语言竞赛,通过奖学金项目为青年汉语老师提供进修机会等多种形式的合作。

之后,库尔特主席一行访问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同济大学等,就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等多个领域的中德合作交流了经验。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殷文供稿)

欧洲高校师生国际交流规模稳中有增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一项关于“在经济危机时期高校师生的国际交流”的研究表明,尽管欧洲多个国家深受金融危机影响,但是高校师生国际交流规模及人数呈稳中有增的态势,尤其是国际实习项目人数增长显著。

德国联邦教研部部长婉卡表示,“这项研究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年轻人积极通过国外实习,获取相关资历来提高就业机会”。参与国际实习项目的人数增长势头同比明显高于参与国际交流学习项目的人数。统计数据和专家意见都表明,经济危机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参与国际交流学习的发展态势。

伊拉斯谟项目为欧洲多国高校师生提供了重要的国际交流机会。一项覆盖全部伊拉斯谟项目参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2008-2009 学年至 2012-2013 学年,参与国际交流学习项目的总人数从 16.8 万增长至 21.25 万,年平均增长约 6%;参与国际实习项目的人数从约 3 万增长至 5.56 万,年平均增长约 16%。然而,在 2012-2013 学年,参与国际交流学习项目的人数增长势头放缓。来自 10 个国家(塞浦路斯、

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波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参与调查的专家都表示,经济危机对伊拉斯谟项目的影响滞后了。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张慧供稿)

澳大利亚高校 或强制国际学生学习英语课程

据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网 2015 年 8 月 6 日报道,澳大利亚著名的悉尼大学商学院或将针对英语能力薄弱的国际学生引入强制性英语课程。不少国际学生因英语能力较低而未能获得硕士学位。

在悉尼大学商学院开设的批判性思维课程中,有 37% 的学生未能通过期末考试;在商业课程中,有约 12% 的学生未能通过期末考试。悉尼大学商学院规定,国际学生必须通过所有课程的考试才能获得硕士学位。

商学院副院长约翰·希尔兹说:“近几年来,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未通过率逐年上升。很多学生的考前成绩都比较高,却不能通过最后的考试,其原因可能是‘考前焦虑’,也可能其平时成绩是‘代笔’的功劳。”希尔兹教授承认,拙劣的英语能力和找人代笔可能是导致学生学业能力低下,不能通过最后考试的主要原因。

希尔兹教授希望商学院的国际学生能在英语能力测试上获得高分,但学院一直没有英语必修课程来保障和提高他们的英语能力。他说:“要尽我们所能为学生提供学业帮助,提高国际学生的英语能力。为此,我们有可能尝试引入强制性英语课程。”悉尼大学研究生会议员代表表示,要想使国际学生达到相关学术标准,就必须加强对他们的帮助与支持,为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来提高自身水平。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徐涵供稿)

编辑 许方舟 校对 郭伟

World Education Forum

- Creating An All-round Opening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terview with Kyosuke Nagata, President of University of Tsukuba (by YANG Yun,LIU Qi,ZHU Tingting) 3
- Having Witnessed the New China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Expecting the Research of Overseas Education Information(II)
 (by HUANG Shiqi) 8

Global Education Governance

• TOPIC: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I)

- University is Entering a New Era of Global Partnership (by Manuel Heitor) 15
- Global Governance of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Quality Assurance and Recognition (by WANG Shuo) 18

World Higher Education

- Reforms and New Chang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Germany (by WANG Zhiqiang) 24
- Reform of University Tuition Fees in Germany in 2006–2014(I) (by HAN Ding) 29

World TVET and Lifelong Learning

- An Exploration on the Philippine Community Education Based on the Visit to Cabuyao Hope Daycare Center (by SUN Jianguang)
 34
- Analysis on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 in Korea (by HAN Shujing) 37

World Basic Education

- Focus on Quality and Equity: The Progress for Latest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Reform in Australia (by HUANG Yanxia) .. 42
- Obama Administration’s Measures for American Basic Education Reform (by YANG Zhiming, SUN Hechuan) 47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

• Confucius Institute: A Bridge Linking China and the World

- Building the Bridge of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Zambia with Devotion and Persistence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HE Yi, Chinese Director, Confucius Institute at University of Zambia (by PAN Ya, ZHANG Jinxiao)
 52
- Establishing a Platform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Interview with QIAO Jianzhen, Chinese Director, Confucius Institute at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by GUO Wei, PAN Ya) 57

Education in Hong Kong, Macao & Taiwan

- Characteristics and Enlightenmen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in Taiwan Universities (by SHI Zhaoxia) .. 62
- Research o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Liberal Art Education of Colleges
 ——Based on the Cases of 15 Colleges in China (by ZHUANG Yu) 66

Global Education Times

- | | | |
|---|----------------------|------------------------------------|
| Education Governance: Policies and Trends(72) | Higher Education(73) | TVET and Lifelong Learning(74) |
| Basic Education(75) | ICT in Education(77) |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78) |